

# 文史资料选辑

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

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 文史资料选辑

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

上

一九七九年第二辑

(总第二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五月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文史资料选辑

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

上

1979年第二辑(总第二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25 插页 4 字数 157,000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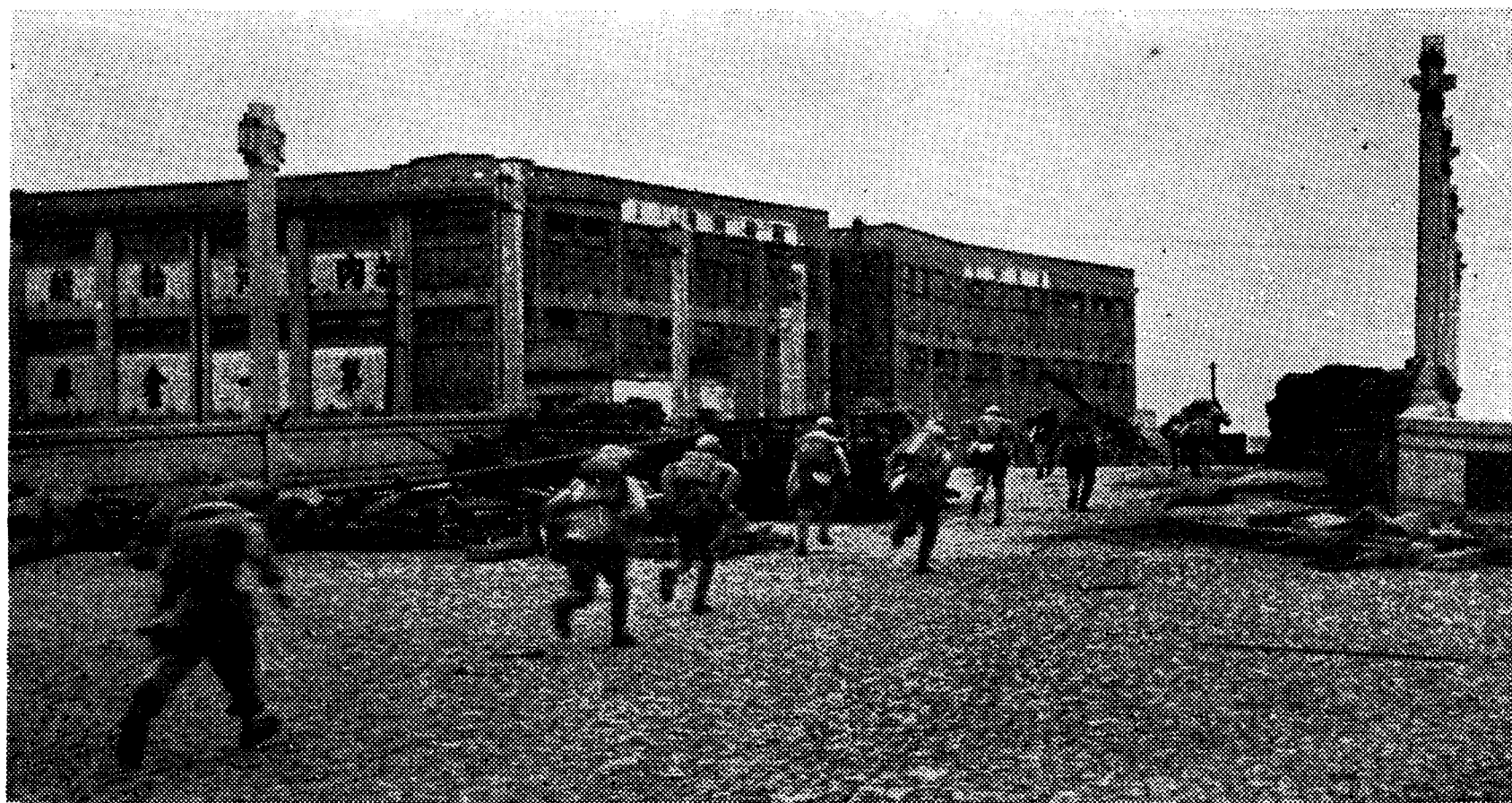
印数 1—55,000册

书号 11074·398 定价 0.79元

内部发行



人民解放军坦克部队经过南京路，本市人民群众夹道热烈欢迎。



人民解放军战士向西藏路桥北进军的情况。

### 本證規則

- 一、此證發給軍政區黨委以上高級幹部，凡持本證者，或離期滿准予通行。
- 二、持本證者應出黨政軍機關准予門衛檢查。
- 三、本證概許本人隨身攜帶，不得轉借他人。
- 四、若失本證時，必須立即呈報，申明理由，請求補發。

部別：總工會  
職別：籌備委員  
姓名：張承宗

一九四九年五月廿八日

张承宗同志于1949年5月27日晚与陈毅司令员会师后，人民解放军及军管会所颁发的通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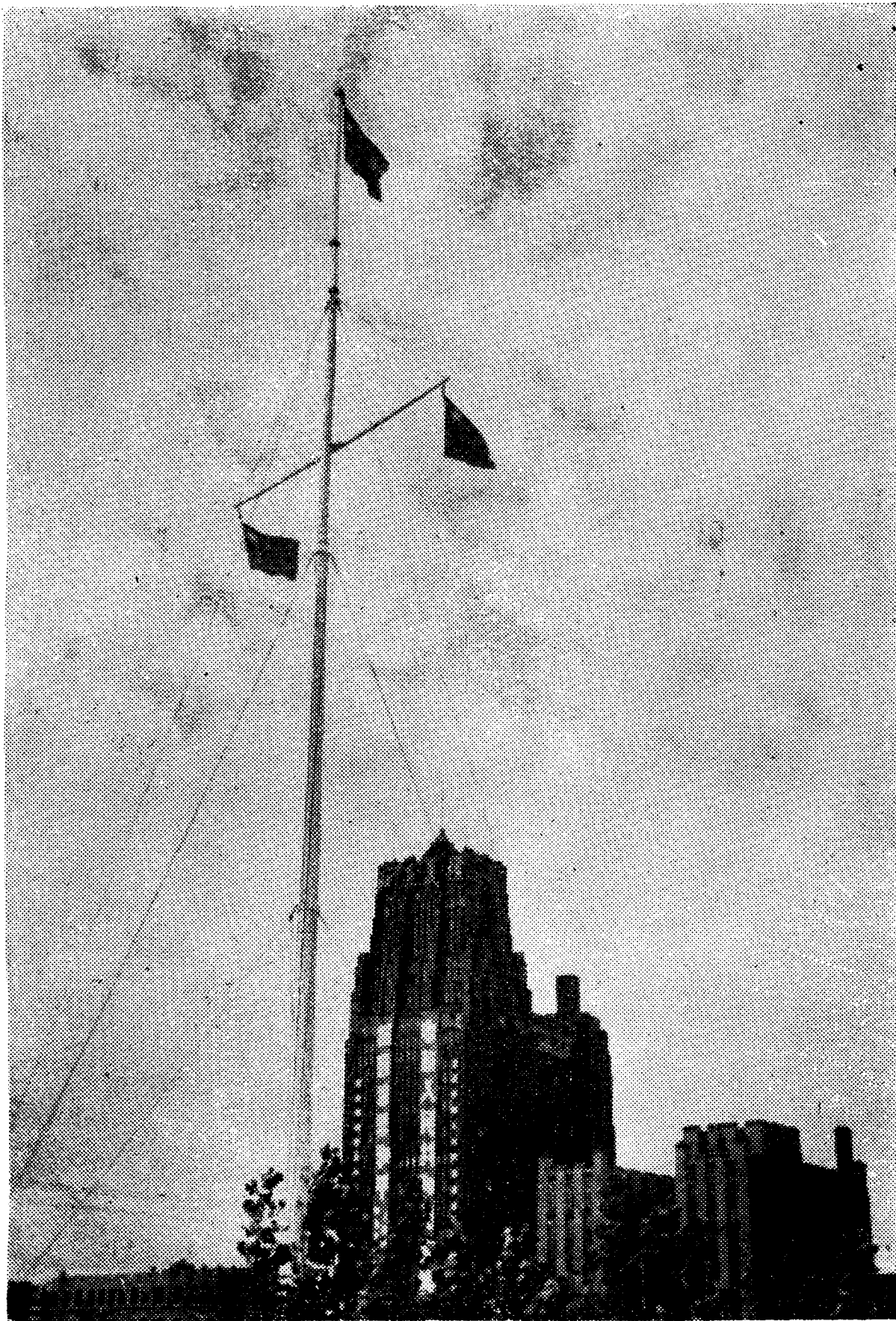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七軍政治部便箋

准予出入此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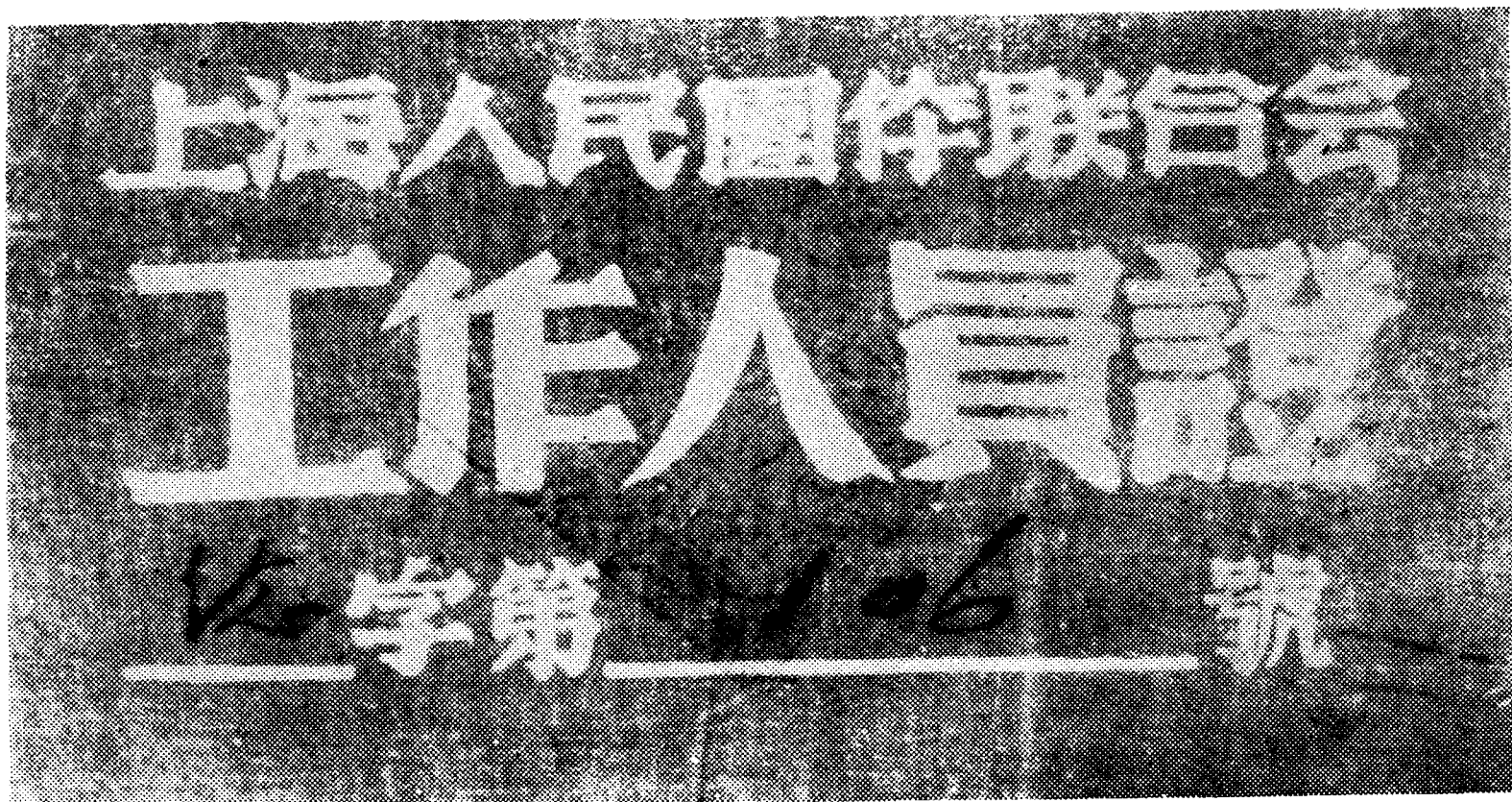
張承宗

张承宗同志于1949年5月25日与27军聂凤智司令员会见后，27军所颁发的通行证。

在跑马厅（现人民广场）高高地升起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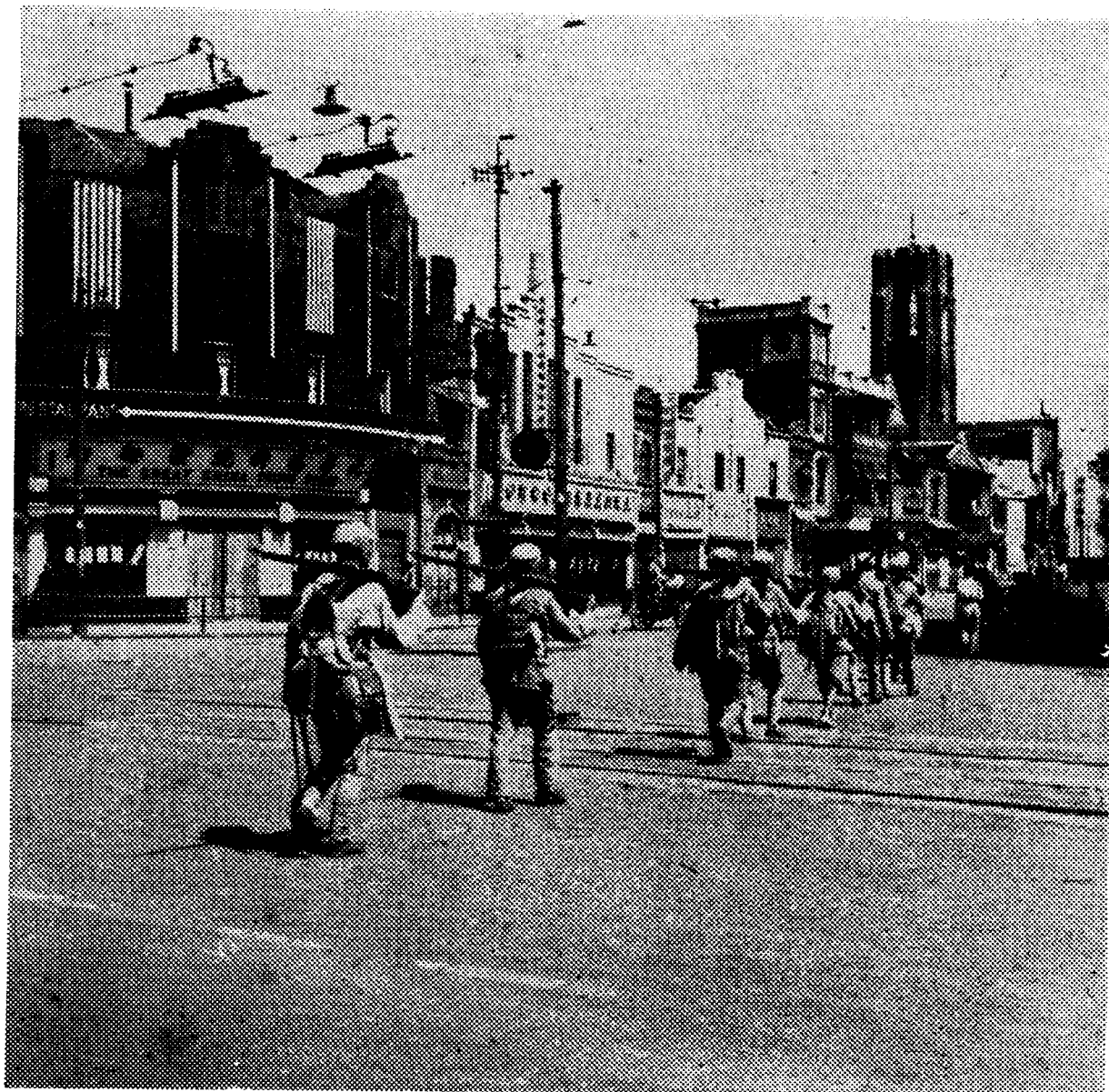
我地下党组织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时，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所发的臂章。



人民解放军  
铁道工程兵第一  
辆火车开进了上  
海北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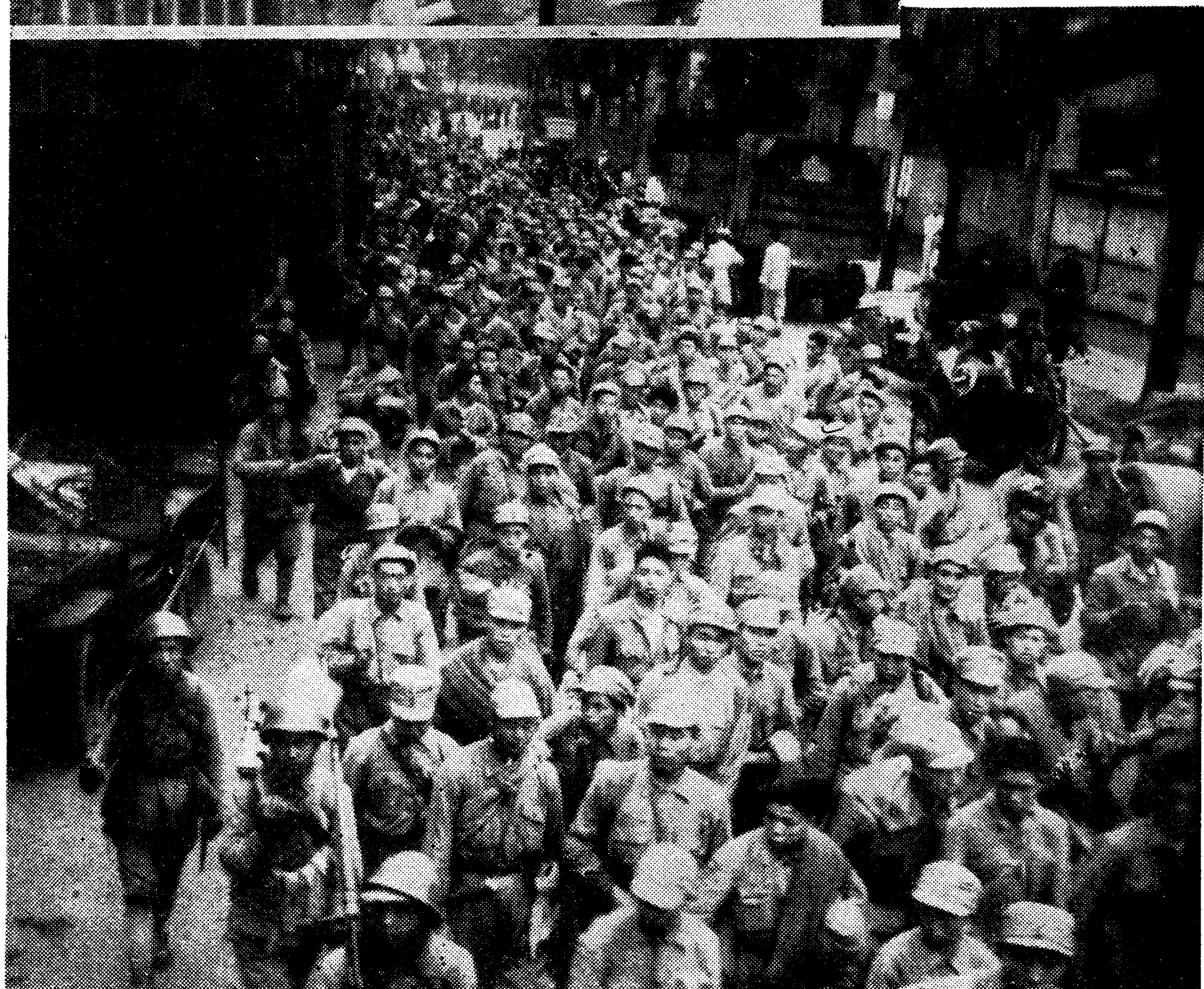
人民解放军  
进入西藏中路。



人民解放军  
战士守护国家财  
产。



大批俘虏由  
解放军押往郊  
区。







上海解放后，党在大光明电影院召开了上海总工会筹备会，陈毅同志在大会上作了讲话。

## 目 录

-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人民革命运动…………… 张承宗( 1 )
- 郭化若将军谈上海之战…………… 本刊记者( 46 )
- 铁道工程兵进军上海…………… 黄逸峰( 51 )
- 解放上海的浦东之战…………… 徐 援( 55 )
- 邓发同志和我从巴黎到上海…………… 朱学范( 72 )
- 回忆上海工人的护厂斗争…………… 张 祺( 80 )
- 解放前夕沪西工人的斗争  
…………… 施惠珍、顾龙桂、张翼钧、蒋明道、姜东成( 95 )
-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第一印染厂护厂史料编写组(115)
- 法电工人为实现“三不停”而斗争  
…………… 权琳甫、马少林、孙进福、许炳山、陆如松(131)
- 确保电话畅通…………… 沈 藩(140)
- 英联船厂斗争的日日夜夜…………… 沙玉琳(144)
- 英电修造厂同志徒手解除两营敌军武装  
…………… 徐巧根、杨崇泰、姜文杰(154)
- 解放上海接管前后的斗争…………… 吴雪之(164)
- 在伪警察局里的斗争…………… 刘 峰(175)
- 忆张困斋同志在监狱中…………… 韩慧如(195)
- 上海地下党与人民解放军会师小记…………… 艾中全(201)

回忆上海解放前后我的亲身经历…………… 赵祖康(203)  
冲破黑暗,放声歌唱…………… 徐炜、钱乃立(220)

#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人民革命运动

张 承 宗

八年抗战期间，上海地下党在毛泽东同志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总方针指导下，大力动员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到敌占农村去，参加开辟、建立和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广泛采取各种方法，在人力物力方面，支援大江南北新四军根据地的建设，配合新四军的斗争；同时，坚决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个字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至武装群众，组织地下军，进行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建立和扩大党的组织，一点一滴地积蓄革命力量，同敌人进行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方面不懈的斗争。这支积蓄起来的力量，成为解放战争时期配合人民解放军与美蒋在上海的统治者进行决战的可靠基础。

一九四二年秋，江苏省委奉中共中央命令，将领导机关转移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淮南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初，华中局成立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对外称新四军调查研究室，负责领导华中地区主要是上海、江苏、浙江等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地下工作。城工部设在新四军政治部，当时在天长县以西大王庄（军部在黄花荡），番号是第十二中队，部长是刘晓同志。不久刘晓同志带领一部分干部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并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后由刘长胜同志任部长，我是秘书兼干部科长，田辛同志是交通科长，直至日本投降为止。在这期间，上海、南京等地许多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调去淮南根据地及华中局城工部进行整风学习。

在城工部的领导下，上海工人在抗日胜利前夜就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当天晚上，军部及直属机关的首长都彻夜未睡。九日凌晨，华中局通知刘长胜同志和我去开会。会上传达了中央的电报，中央明确指出：苏联已对日宣战，日本不能继续打下去，将很快投降。为此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上海，要城工部立即派干部回上海，发动群众，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参加了会议并宣布成立上海市委，由刘长胜同志任书记，委员有张执一、张承宗、陈伟达（未到职）、陈祥生。对此，饶漱石进行了解释，说陈祥生已在上海，组织了十万工人等等。刘长胜同志和我都没有应声，但不相信陈祥生所谎报的一套。

八月十日延安总部朱总司令向各解放区发布命令，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

刘长胜同志和我回到城工部之后，天未明之前，就讨论决定，张执一和我当天立即出发去上海，张执一负责上层统一战线及文化界等工作并与根据地联系，我负责地方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运动。刘长胜同志布置城工部结束工作后，也很快到了上海。

当天我由交通赵茅兴同志带领，从城工部出发，过义涧，经永

兴集，到刘家集宿了一夜。十日离开边区，到敌占区徐家集，经瓜州到镇江。在镇江找到交通联络站的曹达和黄履冰同志接待，由交通曹达同志带领，从镇江乘火车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日伪军仍在站岗检查，但是已经是威风扫地的样子；老百姓都互相交换眼色，心照不宣，“天快亮了”！

我于十一日到上海后，立即找到工委张祺、职委陆志仁、学委吴学谦、教委老陈、警委邵健、党的商业部门项克方等同志，分头传达了中央关于发动群众，里应外合，以武装起义来配合新四军进攻上海的指示。听了传达以后，群情振奋，斗志昂扬，迅速地逐级传达动员，上海城市沸腾起来了。

“天快亮了，大家起来杀萝卜头！”（当时上海人民称日本兵为萝卜头）杨树浦电厂的工人在厕所里挂一个萝卜，在墙上画了一把刀，旁边写着“大家切萝卜头”，马上在厂内厂外都流传开了。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地下党决定在工人、店职员、学生、教师以及各界爱国人士中，成立庆祝抗日胜利筹备会，宣传抗战胜利是人民斗争得来的，人民要求民主与和平，宣传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的成绩；并以各工厂和失业工人中的地下军为骨干，发动群众，保护工厂、商店，以此为阵地，然后占领地区，准备里应外合，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当时地下军有一个分队负责人毛良同志，在他领导下面有裕丰、大康、同兴等纱厂的地下军，曾在同兴纱厂搞到轻机枪一挺和步枪七枝。孙明同志领导下的部分地下军也从日本化工厂内搞到一批手榴弹。在汪伪警察局里工作的同志掌握了一二百枝枪。

紧接着，张祺、张执一同志和我，到青浦观音堂与顾复生同志的部队取得联系。当时顾复生同志汇报了青浦游击队有几百枝枪，可以从沪西方面配合工人起义。大家都等待着陈伟达同志从浙

东带领新四军部队前来。

那时，日军还没有放下武器，上海工人就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和日军汉奸进行清算斗争，保护工厂，迎接胜利。八月十三日到十七日左右，几天之内，沪东、沪西、南市、闸北的工人发动起来，向敌伪工厂要求发解散费、生活维持费，和敌人作清算斗争。沪东、沪西的纺织、机器等工人约五万多人，为了保护工厂，迎接胜利，还占领了工厂，防止敌伪破坏和盗窃物资。在这基础上，沪西工人区以纺织、机器等业为中心，在平民村召开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参加的有职工五万多人，并建立了工会的筹备机构——庆祝胜利筹备委员会。沪东工人区以机器业为主，也在沪东平凉村召开庆祝大会，建立组织，参加的包括纺织、卷烟、化学等业职工也在五万人以上。银行、百货、商店的职员，大中学校学生、小学教师，也都纷纷庆祝抗战胜利，在要求实行民主、独立、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下，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很多工厂已经贴出“欢迎新四军”、“欢迎刘长胜当市长”的标语。

但是形势很快发生变化，日军于八月十五日宣布投降，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勾结伪军，阻止我新四军解放京沪大城市，独揽抗日胜利果实，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暂时不能属于我们。为了力争东北、华北，中央决定新四军北上，撤销对上海的进攻，尽可能广占乡村和中小城市。

八月二十六日中央对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到重庆进行谈判。

市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上海地下斗争仍应坚持长期隐蔽的方针，发动群众，保护工人生活权利，开展争取和平、民主运

动,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实行独裁的政策,把在组织地下军、迎接新四军的斗争中暴露了的部分干部,如周克、周晓华、陈良、诸敏、胡华清、高骏、毛良等一百多位同志撤到苏北根据地。以后他们又重新派回国民党地区工作,如周克和周晓华同志派去无锡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斗争空前激烈、频繁,规模空前巨大,不但打击了敌人,也教育了人民,锻炼了人民。

### 一、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1945年8月——1946年6月)

抗战胜利,在敌后长期坚持与敌伪进行斗争的上海人民,原来希望从此可过自由幸福的日子,建立人民大众的、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了。但是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军国主义,国民党在美军空运支持下前来“劫收”(当时国民党前来接收敌伪企业机关,抢夺钱财物资,人民称之为“劫收”),不顾人民死活,只要“五子”(金子、车子、房子、女子、票子)登科。连当了汉奸、投了敌的国民党分子,也摇身一变,自称为“忠于党国”,重新耀武扬威,骑在人民头上。同时,蒋介石“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八年抗战坐等胜利,日本投降后又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屠杀人民。这些事实很快暴露了国民党的真面貌,教育了上海人民。原来国民党是来抢抗战胜利的果实,是要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实行国民党卖国、内战、独裁的法西斯统治,这是人民所不允许的!

面临当时的形势,上海地下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要准备两手:一方面开展广泛的爱国、民主的统一战线,团结上海各



阶层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准备应付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配合解放军的自卫战争，保卫解放区，保卫上海人民的生存、生活和民主权利，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

国民党接收工厂后，复工无期，工人失业。同时，勾结敌伪，释放汉奸，并宣布坚持敌后斗争的工人、职员、学生是“伪工人”、“伪职员”、“伪学生”，要进行甄别，否则不得进厂做工，不得上学读书。这些反动措施，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上海人民广泛进行了检举汉奸，反对甄别，反对劫收，反对关闭工厂、学校，要求复工，要求救济，要求读书权利的斗争。

国民党政府大汉奸不审不捉，中汉奸陆续释放，小汉奸审来审去。新新公司职工首先起来检举该公司总经理李泽，国民党政府竟然逮捕和开除检举人。上海工人、学生、职员、妇女纷纷声援百货公司职工的正义行为，组织检举汉奸后援会，发表宣言。国民党政府百般阻挠、恐吓，但职工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使国民党最后不得不迫于舆论的反对和指责，逮捕了李泽，并判处徒刑三年。

工人、职员和学生反对被称为“伪人员”、“伪职工”、“伪学生”，并把这斗争和要求复工、要求救济失业、要求读书联系起来。

在这些人民斗争过程中，党领导下的上海职工和学生组织进一步建立和扩大起来。各行各业的职工组织起自己的工会，大中学校的学生也组织起学生会。国民党政府企图控制和包办工会，派遣工贼“整理”、“改组”工会，制订严格的登记和批准手续，成立以后还派“督察”和“指导员”把持工会。上海职工在组织工会问题上，采取各种方法，反对国民党官办、分裂、压迫的方针，坚持民主、团结、合作的方针，利用登记批准等合法手续，向国民党进行斗争，争取

工会的正式成立。一九四六年底前有工会约四百多个，参加的职工三十多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在六月二十三日争取和平民主示威运动前成立的。

经过一系列政治、经济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广大群众越来越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斗争才有出路。正如工人所说：“蜡烛不点不亮，国民党不斗不倒。”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大规模内战，又大肆屠杀和压迫爱国学生、职工和民主人士。美国派马歇尔以调停作掩护，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企图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十二月一日，云南昆明的国民党军队和特务为了镇压民主运动，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以机关枪、美制手榴弹打死学生于再等四人，重伤的几十人，造成了“一二·一”惨案。各地学生和教授都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压迫、要求民主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上海学生一马当先，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在沪西玉佛寺，和各界人民代表等一万多人公祭昆明死难烈士。主祭团由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等组成。宋庆龄先生送的横联上面写着“为民前驱”。学生们唱着歌：“你们的血照亮了路，我们会继续前进！”会场上有学生、教授、工人、职员的代表讲话，控诉国民党的暴行，群情悲愤。公祭变为示威游行，队伍四人一排，绵延两里。群众高呼“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取消特务”，“惩办昆明惨案凶手”。

一九四六年三八节，在工委、学委和妇委领导下，组织了三万多女工和女学生参加了当天在兆丰公园举行的民主妇女集会和游行，喊出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美

国兵退出中国去”等口号。

一九四六年五月，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共重庆办事处移到南京，并且在上海原马斯南路一〇七号（现思南路七十三号）设立上海办事处，对外名称用“周公馆”。上海地下党组织为“周公馆”配备了工作人员。一九四六年五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周恩来同志领导中共代表团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同志通过办事处经常给上海地下党以指示。

一九四六年大约四月间，刘晓同志从延安经晋察冀、苏北回到上海。以后，成立了上海局（中央局），刘晓同志任书记，刘长胜同志任副书记，刘少文和钱瑛同志为委员。上海局领导上海、南京、杭州、无锡及江苏、浙江其他地区的地下党，还领导过浙东地区的武装斗争。张执一、张登和我根据工作需要，参加了上海局的部分会议和活动。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又成立上海市委，张承宗任书记，马纯古任副书记，张祺、陆志仁、梅洛、吴学谦、马飞海等同志为委员。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人民运动逐步深入开展，这一运动又和保障生活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一九四六年一月起，上海学生开展助学运动，帮助一万多青年解决了失学问题，加强了学生的团结，提高了政治觉悟，在群众性助学运动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筹备会。由于国民党政府增加军费，物价飞涨，不仅学生的学费激增，而且由于教育经费减少，教师收入也减少。五、六月间，上海大中中学生二万多人举行敬师尊师募捐运动，提出“停止内战，减少军费，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学生和教师的团结也加强了。在这基础上，上海大中学校一百五十多学生团体，成立了“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

学生的生活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了，学生运动作为上海

人民运动的重要部分，又和职工运动汇合起来了。

各业职工纷纷成立和平民主团体，开展反内战、争和平的签名运动，发表宣言，很多行业职工签名的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爱国的工商界、文化界、民主团体也起来响应，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宣告成立。反美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这是毛泽东同志统一战线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实践，广大干部努力执行的辉煌成就。

这时国民党政府拒绝了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长期停战、重开政协等建议，内战危机严重。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做最后的呼吁：反对内战，要求和平！

周恩来同志对上海党指示要开展广泛的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周恩来同志亲自对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特别是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欺骗性的反动实质。周恩来同志的艰巨工作，为上海党广泛发动群众运动，同时开展各阶层统一战线工作，相互密切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六月二十三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派代表马叙伦、盛丕华、黄延芳、胡厥文、吴耀宗、包达三、张炯伯、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等去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民主。

在北站附近，学生界建立了六·二三运动的秘密指挥部，吴学谦、李琦涛等同志都到那里。刘晓、刘长胜、冯文彬同志和我，这天也到现场。

这天早晨，上海学生、工人、职员、教师及市民约五万多人，聚在北火车站，欢送上海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接着就进入市区游行示威。队伍由各大学学生带头，高呼“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分发传单、宣言。各主要工会，机器、纺织、百货、西药、银钱业、电力、自

来水、电车、煤气、水电、电话、酒菜等职工都参加了游行。电话公司工人高举“内战不停，电话不灵”的旗帜。游行队伍第一次喊出了“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立即撤退美国驻华海空军！”沿路市民都跟着鼓掌呼口号。游行队伍经过八仙桥青年会时，特务从楼上投掷酒瓶、磁盆等物，把群众打得头破血流，企图破坏游行，群众非常愤怒，纠察队上楼捉住了三个特务。游行到复兴公园，被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警察，开动警备车队，把三个特务劫去。

当晚，上海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不少代表被打得身受重伤，有的当场晕去。雷洁琼及学生代表陈震中的脑部、胸部受重伤。在周恩来同志的带领下，中共南京办事处的同志连夜带着慰问品，到医院亲切地慰问受伤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对代表们说：血决不会白流的。中共代表团还向国民党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南京各界人士和学生代表不顾国民党的阻挠、压迫，纷纷前来热情慰问。

至此，国民党勾结美帝的假和平、假民主、真内战的阴谋，完全暴露无遗了。

六月二十三日反内战、争取和平的示威，是抗战胜利以后上海人民运动的一次大检阅。说明了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抓紧有利形势，只经过十个月的时间，就迅速地建立起工人、职员、学生、教师、文化界的群众组织，击破了美帝和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开展了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反压迫、要生存的斗争，建立和巩固了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国民党要争夺抗战胜利果实，回到抗战前的法西斯统治是做不到了。上海人民热烈地支持中共的“和平、民主”主张，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发来慰问电，深切关怀被打代表，对国民党暴行表示愤慨，并重申为和平而奋斗的决心。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李维汉等同志发来慰问信。毛泽东、朱德同志来电：“南京周恩来同志转上海人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黄延芳、盛丕华、吴耀宗、张炯伯、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诸先生公鉴：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摄！”

国民党政府在完成全面内战的准备后，就大举进攻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镇压爱国民主运动，逮捕工人、学生，暗杀民主人士。上海人民斗争进入深入艰苦的阶段。

## 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人民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1946年6月——1948年6月）

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内战政策，更加威胁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因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日益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斗争汹涌澎湃，美蒋完全孤立，国民党处于全民包围中。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同志返回延安。临行前，通过中共办事处给上海局一个简短但极为重要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地区黑暗严重的时刻又到来，必须坚持艰苦的斗争。五年的时间胜利必将实现。

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鼓舞了地下党全体党员，增强了斗争到底的决心。特别是“五年时间”给大家的印象很深刻，尽管黑夜漫漫，但是曙光已在前头。同志们，努力奋斗呀！

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一九四六年八月至十一月三十日发生的摊贩请愿事件；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海学生响应北平学生抗议美军强奸沈崇而发生的抗暴运动，标志着蒋管区人民革命运动的新高涨。

由于物价上涨，失业工人达三十万，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只能摆设小摊，贩卖零星商品，以养活一家老小。可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伪市府借口摊贩“有碍市容”、“妨害交通”，下令取缔黄浦、老闸两区的摊贩。八月，伪警察局开始逮捕摊贩，没收货物。摊贩中有失业工人和被淘汰警察中的我党党员，他们在部分摊贩骨干中进行了工作，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抓住时机，保卫群众生活，为争生存，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九月，黄浦区摊贩推派十六名代表向伪市府提出三点要求：收回不许设摊的成命；不得无故逮捕摊贩，释放在押摊贩；发还没收的物资。并两次组织请愿队伍，到伪市府请愿，沿途高呼“我们要饭吃”、“我们要生存”等口号。国民党政府继续逮捕摊贩，到十一月被捕摊贩达一千人。十一月三十日，三千多摊贩游行，包围黄浦区警察局，要求立即释放被捕摊贩，归还没收物资。黄浦区警察局内的秘密党员配合斗争，将外面的消息告诉在押的摊贩，使口号声外呼内应，并在伪警察中开展同情支援摊贩的运动，使自发的斗争和有领导的斗争相结合。国民党政府调来大批保安警察和宪兵进行镇压，摊贩和军警搏斗，军警开枪，打死七人，打伤多人。群众高呼：“我们要活命”，“打倒刽子手”，“为死难者报仇”。十二月一日，示威群众增加

到五千人以上，包围黄浦区警察局，同时也包围了老闸区警察局。军警继续镇压，群众以石块、竹杠、木棒，对付军警的水龙头、警棍、催泪瓦斯、机枪。群众被杀害十人，伤百余人，被逮捕一批人。摊贩争生存、反迫害的斗争，震动了全市。公共汽车、电车被迫停驶，商店除少数外都停业，对摊贩斗争表示同情支援。摊贩反饥饿、争生存的群众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高潮，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收回取缔摊贩的命令，允许黄浦、老闸两区的摊贩继续营业；并且被迫撤换了黄浦区警察局长杜淳。

这时，美帝的侵略本质，美军的暴行，越来越引起人民的憎恨。美军横行不法，无恶不作。据当时报载，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美军汽车撞死中国人一千多人，强奸妇女三百多人；一九四六年八月至十二月，美军汽车闯祸事件达八百多起。美国水兵打死三轮车工人臧大咬子，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反对和抗议。特别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被美军强奸，引起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各地学生五十多万人相继罢课游行，抗议美军暴行。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海局决定通过学委领导学生方面的党支部，发动广大同学，尤其是大专学校学生，成立了“上海市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由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组成主席团，并定于一九四七年元旦举行全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大示威。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正是国民党政府宣布伪宪法的一天，上海学生一万多人，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压迫，举行了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参加这次游行示威的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光华大学、上海法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医学院、中华



工商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体育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国立音专、南洋模范中学、同济大学附中、中国女中、启秀女中等几十所学校的学生，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滚！滚！滚！美国兵滚出去！”“为臧大咬子报仇！”“为沈崇同学雪耻！”口号声响彻了黄浦江两岸的上空。

毛泽东同志指出：由北平开始的学生运动，已向全国各大城市发展，参加人数达数十万，超过“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的规模。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给中共办事处董必武同志、上海局刘晓同志及国民党地区并晋察冀中央局等党委一封电报《在白区对国(民)党对策指示》。这个电报现在北京“周总理生平事迹展览”中展出，是周恩来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

这个指示，首先指出蒋管区的形势，蒋顽在前线大败，后方危机重重的情况下，于其统治城市，大施镇压，赶走我方人员，威胁民主运动，捕打人民、学生。蒋管区的群众斗争要经过一些迂回起伏，但总的趋势必然会继长增高。尤其是人民活不下去的财政危机，人民既忍受不了，而前线继续大败，对人民也吓唬不了。接着决定我党的对策，要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内战、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在策略上，又特别指出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反内战的斗争上去。在工人与城市贫民(如小贩)中，更要着重经济斗争的领导和发展。

事情的发展完全证明了中央指示的预见性，证明了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和我党的政策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上海局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感到全面内战爆发以来，国民党政府日趋孤立，不得人心。基本群众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斗争表现出频繁性、激烈性、广泛性。上层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也随着不断扩大。斗争的矛头不但对着国民党反动政府，而且日益明显地和反对美帝支持国民党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结合起来。一个反美反蒋的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潮即将来到。把反美和反蒋斗争结合起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把分散的斗争和集中的斗争结合起来。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警委等党的组织都根据这一精神，总结经验，准备新的斗争。

这个时候，为了加强对科技界的领导，扩大团结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的队伍，地下市委以原由学委领导下的社会区委（金瓯卜、曹葆贞同志联系的）所属的党员为基础，成立了科技总支，直属市委领导。总支成员中有王一定、沈惠龙、钦湘舟、闵淑芬、侯仁民、郑定能等同志，并成立中国技术协会党组，由宋名适同志负责。科技总支负责组织科技界广大群众，开展科技界上层统一战线，利用合法身分，进行反美反蒋爱国民主活动，调查研究工厂、企业、机关的政治、经济、物资、技术设备等情况，为配合解放上海做准备。出版《工程界》和《技协会讯》刊物。同时，教育和培养技术干部，输送到解放区参加根据地建设，并为接管城市做准备。

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人民运动的高涨。

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内战政策，迫使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国民党和美帝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条约》、《中美航空条约》、《中美农业协定》及美军驻华、海军基地等秘密协定，出卖国家主权。美货通过倾销、专卖、武装走私等形式独占了中国市场。中国民族工商业在美国独占资本及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下，纷纷破产。

仅上海一地，在一九四六年半年中，工厂倒闭的即有一千六百多家，工人失业的达三十万人。广大职工、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极为不满，反美反蒋情绪高涨。

职委根据上海局及市委指示，联系工商界的实际情况，发动职工群众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召开国货厂商座谈会，提出“挽救工商危机，反对美货倾销”，得到民族工商界、文化界、民主人士的响应和支持。

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百货职工成立“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会”，定于二月九日召开大会。因敌人阻挠和破坏，借不到会场，临时在劝工大楼百货工会会址召开。

二月九日上午八时许，劝工大楼会场已挤满了人，郭沫若、邓初民等也已来到。会场上空气热烈，群众高唱“赶不走那美军心不甘……”等爱国民主歌曲。这时国民党已在马路上预伏特务三、四百人，从南京路门口三楼扶梯向会场内冲进，门口涌塞，秩序混乱。主席团看到形势不对头，即宣布散会。话犹未毕，特务推翻桌子，高呼“打！”楼上楼下就大打起来。从九点起打了一个多钟头，会场桌椅、灯泡、痰盂、茶杯齐飞，几十块玻璃窗打得一块不剩，鲜红的血溅满四壁，特务绝灭人性的暴行，激起了与会群众的愤怒。纠察队员和一部分青年职工在主席台前排起队来，保护郭沫若、邓初民退走。职工们英勇地还击特务，用玻璃板等作为武器，一个受伤了另一个接上去，并高唱“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的歌曲，坚持斗争二十多分钟，使特务不敢走近主席台。

二九事件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卖国内战、屠杀人民的罪行，结果被打重伤的职工有二十多人，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受伤过重，于当日下午不治身死。事件发生后，上海工人、职员、学生、教

师界纷纷成立“二九惨案后援会”，支援爱用国货运动，反对国民党特务暴行。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职员、摊贩写慰问信和捐款给烈士家属，各项捐款达九千余万元。

二月十一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召开会议，发表宣言，内有一段说：“这次百货业职工发起爱用国货运动，是代表了全国老百姓的呼声的。在今天美货泛滥的情况下，要爱用国货，当然要抵制美货。为什么不可以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这次劝工大楼惨案，不仅是较场口惨案的翻版，而且是更残酷、更卑劣、更无耻的翻版！”“全上海的市民，全中国的同胞，都应当从这次劝工大楼惨案中，认识今日上海统治者及中国统治者的反民主、反人民的真面目。”上海工人协会发表宣言，号召上海职工联合各阶层爱国人士一致行动起来，反对国民党特务暴行，要求惩凶，抚恤，保护民主自由，为死者复仇，把爱用国货运动坚持扩大，贯彻到底！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农工民主党、上海妇女联谊会、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等团体，也纷纷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

美帝及其走狗蒋介石的暴行阻止不了人民革命运动，只是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这些惨痛的事件，教育了人民更加认清美帝干涉中国的阴谋和国民党是内战的罪魁。上海人民的团结更加强了，反美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范围更扩大了。各界人民的斗争很频繁，具有统一性和广泛性，此起彼伏。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矛头直接指向美帝和国民政府。各个阶层、各个单位的分散斗争，又和各界各单位的联合的集中斗争相结合，从各方面来打击和动摇美蒋的反动统治。

在第一年的作战中，蒋介石不仅在军事上遭到严重的失败，在政治上、经济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宣布伪

宪法，并于一九四七年四月“改组政府”。但是民主同盟和一切无党派民主人士都拒绝参加，蒋介石陷于空前的孤立。在经济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从一九四七年二月至五月，物价上涨了四倍。以抗战前的物价为标准，日军投降前物价上涨一千八百倍，至一九四七年六月上涨六万倍。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上海及各地发生抢米风潮。生活斗争发展到极其广阔的范围，并且已经越出经济斗争的性质，成为政治和经济不可分割的斗争了。在这基础上，人民运动到一九四七年红五月，发展到反饥饿、反内战的高峰，成为伟大的人民革命新高潮即将到来的标志。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海发生黄金暴涨，引起物价猛升，形成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物价指数以一九三六年为一百，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涨达一万八千倍（系公布数字，实际还不止此数）。国民党颁布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除严格控制金融、经济、物价、外汇外，在职工工资方面，把职工的生活费指数冻结在一月份的数字上（工人七千九百倍，职员六千六百倍），又重申禁止怠工、罢工，违者“格杀勿论”。

上海职工在地下党的指示下，发动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并采取了灵活的斗争策略和方法，目标统一，斗争分散，充分酝酿，扩大影响，在广泛的基础上提高，在分散的基础上集中。首先发动各业职工代表不断请愿，发表宣言。在纺织厂中，发动了此起彼伏的定时的关车斗争。五月一日，国民党在跑马厅开纪念会，企图欺骗职工，宣传反共。党通过进步工会预作布置，在伪市长作反共宣传时，台下数万工人高呼：“肃清贪官污吏！”“打倒官僚资本！”“反对苛捐杂税！”“解冻生活费指数！”把反共大会转变为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大会，使国民党反动头子大为恐慌，狼狈不堪地结束会

议。散会后，群众又把预先藏好的“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的标语和横幅拿出来，分头举行游行。

上海学生支援了“二九爱用国货运动”，成立了“上海市学生抗暴联合会”，迎接红五月的斗争。各校学生都大规模地举行五四纪念会，在校内校外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反卖国的宣传工作。当时上海国立大专学校公费生每天的菜金，只够买两根半油条，学生吃不饱，因此提出了要求提高公费，开展反饥饿运动。

五月十九日上海国立大专学校七千多学生，不顾敌人所谓《维持秩序临时办法》的威胁，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送代表赴南京请愿。学生们高举着“向炮口要饭吃！”的横幅，有的用竹竿吊着两根半油条，上面写着：“这是我们一天的伙食金。”

五月二十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联合向伪行政院请愿示威，被军警宪兵用水龙头冲，用木棍、皮带、鞭子打。学生们坚持斗争，当场被打流血的五十多人，重伤的八人，被打的有五百多人。学生们仍高呼：“反对内战，抗议暴行！”手携手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

五月二十日惨案激起了全国学生的愤怒，各地城市学生相继罢课、示威游行抗议。五月二十四日上海大中学校七十三校罢课，直接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斗争的学生有五万多人。

反饥饿、反内战的人民运动迅速地发展。上海工人五月以来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的反饥饿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五月八日，上海一万多丝织工人举行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大游行。五月九日，法电全体工人举行要求无条件解冻生活指数的大游行。五月十日，电信局职工进行“饿工”，标语上写着：“物价高，收入少，吃不饱，做不动”。五月十二日，五大百货公司和商店的职工三千多人

举行大游行，一致喊出无条件解冻生活指数和反对内战、反对苛捐杂税、肃清贪官污吏等口号，前后参加这一运动的职工达五十万人。

学生运动已经和职工运动联合起来，人民运动已经发展到空前广阔的程度，给国民党统治者很大的震撼。国民党政府恐慌万状，只得被迫答允了学生和工人的要求，提高了学生的公费，释放了逮捕的学生，并宣布自五月份起有条件地解冻生活指数。上海人民运动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很大的胜利，党的威信大大提高，国民党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毛泽东同志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3页）指出：“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国民党地区的人民运动起了第二条战线的作用，配合着人民解放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和国民党统治者斗争。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提出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是个完整的体系，毛泽东同志指出：“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

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城市秘密斗争为辅;城市工作以武装起义,配合解放军,起里应外合的作用;人民解放军正面进攻是第一条战线,城市中人民革命运动是第二条战线。毛泽东同志完整地、全面地、准确地阐明了城市工作和农村武装斗争的关系,并制定了城市秘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上海局、上海市委和各级党委都坚决按照实际情况贯彻执行。

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给上海学生和职工,给上海人民运动以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上海局对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人民革命运动进行了总结,并上报了中央。各个党委,特别是学委,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在全体党员中进行总结,指出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蒋介石全军覆灭的日子不会很远了。要准备迎接尔后更大规模,更激烈的,半武装性的斗争。

解放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蒋介石军队的进攻,歼灭敌人一百二十万人,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我军强渡黄河,直捣大别山及长江流域。敌人的“心脏”上海、南京地区大为震动。

蒋介石为了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区疯狂地加紧白色恐怖,屠杀、迫害爱国青年、职工和民主人士,镇压人民运动。一九四七年七月,蒋介石颁布了《戡乱总动员令》,完全撕下了假面具,直接用宪兵、警察、军队,配备机动车队,全副武装,镇压赤手空拳的工人、学生。八月,国民党反动派开除了爱国学生四百多人,取缔上海学生联合会,开了二千多人的黑名单,准备大肆逮



捕。九月十九日从搜查工人运动印刷机关——富通印刷厂，逮捕电力公司职工等五人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职工进行大规模进攻，逮捕了上电、法电工会领袖，九月底又逮捕了百货工会领袖十人，并武装接收工会。

当时，上海局和市委及时地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进攻是它外强中干的表现，是敌人面临军事、政治、经济危机形势之下，害怕人民，害怕革命的表现。对于这种猖狂进攻，我们要结合各界特点，开展反迫害斗争，只要我们坚定信心，紧紧依靠群众，彻底暴露国民党罪行真相，是可以打败它的。并且以毛泽东同志对反动派是纸老虎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3页）来教育群众，鼓舞反迫害斗争的士气。

国民党反动派原来计划，第一打击六大公用事业职工，第二打击机器业职工，第三打击百货业职工，第四打击纺织业职工。但是上海工人坚决起来还击。电力公司职工首先罢工，进行反抗；法电、英电继之罢工，互相响应；百货职工也先后举行联合罢工。特别是发动了上海各业职工领袖二百多人共同签名呼吁，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停止进攻，连国民党特务头子陆京士也承认是失败了。

上海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也开展了反迫害、要民主的斗争。当军警在晚上袭击交通大学企图逮捕学生的时候，学生鸣钟集合，二千多学生排成队伍，和千余警察对峙，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并向警察进行宣传工作，一直僵持到天明，敌人不得不撤走。当法庭审讯爱国学生时，动员了学生数百人，在法庭上献旗给被传讯的同学，法官不敢开庭，并被迫宣布几天内释放逮捕学生。反动

派的迫害阴谋，到处受到打击，宣告失败。

反迫害斗争是和保卫群众组织，保护群众领袖分不开的。国民党要接收、改组工会，都遭到了反抗。群众领袖虽受到国民党百般威胁，仍然坚持岗位，坚持斗争。只有少数群众领袖，不得不转移阵地，有的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工作。反迫害斗争对组织和群众都是一次考验和锻炼。

在开展反迫害斗争的同时，地下党和群众团体整顿巩固组织，总结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经验，进行新形势和新任务的学习，训练干部，积极深入地联系群众，迎接人民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央用密电把这个报告发给了上海。这个报告是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全党都学习了这个文件，大家记得最牢的是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帝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最后决战的时刻到来了。

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海局为地下市委负责干部在南市举办了学习班，市委成员都参加了学习，刘晓同志做了形势和斗争策略的报告，刘长胜同志做了职工运动的报告，钱瑛同志做了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和党员气节教育的报告。这次学习对联系上海斗争实际，深入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戒骄戒躁，坚决沉着地贯彻中央指示起了很大作用。

学习班结束后，钱瑛同志撤离上海到香港。上海局决定利用香港环境的有利条件，举办上海干部学习班，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及中央文件，总结一年多来各条战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布置今后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工作。上海局、市委及各委负责干部都轮流去港学习，我留在上海主持日常工作。张祺、陆志仁、梅洛、马纯古、吴学谦、方明、陈育辛、周炳坤、刘峰、姜敏等不少同志都去学习过。以后刘少文、刘晓同志也相继撤离上海去香港，又从香港去解放区。

学习班结束后，市委对年关斗争做了部署。指出要针对蒋介石的镇压政策，开展反迫害斗争，但要利用年关前后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生活问题，开展经济斗争，把为生存而斗争和保卫民主权利结合起来。

黄浦江的风暴是那样猛烈！反美反蒋斗争是从不止息的。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到二月二日，五天之内爆发了三起反蒋斗争，震动了全上海。

一月二十九日同济大学学生为了反对开除学生，争取学生会组织的民主自由，拟赴南京请愿。天还没亮，国民党军警就重重包围了学校，十多个学生被捕了，学生和军警对峙着。到了下午，国民党竟然陆续增加军、警、宪、特到八千多人，警备车、铁甲车、轻重机关枪，全副武装，从北火车站到江湾，包围学校。但学生丝毫不怕。交通、复旦、东吴、圣约翰等二十几个大专学校的代表一千五百多人，前来欢送和支援。伪市长吴国桢竟亲自指挥屠杀学生，马队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冲去。马刀、长枪向学生乱砍乱打，当场被打伤砍伤数十人，被捕二百多人。学生仍然手拉着手，高呼“生要一起生，死要一起死”，进行坚决的斗争。

一月三十一日，上海发生了舞女包围社会局，大打社会局。

二月二日，国民党政府又对申新九厂罢工工人进行屠杀。申新九厂的女工英勇地和国民党军警斗争。国民党军警团团围住了工厂，几次冲击，都被女工击退。女工们在屋顶用石头、棍棒、油桶等各种杂物，还击国民党军警。国民党反动派竟下毒手，用铁甲车向厂门冲进，并开枪屠杀工人。女工们用自己的身体来挡铁甲车，惨遭压死。工人们群情悲愤，当时男工许泉福跳上卡车，开足马力向铁甲车撞去，铁甲车被制止了，但是许泉福同志也受重伤。在这斗争中，工人被杀死三人，重伤六十多人，被捕四百多人。

这三起斗争发生后，上海舆论哗然，社会动荡，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全市工人、学生、各界人士都纷纷起来支援。各业工会组成了申新惨案后援会，全市工人臂缠黑纱，纪念被杀工人。各厂都开工人大会，追悼死难工友，控诉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并捐款慰问死难者家属及受伤工人。国民党政府害怕事态扩大，不得不暂时停止全面的屠杀。

从这三件斗争来看，斗争是异常尖锐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拿出最后的手段来了，以全副武装来对付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对付女工。国民党政府动员的军警数字竟然大大超过被镇压的学生和职工：以八千军警对付三千学生，以数千军警对付徒手的女工。老百姓不怕死，用死来恐吓是没有用的。工人、学生在斗争中表现了无比的勇敢，他们对敌人有强烈的仇恨。在和军警斗争中已经发展到“短兵相接”，带有半武装性质的冲突了。

这些事件说明上海人民革命运动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人民和反动派之间决死斗争的时刻到来了。

### 三、反破坏、反屠杀、反迁移，护厂护校，迎接解放，配合接管

（1948年7月——1949年5月）

中国革命的发展，比预料的要快得多。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优势。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使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国民党政府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时间大为缩短了。上海人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最后又担负着里应外合，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光荣任务。

上海形势是非常有利的。由于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上海一带人民革命情绪空前高涨。敌人军事上的失败命运已定，政治上、经济上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甚高，党的各项政策深入人心。但是另一方面，国民党不甘心灭亡，拚命作垂死的挣扎，疯狂屠杀人民，镇压人民运动，逮捕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因此革命的人民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坚强的意志，百倍的警惕，和灵活的策略。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针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领导各界人民进行了反美扶日运动。一九四八年五四节，在交通大学有一万多人参加的营火晚会上，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整个五月里，各校学生进行各种集会活动，开展反美扶日运动，得到文化界、工商界、教育界的热烈支持。尽管国民党伪市长、伪警备司令部头子亲自上阵镇压，下令逮捕、殴打学生。但是学生们英勇不屈地坚持斗争，更加暴露了国民党

反动派的狰狞面目。六月五日，上海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反美扶日游行。光华大学、大夏大学、震旦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储能中学、青年会中学等学校学生五千多人，到外滩游行示威，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反美扶日》等革命歌曲。军警特务一齐出动镇压，甚至出动了马队。大批爱国学生被打和被捕。群众和学生包围拘留所，对被捕者进行慰问。各界人士对国民党暴行纷纷表示抗议，反对美国扶日，对爱国学生同情支援。反动派不得不陆续释放了大部被捕学生。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国民党特务进行了大规模逮捕，被捕职工达数百人。丝织业陶云山自首变节，加上个别负责同志丧失警惕，违反秘密工作纪律，致使不少工会领袖及积极分子遭到逮捕。为了避免牵连，工委系统直接有关的部分党员，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有的以后撤到解放区。四月，国民党政府逮捕了上电工会王孝和等十五人，九月王孝和同志被判死刑。王孝和同志在法庭上及刑场上表示视死如归，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就义以前，沿途高呼口号，痛骂国民党的罪恶。

当公共交通公司工人怠工的时候，国民党特务又逮捕了职工九人，钟泉周、王元、顾伯康三烈士惨遭牺牲。

党的组织发动了各业的工会领袖向国民党政府抗议迫害工人、屠杀人民的罪行。文化界、学生界、职业界都进行了同情支援运动，营救被捕者，救济被难家属。不少工厂进行怠工、罢工表示抗议，反对迫害。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上海局对于上海、南京一般形势的特点及当前的基本方针与我们的具体工作作出指示。对形势的特点指出：（一）人民解放军在大江南北两岸歼灭敌人主力的胜利战斗不会远

了,京(南京)沪解放前途是肯定了。(二)美蒋相互勾结,策动各种政治阴谋,以各种方式来保存力量,以便在解放后仍可把京沪作为反革命据点。(三)中间阶层普遍在政治上积极化,把解除目前困难的希望寄托在敌人的崩溃与我们的胜利上,把自己的利益逐渐与革命的利益一致起来,反对迁移,准备在战后恢复生产。(四)群众斗争向着汇合、向着共同统一方面急速迈进,自发斗争广泛并且与正确领导结合,基本群众斗争与中间阶层斗争配合,生活性与政治性的斗争更密切联系,各阶层的统一斗争发展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发展到解放前夕达到空前的高潮。(五)敌人的压迫与屠杀也更疯狂,这是敌人灭亡前最后的挣扎和对革命运动的报复,只要我们能提高警惕,依靠群众,善于运用策略,善于抓紧敌人的弱点来对付敌人,敌人的压迫与屠杀是可以粉碎的。(六)党的主观力量不够,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为此,决定当前具体基本方针应是积极地广泛地发展力量,巩固与扩大核心,加强重点工作,依靠基本群众,团结人民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准备接管而奋斗,一切工作都围绕这一中心。(一)开展反破坏、反出卖、反屠杀、反迁移、保厂、保校、保业、保命的斗争,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与接管上海。(二)把争取和提高中间阶层的统一战线运动与基本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建立工商、企业、学校、生产部门中的统一战线,以职工团体、学生团体、民主的文化团体及工商团体,来建立某些真正代表工商界的同业公会、教育会、自由主义学者的学术团体、技术团体或一般经济团体中的统一战线,以左派团体来建立与中间性、社会性团体的统一战线,建立一个地区范围内及几个地区相互之间的统一战线。(三)集中瓦解与动摇京沪的一切防守武装力量,包括地方武装、警察保安队和正规军,使其能

够配合基本群众，实行起义。尽可能使京沪不遭受到战争破坏，这是我们策反工作的中心一环。（四）开始对接收与管理做具体准备工作。（五）最重要的是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严格防止过早暴露力量，戒骄戒躁。

这是上海局指示的要点。全党进行了讨论，做了具体贯彻的部署。当时，刘长胜同志与我们市委研究后，又向党内做了“集中力量争取第三年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发挥第二战线的的作用”的动员，作为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的工作布置。这个布置的中心一环，强调要在总结两年来斗争的基础上，着重扩大组织，发展主观力量，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第一，集中力量加强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如对战争、对社会经济，或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有重大关系的部门，或人数众多的重要地区部门，重大价值部门，建立强大堡垒。第二，积极领导工人、学生更加广泛地以各种方式开展反美反蒋斗争，推动和加强反蒋运动。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卖国的斗争。反对空洞的号召，要与各部门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策略上要做到最大限度的广泛性，适当时候提高为集中统一、群众性的各阶层统一运动。斗争一定要充分准备，勿使斗争僵化，要机动灵活，善于改变策略，反对破坏，来教育组织，结束斗争。领导上要作平行的和几线的斗争，工会也是如此。斗争目标以积蓄力量，扩大组织，积极组织工人和城市贫民，加强党的作用，把党组与支部分开，加强党对公开工作的领导。第三，扩大统一战线与基本群众工作联系起来。抓住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来扩大统一战线，如公用事业。任何群众斗争在发展过程中要在策略上照顾各阶层利益。在学校中要争取教师、家长和社会的支持；在工厂企业里，争取民族资本家、高级职员统一行动；团结中层到上层，在斗争中教育与推



动上层分子。第四,深入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组织,进行瓦解工作。第五,动员技术人员与各种人才到解放区去。第六,保护干部,培养干部。第七,加强党的工作,了解任务,遵守纪律;每个党员要战斗化。

根据上海局和地下市委的部署,各个部门的党组织积极进行贯彻。一九四六年以来,在历次群众斗争中涌现了大量的积极分子,经过了教育和锻炼,很多人已具备入党的条件。各个部门的党组织,把以民主团体为核心的群众组织,从分散的逐渐过渡到部分的按行业的集中,从无形的逐渐过渡到有形的联合。如学生界的学联,工人界的工协,职业界的职协,教育界的教协和教联,文化界的文协,科技界的技协等,扩大群众积极分子的组织。郊区力量也有新的发展,大场、吴淞、龙华力量较强,部分控制了保甲上层机构,建立了互助合作性质的棉花合作社等,争取和组织了地方性的自卫队约一千余人。在这些积极分子中,个别地慎重地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在发展新党员工作中,学委系统较快,职委系统其次,工委系统较迟。至一九四九年二、三月基本停止发展。到解放为止,地下党员除输送到解放区及各地的以外,约有九千多人,其中抗战时期入党的约占四分之一,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约占四分之三。从职业来说,职工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产业工人约百分之四十),学生约占百分之二十,教员约占百分之十。女党员占三分之一。

在这同时,又恢复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组织和活动,进行秘密的和半公开的工作。解放前夜,将工协、职协、学联、教联、文协等群众团体都划给人民团体联合会领导。在团体里成立了党组,由地下市委直接领导。把群众团体的公开工作与地下党秘密的组织系统分了开来。

地下市委又决定撤退二千干部的计划，其中有职工一千人（内百货职工近百人），学生一千人，大部都是党员。撤退的干部，一部分是由于面目比较暴露，敌人已经注意，处境危险的；一部分是根据中央和华中局的要求，为老区建设和接管新解放城市的需要，输送科技、工程、医护等干部；也有一部分是为了培养和训练，到解放区受训的。以后又根据中央指示，护送部分民主人士到香港，并从香港转赴解放区。当时建立了地下交通机构，这一时期在上海由张征秉同志负责，各委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地下交通机构。这时期输送的多数是去苏北和山东，部分去大别山，少数有去浙东的。地下交通员冒着敌人监视、搜查的危险，冲破封锁线，机智勇敢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个别也有给敌人抓住枪杀的，如三区百货业的王守权同志被敌人枪杀英勇牺牲。在华中局领导下，建立了交通总站，由田辛同志负责。田辛同志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解放上海，一直负责上海驻解放区的交通联络工作，积极认真，做出了贡献。我们又建立了市区内的联络交通，由莫振球、张征秉、赵茅兴等同志负责。对于撤退干部的组织关系，都由地下市委用密码信件寄与田辛同志，由田辛同志转给解放区，也有一部由上海用密电发给中央转给有关解放区。在解放区，这些干部受到首长特别是陈毅同志的很大重视和关怀，陈丕显同志还专门为上海去的干部举办训练班或送进党校学习，予以培养和训练，给以鼓励和教育。以后这批干部，随军南下，大部分参加解放上海后的接管工作，一部分去西南或其它地区工作。

通过所有基层支部，全党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为解放上海的接收、管理工作做好准备。每一单位、每一党员与干部，确定具体调查任务，并指定专人综合整理。内容包括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

设备、资财,单位内的政治情况,国民党员、特务的名单等政治、经济、组织各方面的情况。一式几份,一份留支部,准备一解放就交给解放军;一份逐级上交,由地下市委汇集送交解放区。解放军渡江以后,这些调查资料都送到了丹阳,交给华东局编印出来供接管时的参考。

上海局和地下市委把上海情况、党的组织力量及部署报告了中央。

一九四八年十月初,中共中央发了个电报《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通知中说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中央会议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五百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通知中指出: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又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团结了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我党周围。现在,我们正在组织国民党区域的这些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会议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做了评价,指出“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这表现在各大城市中争取了广大的工人、学生、教员、教授、文化人、市民和民族资本家站在我党方面,争取了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站在我党方面,抗拒了国民

党的压迫,使国民党完全陷于孤立”。中央会议还决定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并将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中央的通知进一步推动了全党加紧开展反美蒋的斗争和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地下市委决定推派朱俊欣、汤桂芬、蒋阿龙、欧阳祖润、李家齐、倪复生、江怡、沈翔声、魏根宝、韩武成、杨春霖、孙明、顾良、龚长根、钱瑞华、徐明哲等同志为代表,出席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推派陈震中、张毓芬、黄震声、周蔚昌、顾光顺、沈家麟、汤兴伯、阮仁泽等同志为代表,参加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推派范小凤、何宇珍、江怡、钱李仁、江春泽、丁盛雅、郭予钧、毛和林、马林仙、陆龙祥、吴开寿、葛志成、蔡怡曾等同志为代表,出席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推派张毓芬、葛嫫月、江怡、徐明哲、卢英等同志为代表,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名单报告了中央,并由交通员送去解放区。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要统一调换身份证,并且要由伪保甲长,陪同伪警等挨户逐个分发。当时,刘长胜同志是经常在敌人黑名单上名列第一的。加之,根据解放区来的情报,原在新四军见到过我们的一个叛徒,在上海特务机关工作。为了防止被敌人认出,刘晓、刘长胜、张登、方行同志和我于七月底离开上海去杭州。由方行同志通过赵朴初同志的关系,在净慈寺避了一个星期。到我们回上海,身份证早已发过,由家里代为调换了。此后,刘长胜同志和我都通过打入保甲机构的同志,改姓换名,另外再弄一张身份证以备急需。

尽管敌人采取各种方法镇压人民,但是人民革命运动是阻挡

不住的，还是继续前进。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一千多小学教师在伪市教育局示威，反对饥饿，高呼“物价天天涨，教师饿断肠”。敌人置之不理。群众坚持了一夜，社会各阶层纷纷表示同情，机关团体、各界人士，包括周围居民、学生家长、小学生都来支援慰问，迫使敌人不得不作让步。同年十一月，教育界在抢救教育危机，争取生存的口号下，运动规模更大，发动了“总请假”斗争。统一战线范围更加广泛，包括公私学校的大批校长、教师、家长、学生都参加或者同情支持这一斗争，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淮海战役以后，党的组织指示全党，积极动员群众，迎接解放军渡江，配合解放上海的斗争。党正确地指出：抓紧当前大好形势，迅速地、勇敢地、有组织地，把已经发展起来的人民运动，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提高、集中和统一起来，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使其进一步瓦解，顺利地完成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和协助接管，恢复生产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北平解放。中央来电指示，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上海解放不需采取内部武装起义，而要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破坏，保护工厂、机关、学校，配合解放军，维持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接管城市。

根据中央指示和当时的形势和特点，地下上海市委决定开展反对破坏，反对屠杀，反对迁移，保护工厂，保护学校，保护机关，里应外合，配合解放的斗争。并决定在普遍组织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等的基础上，组织秘密的人民保安队（地下军）和宣传队。人民保安队的任务是：保护工厂、学校、机关、仓库及公共场所，不被敌人破坏；为人民解放军作向导；协助人民解放军维持地方秩序；

监视战争罪犯；瓦解敌军，收缴敌人武器。无论人民保安队或宣传队，都要宣传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中央后来还电告二野、三野各部队，上海地下党组织人民保安队的番号和臂章的样式。

随着党和群众组织的迅速战斗化，为了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地下市委决定全市党的组织按照地区分沪中、沪东、沪西、沪南、沪北及郊区等几个区，加强领导。沪东区以机器、纺织、电力、化工等业职工为中心，由陈公琪同志任书记，张祺同志分工联系；沪西区以纺织工人为中心，由夏明芳同志任书记，马纯古同志分工联系；沪南区以法电、造船、小教等职工为中心，由马飞海同志任书记；沪北区以铁路、大学为中心，由吴学谦同志任书记；沪中区以百货、海关、酒菜、机关职工为中心，由周炳坤同志任书记，梅洛同志分工联系。另有徐（汇）龙（华）区以大学和沪西郊区农民为中心，由马飞海同志联系。各区都组织了人民保安队，学生、教师、店职员和警察等分头参加所在地区的工作。

同时，又将国民党机关、官僚资本工厂企业、市政公用事业等单位的党组织，如伪市府各局机关、海关、邮政、电讯、铁路、水电煤、公共交通、伪中纺公司、资源委员会、善后保管会、人人企业公司、物资供应局、银行、报馆、书店、医院、房地产等单位，共约有五百个党员，集中建立一个配合解放军接管的部门，由吴雪之、项克方等同志负责。一方面发动群众，保护工厂、机关的财产、档案，一方面准备调查资料，供应接管需要。这个组织，在上海一解放，就马上交给上海市军管会，协助解放军进行接管。

但是敌人仍然作垂死的挣扎，不仅大规模逮捕和杀害群众领袖和革命群众，而且千方百计侦察和破坏党的组织和机关。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党的秘密电台所在地被破坏了，报务

员秦鸿钧同志从屋顶逃跑未成被获，领导电台的张困斋同志也被捕。敌人对秦、张两同志施尽了老虎凳、辣椒水、拔指甲等各种严刑拷打，但两烈士始终未吐露党的丝毫秘密。五月七日深夜，敌人在浦东戚家庙把秦鸿钧、张困斋及其他烈士共十二人枪杀。临刑之前，秦、张等烈士向国民党士兵说：“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上海，你们的末日到了！”并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悲壮的歌声，高昂的口号，把行刑士兵吓得手都发抖了。

秦鸿钧自日本投降后即开始秘密电台的工作，一直和延安中央通电报。他在白色恐怖的艰苦条件下，忠诚机智，卓越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特别是一九四八年以后，电讯来往较频繁，秦鸿钧同志经常在深夜工作至黎明。在严寒的冬夜，他裹着棉被工作，组织上给他送去皮袍子，他定要让给生活更困难的同志。开始，秦鸿钧同志由刘长胜同志直接领导，一九四六年后改由我去联系，一九四七年又改由我弟张困斋同志联系。当我们从党内认识秦、张两同志的人那里得知五月七日他们牺牲的时候，都感到十分悲痛，决心以加倍的努力来配合解放军早日解放上海。

解放区华东局和上海局的陈毅、刘晓等领导同志得知电台被破坏的消息后，都非常关心我们的安全，曾经要长胜同志等撤退到解放区。在张困斋同志职业掩护机关米店里工作的刘志荣同志，及时地把秦、张两同志被捕消息通知了我们。刘长胜同志在这样紧张的关头，看到最后的决战就在眼前，不顾个人的安危，坚持留在上海亲自指挥。刘长胜同志和我都离开了家，依靠社会关系较好的同志掩护，终于坚持斗争到解放。一九四八年开始，上海局加强了对秘密电台和机要工作人员的领导，电台的机要工作，由朱志良同志负责，成立了机要支部，由金兆珠同志任支部书记，专门负

责领导预备电台及机要交通员的工作。估计到敌人对我秘密电台可能破坏,一九四七年后建立了预备电台。秦鸿钧电台被破坏后,上海地下党仍能继续保持和中央的电讯联系。

敌人的残酷镇压只能引起人民更大的愤恨,一定要彻底地干净地消灭反动派!实际上,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工厂企业里广泛开展了保护工厂、反对迁移、反对搬运物资的斗争,中纺第一、第十、第十二、第十七等棉纺织厂、第一印染厂、大隆机器厂、中农机械厂等职工都反对国民党搬运布匹、机器到台湾、广州去。伪国防部开了十五辆卡车,到十二厂装运纱布,党组织即发动群众起来阻止,一下子从车间动员了一千多工人,要求用棉花来换纱布,否则一律不准运出。

在大场、吴淞、龙华一带郊区,也通过合作社的方式组织农民,反对国民党驻军,反对拆迁房屋,成立自卫队。

上海电讯局职工,保障电路畅通,保护机器安全,保障大家生活和生命安全,开展护局护台、迎接解放的斗争。临解放时,敌军要用炸药炸毁南翔收讯台,一个老工人立即把电门弄坏,说机器已被破坏不能再用了,这样保护了机器。敌人要抢汽车,结果被工人拆掉气针,放掉了气,使车子不能开行。海岸电台的值机员,也坚持了护台工作,敌军舰曾发出通告,命令所有船只立即撤退到台湾,要海岸电台广播,也遭到大家的拒绝。

海关的职工组织了纠察队,其中一部分由武装的港警组成,开展护关斗争。解放前几天,黄浦江上有大型海关巡舰三只,小艇三、四十只,敌军指令海关驶走,为大家所拒绝。

电话局自动机间,除闸北分局被运走一些物资外,八个分局都完成护局的任务。法商电车公司职工组织了七百多人的护厂队,



五月十日开始就进行护厂。电力、电话、电车、公共汽车、煤气、自来水等六大公用事业都组织了人民保安队，使机器设备不致破坏，并保证了解放军进入城市，水电交通电话都没有中断。杨树浦发电厂驻有交通警察大队，五月二十六日工人纠察队进行工作，使交警大队放下武器，完成了保护工厂的任务。

沪中区商店职工，百货业、酒菜业也都按地区按街道，组织纠察队，其中百货业五百多人，酒菜业六百多人，保护机关和重要据点，控制高楼大厦。人民保安队不仅维持社会秩序，而且协助解放军收缴敌人枪械，收容伤兵，救护受流弹击伤的老百姓。银行职工，也组织应变互助会等，日夜值班巡逻，保护行产，保护库存金银、帐册案卷，反对搬迁，反对破坏。

各校学生除参加人民保安队外，还组织了宣传队，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散发解放军约法八章的传单。全市人民保安队约六万人，连同宣传队等其他形式的组织约十万人。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工人协会、职员协会、学生联合会和人民保安队，还向国民党军警、官员提出警告，要他们反正起义，立功赎罪，如果继续为非作恶，定不宽贷。这种政策攻心的信件和宣传品，针对军警官员不同特点，起了不少作用。

南京解放后，刘晓、刘少文同志在丹阳根据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给上海刘长胜、吴克坚、张登、张承宗来电。电报内容如下：“上海即将解放，我地下党也即将与解放军会师，为着加强接管工作，迅速巩固我在上海的统治，以及为着顺利完成新的任务，在上海解放后，会有大批解放区的干部来上海工作，而且为着整个工作利益，是要以他们为主体的。这一会师，就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表现，是上海地下党多年来奋斗的目标，自然会予地下党同志最高度的

兴奋、鼓励，一定会做到这二种力量很迅速地凝成一片，团结得很好。但也可能由于过去工作任务不同，工作作风不同，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思想，和在各方面的地下党，在思想上准备不够，而发生若干不团结的现象，以致会影响到工作步调的一致，政策的坚持贯彻，甚至在若干场合上予敌人钻空子的机会，对于当前紧迫工作是有妨碍的。这些现象在南京或其他城市都或多或少发现过，将来在上海也会自然发生，因此我们在上海不能不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我们认为目前就应立即注意：

（一）指出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在配合与协助解放军，当上海解放后，地下党的任务即告结束，而应立即在思想上组织上与解放军结成一体，负担起新的任务。

（二）因此你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应充分具体准备，以便在解放军到达后，能迅速合并立即形成新的组织系统来统一领导，贯彻政策，集中力量，步骤一致，应付当前紧迫工作。

（三）要真正从思想上使全体地下党党员了解以解放军及解放区的干部为主体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不仅有长期政权统治工作与接管城市的经验，而且他们多年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对党的政策有研究和了解，他们是我党政治影响的代表，他们代表一种伟大力量。我们号召地下党向他们学习，尊重他们的领导并以积极态度协助他们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初入城市情况了解与联系群众的问题。

（四）根据最近中央及华东局关于城市政策及接管经验的指示，在全党中，首先在主要干部中进行教育，估计在接管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与思想倾向，预先指示，这里要特别防止左倾情绪与狭隘群众观点及经济主义倾向的发展，同时要防止无政府无纪律

的教育,为将来统一领导,执行政策作准备。

(五) 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后,应即按照接管部门分门别类,发动党员及群众积极分子组织工作组,来发动群众,协助接管,支持军事代表,执行军管会一切决定。党的支部书记,工作组长,工会党团书记,应立即与军事代表发生联系,组织党的接管工作委员会,以军事代表为主任,并须服从军事代表,此点万分重要,这点也须作思想准备,希特别注意。

(六) 在各技术部门,特别是铁路航运、国际电台、工务局、电力公司、公用局、物管处、财政、税务、海关,请准备一批熟悉情况与有技术的代表参加接管工作,以便解放军一到即可汇合,加强接管工作。”

这个电报非常及时,我们迅速向全党传达,并进行了一次会师教育和政策教育。抗战以来,毛泽东同志关于以农村根据地为主,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以武装斗争为主,城市秘密工作为辅的思想,在全党确立了起来,而且在实践贯彻中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不少同志到延安学习过,相当多的区以上的干部都到过新四军城工部参加整风学习。因此在学习会师和政策教育后,都一致拥护中央和华东局指示的精神及刘晓同志的来电,并且表示一定保证坚决做到。这次教育为配合解放军顺利完成接管工作打下思想基础。以后华东局又发来电报,通知了上海解放后的华东局暨上海市委的负责干部的名单。

五月二十四日,我到南京路四川路转角,中央商场二楼一个“写字间”(掩护机关),同张祺同志碰头。我们听到马路上人声嘈杂,在阳台上一望,南京路上有数千国民党军队游行,由西向东,再由四川路向北而去。还有卡车上坐着妖形怪状的女子,拿着小旗

子,呼喊反共口号,宣传什么“作战胜利”,但形状十分狼狈。我和张祺同志分析了形势,我说看样子国民党军队打了败仗,要逃跑了。我们迅速通知各级党委,当天晚上人民保安队都要紧急动员,全体出动,坚守岗位,率领群众,迎接解放军进入上海。

长期隐蔽在伪警察局的党员也全体动员起来,在伪警察总局、各区分局、监狱、看守所等单位,带领积极分子,监视伪警官员,保护要害部门,保管档案材料,继续维持社会治安,准备里应外合,欢迎解放军。提篮桥监狱支部在解放军还未到达苏州河北之前,就关闭监狱大门,不准国民党军警入内,保护狱内政治犯,防止敌人提走或者加以杀害。直到解放军前来接管,才开门迎入。

在上海局领导下的策反委员会,由张执一同志分工联系,取得了不少成绩。十多艘国民党军舰和飞机的人员起义。国民党方面大量情报的收集,包括沿江军事布防,上海周围军事布署等都能及时向中央报告。还获得了敌人军事密码,派人专程送给解放军。

五月二十四日晚上,刘长胜、吴克坚、张登三位同志到我住所来。大家分析了形势,一致认为上海解放在即,全党都要迅速行动起来。我住在一个“寓公”家里,这个寓公早已逃跑去广州,把房屋委托莫振球同志代管,我就由莫振球同志掩护住了个把月。还弄到一部汽车放在车间里,由陈浩同志(即金殿臣同志)当司机,紧急的时候,使用了几次。一九四九年五月,第三野战军担负解放上海的各线部队,沿着沪宁、沪杭两条铁路沿线和各条公路向上海挺进。经过外围战,经过吴淞、高桥激烈的争夺战,把上海紧紧地四面包围起来了。美帝军舰也匆忙驶出吴淞口。五月二十五日,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沪西、沪南两面攻入市区,迅速解放了苏州河以南的全部地区,完成了消灭敌人,保全城市,打了一个军事、政

治全面胜利的漂亮仗。

这天清晨，我和交通联络员等进入海关大楼，调集部分领导人民保安队的负责人，成立了人民保安队总部。海关大楼挂起了“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的巨幅标语。当我和联络员等从汉口路边门进入海关时，对面原交通银行里面的国民党军队放起了冷枪，马飞海同志从沪南区人民保安队指挥部来总部，坐吉普卡，由外滩下车进入海关时，也险些遭到枪击。我们在人民保安队总部，由海关港警担任警卫，这部分武装由海关党支部掌握。同时，我们又调了些英商电车公司的工人来担任警卫，曹传辉同志协助指挥。根据有些区委的报告，出现了散兵游勇，有的打着“江南挺进军”、“革新军”、“中国民主联军”、“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突击支队”等旗号，都由人民保安队报告或协助解放军加以缴械。我请曹传辉同志马上送银元三十枚到秦鸿钧烈士家，慰问他的家属。

刘长胜同志通知我，代表上海地下党去和解放军前线指挥员联系。我坐了一部小汽车，由艾中全同志亲自驾驶，按照约定的地点到南市新开河一个仓库下面解放军的指挥所。当时会见了二十七军负责人聂凤智同志，我把上海党的准备工作简单做了汇报，他和我取得联络后要我迅速离开，因为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枪弹达达地打在仓库墙上，炮声不断地吼着。他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司令部的名义，开了一张出入证给我，好通过解放军岗哨。

五月二十五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苏州河南先行解放，经过两天迂回的战术，激烈的巷战，群众性的攻心战，以及敌人内部刘昌义的反正，我军从南向北歼灭顽守在苏州河北各处的敌人。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全部解放。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历史上空前的百万雄师渡江作战，到五月二十七日淞

沪作战结束为止，先后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南昌、武汉等大中城市，歼敌京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的四十三个整师及其它部队，共三十八万六千余人。

五月二十七日晚上，华东局进驻上海原圣约翰大学。陈毅同志为首的华东局领导同志，接见了刘长胜同志和我等。我们当年在淮南根据地黄花荡新四军军部见到过陈毅同志，他当时是新四军军长，现在他是三野的司令员，上海解放后是第一任上海市市长。他魁伟的身体，英姿勃勃，爽朗的性格，生动的语言，是那么可亲又是那么可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亲切地热情地和我们握手，并对刘长胜同志和我说：“哎呀，我们多么关心你们的安全呀！”我感动得要流下眼泪。

五月二十八日起，华东局在原国民党励志社（现瑞金宾馆）办公。每天晚上陈毅同志亲自听取军政、社会各方面情况的汇报，总要到深夜或者黎明才散会。时间太迟了，我和张祺同志等，就睡在会议大厅的地板上（铺有地毯）。解放已三十年了，这个情景犹历历在目。

陈毅同志一到上海，就向我们了解宋庆龄先生的下落，并决定马上接到安全地方。五月二十八日，又在中国银行大楼接见上海各界人士，包括工商界在内。五月三十日，在大光明电影院召开了上海总工会的筹备会。陈毅同志十分关怀科技界人士，还到科技总支讲了话。

陈毅同志每年清明前后，总要到烈士公墓去悼念为解放上海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在龙华公墓，埋葬着数百位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人民解放军，很多连姓名都没有保留。同时又埋葬着自建党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在地下斗争中慷慨就义的烈士们，他们的血都

流在一起，为着解放上海，为着解放全中国。烈士们的牺牲精神是永垂不朽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有人刮起一股歪风，说是清明祭扫烈士墓是“封建思想”，干部和群众去祭扫烈士墓还不准见报。当然林彪、“四人帮”是更加仇视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大搞打砸抢，连烈士墓也要“砸烂”，打倒一切，连烈士也要打倒。在纪念解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怀念人民解放军三野司令员、挥师南下解放上海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怀念半个多世纪以来，为解放上海而英勇献出生命的成千上万的烈士们！

黑暗过去，光明到来。上海永远是人民的上海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社会主义新上海建立起来了。帝国主义的“冒险家的乐园”永远不复返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致电三野陈毅、粟裕、谭震林诸同志和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全上海的共产党员、工人、学生、各阶层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同胞，热烈祝贺上海解放。指出，中国和亚洲的最大的城市，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上海，已于二十七日解放。我人民解放军在此次作战中俘敌十余万众，纪律良好。上海各界人民积极与我军合作，使蒋匪破坏计划大部失败，全市秩序迅速恢复。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中指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的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移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

全之一。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说过：共产党能够把上海接管和改造得好，党度过了最后的难关。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上海解放和上海地下党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



# 郭化若将军谈上海之战

本刊记者

去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曾访问当时在沪疗养的郭化若将军。他是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九兵团的政治委员，亲自指挥过解放上海的战役。当我要求他为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写一篇以此为主题的革命回忆录时，他一再谦辞。他恳切地说：“首先，手头尚有几篇文章预约要写，抽不出时间。其次，我还在病中，应遵医嘱疗养。但我们仍可以谈谈往事。”

我说：“记得一九五〇年二月初华东军政委员会举行会议期间，我曾经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访问过郭将军，当时谈渡江作战和解放上海之战的经过，曾刊载于二月八日上海《新闻日报》，今天我还带了这份旧报，可供参阅。”他很高兴地接读了这份旧报，笑着对我说：“当年的新闻报道，如今成为历史资料，就是看了那张我的照片，几乎不象是我，那时还年轻啊！”

接着，我们就纵谈解放上海之战。当《专辑》发稿之日，特综合两次访问所得，扼要记载如下：

解放上海之战具有它的特色，不同于北京和天津的解放。当时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天津经过激烈的战斗，一部分市区毁于炮火，但上海虽经激战，市区却未受破坏，或者说破坏较少。正如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新华社社论所指出的：“上海的革命力量和

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

毛主席曾指示我们：“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城，而且要做到政治进城。”当南京解放之后，党中央要我们及时总结解放北平、天津和南京三大城市的经验教训，运用于解放上海之战。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晚上，朱总司令发出命令，我军在东起镇江、西迄九江之间，展开威武雄壮的渡江作战。不到二十四小时，百万大军横越大江天堑，在敌前登陆，破竹前进。

三野的九兵团是在芜湖西南的鲁港、荻港之间渡江的，登陆之后即直扑南京，配合友军作战，解放了南京。那时蒋介石亲自出马，收拾残兵败将，企图在上海作最后的挣扎。伪京、沪、杭卫戍司令官汤恩伯一面奉令顽抗，一面加紧搬运物资，搜劫勒索，屠杀人民，实行白色恐怖，妄图破坏并毁灭整个上海。我军在太湖西岸，接到紧急命令，分兵两路，火速前进，冒着黄梅雨季的大雨，用十天的时间，急驰千里，去抢救上海。一路上，奋勇追击敌人，部队中不分干部和战士，大家都是徒步行军作战。在我们指挥员中间，有当时年过五十岁的军长和六十岁的副军长，他们也没有马骑，跟普通战士一样，在风雨泥泞中滑倒又爬起，日夜行军，忍受了一切困难和疲劳。江南的田间小路，特别泥泞难走，所有重炮、弹药和大量辎重，几乎不能用牲口驮运或车运，全靠抽调一部分步兵用人力扛运。每想到为了达到抢救上海的紧急任务，早一天同上海的父老兄弟姊妹们见面，就没有什么艰难险阻可以挡住我们几十万大军的加速前进！

五月十二日开始在上海外围作战。首先在市郊的杨行、月浦、宝山一带，碰上敌军事前构筑的现代化防御工事，象这种用钢骨水

泥筑成的工事，在上海周围就有三万多个。当时由于急行军和道路泥泞，炮兵部队还没有及时赶上，开始攻击前进时就不免费力。不久，炮兵部队排除万难赶到，我们即改变了进攻的战术，进展就比较顺利。

解放上海之战，我们决心要做到打得好，进得好。所谓打得好，就是要通过这次战役，表现我军无坚不摧的强大威力和高度的战争艺术。对付现代化防御工事，就得集中使用炮兵，发扬最炽盛的火力。例如打沪西郊区七宝镇后的一个地堡，我们就一次使用了三十多门大炮的火力把它彻底摧毁。进攻浦东的高桥，我们使用了三百多门大炮，以最集中的火力来歼灭敌人。当时停在高桥附近黄浦江上的，原有十二艘大小敌舰正用海军炮火在向岸上轰击，想显显他们的威风，但当我军集中炮兵加以还击，一次就击毁他们七艘之后，那其他的五艘就狼狈而逃。集中使用炮兵，对摧毁对方的防御工事，打开步兵冲锋的突破口，迅速歼灭敌军，解决战斗，起了很大的作用。上海郊外日夜不停的隆隆炮声，也使当时驻守在市区的敌军心惊胆战，士气消沉，这对后来瓦解敌军，促使他们及早放下武器，也起了一定的效果。

人民的子弟兵对上海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工厂、仓库、学校、医院、商店以及铁路、机场、港口设备，担当着保卫的庄严职责，决不能使他们受到破坏或损失。因此，从外围打进上海市区，就不再使用炮兵了，只能靠步兵的勇敢与机智，使用步枪、机关枪等轻武器，以至用刺刀短兵相接，付出血的代价，去消灭敌人，解决战斗，把进入市区这一仗打好。这就象在磁器店铺里捉老鼠那样，既要抓住老鼠，又不能损坏了最易破碎的磁器。

正是这样，从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发起总攻，到二十七日上午九

时，我军在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人民保安队和上海各界人民的密切配合下，经过几昼夜的浴血奋战，粉碎敌军的最后抵抗，俘敌十余万众，全部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

所谓进得好，就是要求人民子弟兵以实际行动，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上著名的大城市中，让中外人士来考验我们的严明纪律和政策水平。记得在进市区之前，我曾经在真如召集的部队干部大会上，详细对他们讲了党的城市政策和外交政策，反复进行纪律教育。我说，部队从长期的农村环境中转入象上海那样情况极其复杂的大城市，确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又要在一面作战、一面接管的情况下，担负起繁重的警备任务，这不论从生活上、工作上来讲，都有个适应不适应的问题，还有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困难，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努力去解决。要善于适应新的环境，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

部队进入市区，适逢连日大雨，经过几昼夜冒雨作战的部队已感到极度疲劳，但为了避免惊动群众，各军军部设在街道上，指挥部队在马路两旁就地露营，谢绝进民房或厂房休息。上海市民亲眼看了，极为感动。为了不打扰群众，部队的战马和车辆一律留在市郊，我们的饮水和饭食都要从三、四十里之外运来，只能喝冷水、吃冷饭，甚至大小便都要依次序跑步到黄浦江边解决。直到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才陆续进入指定的宿营地，也还是吃“战斗饭”（用子弹箱装饭，钢盔盛菜，炮弹壳当饭碗，使用的都是战斗工具，战士们就称之为战斗饭）。市上虽已开始交易，但因货币比值未定，当时只能下令部队不准购买物品，部队每餐只能吃从江北带来的少许咸菜。晚上睡的是水门汀，盖的是麻布袋。有位战士写了一首枪杆诗，说：“想上海，进上海。进得上海得到两条麻布袋，又有铺，又

有盖，晚上睡觉怪凉快！”这首诗足以反映当时的战斗生活。许多人在我军岗哨面前丢钞票，投钢笔，送汽水，送香烟和饼干。绝大多数是出于人民良好的意愿，但也有少数人是借此作别有用心试探，甚至还有坏人以女色来勾引，但我军战士无动于衷，使上海各界人民在近百年来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子弟兵，确实做到秋毫无犯。当时，即使是英国人所办的《字林西报》也盛赞我军纪律良好。

上海解放初期，我军在市区设岗警戒共有五千多处。凡工厂、学校、仓库、车站、码头、公司、银行、医院和其他公共建筑都严密看守，妥善保护。同时，由人民保安队和广大群众配合搜索散兵游勇，先后收容了一万八千人，另外捕获了土匪、特务两千多人，单从战斗意义上讲，等于歼灭了敌军一个军。在市区还清除了敌人所埋下的地雷达两百个以上，确保全市公私财产没有遭到破坏和损失，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迅速恢复了生产。

解放上海之战打得好与进得好，都是由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扬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通过艰苦奋斗而取得的伟大胜利。

三十年前，我们取得伟大胜利的史实，在今天我们力争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中，仍具有重大的教育和激励的意义！

（陆 诒记）

# 铁道工程兵进军上海

黄 逸 峰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是上海这个中国的最大的城市一百年来受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的统治，终于最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了蒋家王朝的残兵败将负隅抵抗之后，胜利解放了。从此，上海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上海。

我四月份离开天津，奉中央命令调到华东接管铁路，经过南京到了丹阳，往华东局报到，接受了任务，请示了工作。于五月初到了苏州，与华东局调派接管上海铁路局的干部同志见了面，组织他们学习，并会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粟裕副司令员请示工作。粟裕同志面谕：“华东为了抢修铁路，成立了一个铁道工程团，该团官兵正在沪宁线上青阳港车站附近抢修青阳港铁路桥，现在把这个铁道工程团拨给你指挥。”我于是接受了抢修青阳港铁路桥的任务，以后我就住在苏州，等候军事上夺取上海的胜利。

当时沪宁线的火车，从南京只能开到苏州，苏州以东就是前线的范围。眼看上海即将解放，必须督促铁道工程团加紧抢修青阳港铁路桥。根据华东局的通知，上海可望于五月下旬解放，准备接管上海的干部，均分乘汽车陆续奔赴上海外围。青阳港铁路桥便桥于五月二十五日抢修完成，经过试行，运行良好，并于苏州调派一部分铁路人员赴苏州站以东各站检修线路和通讯设备。

我率领一部分干部及铁道工程兵于五月二十六日晨八时乘由苏州站开出的一列专车，沿途勘察和检修线路与通讯设备，并扫除地雷及蒋军布下的障碍，于二十六日晚十时左右抵真如车站。当时车站上空无一人，我即令一部分随行人员下车，到车站及附近农村，了解车站以东的战事情况，并找寻铁路员工，结果，找到好几位藏在老百姓家里的职工、站务员、电报员和扳道员，最后找到了站长。他们看到我们都很惊异，我即简单地把战事情况向他们讲了，并告以我们是到上海接管铁路的，要他们回车站恢复工作，争取早日通车。当时东边不时仍有枪炮声，断断续续，他们听了还有些迟疑，感到战事一停立即通车似乎不大可能。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宣传和说服工作，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把真如车站的工作担当起来，并主动与麦根路旗站通了电话。据麦根路车站个别职工报告：现在北站仍有激烈战斗，火车暂时还不能东驶。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吃晚饭，于是派人在真如附近农村老百姓家里，商买了一些蔬菜烧了，大家饱餐了一顿，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通夜未眠。

二十七日凌晨三时后，我们又得到麦根路旗站的电话说：北站的激烈战斗已近结束，只有稀疏枪声，国民党的败军纷纷抢便衣逃往他处。我即下令开车，沿途进行扫雷，排除障碍，到达麦根路站时，一轮红日已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在麦根路旗站，我与北站的调度室职工通了电话，知道北站的残敌已被消灭，从麦根路旗站到上海北站沿铁路线已通行无阻。于是，我在麦根路旗站调动一部铁路摩托车，为我们这一列专车开道，这一列车经过的铁路两侧马路上已熙熙攘攘，人来人往。马路上的群众，看见这一列车从西边开来，这是战争以来首次开往上海北站的第一趟列车，车头的烟囱冒着青白色的浓烟，汽笛长鸣，列车上是穿着人民解放军服装、荷着

枪枝的接管铁路的干部和工程兵。他们都充满着无比喜悦和兴奋的心情，高呼“欢迎人民解放军！”“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

列车在晨光曦微中徐徐开进北站的某号月台。月台上已拥有大批群众主动地来迎接我们，“欢迎”“欢迎”的热烈呼声，使整个车站充满着极其欢乐的气氛。在车站的铁路职工，已经知道我们是来接管的人员，地下党员沈震光同志等也在月台上和我们亲切会合，相互作了自我介绍。我们当即下了火车，经地下党同志带领，把我们一部分同志迎进局长办公室，我即将事先准备好的布告，要大家分头张贴。在九点时，我即召集上海原铁路局的职工——一部分是留下的机关职工和北站的职工约五百余人在路局礼堂开会。我宣布即时接管铁路局，原国民党铁路局的一个副局长将铁路局的印亲手交给我。我在大会上宣布军委铁道部的命令，成立江南铁路局（后改上海铁路局），并作了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讲了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接管任务和对铁路职工的希望。同时，通知全体职工照旧上班，并争取次日沪宁和宁芜全线通车。随即派专人首先接管了调度所，初步排了临时行车时刻表。调度所里有些都是我过去在铁路工作时的熟人，他们都热烈地接受了任务。沪杭线的火车首先开到松江，因为沪杭线的石湖荡铁桥已被敌人在逃窜时炸毁。我即调了一部分铁道工程兵抢修铁路桥，在工务处指定了专人成立抢修工程处，限令早日完成架设便桥，以便沪杭全线通车。铁路局大楼是坚固的水泥钢筋建筑，在战争中是敌人负隅顽抗的堡垒，解放军以猛烈的炮火攻下，大楼上留下了大量尸体和少数伤兵，还有些武器，打扫战场工作，尚未完全搞清楚，我即动员铁道工程兵一部协同作战部队一起把大楼战场残迹，加以整理清扫。当时因战火刚停，车站和周围的秩序比较混乱，一些残兵游



勇和坏人企图乘机浑水摸鱼，而警卫铁路的部队还未到达，即由铁道工程兵担任临时警卫工作。这一时期，铁道工程兵的任务是比较繁重的，也是值得表扬的。

战争期间，很多外地人员滞留上海，战事结束，纷纷要求早日通车，得以还乡。当经党委决定于五月二十八日在沪宁线、宁芜线先行通车，沪杭线开区间车。这一天的上午，沪宁线第一趟列车，满载回乡人员开往南京，沿途各站均停靠。许多因战事而滞留上海的人，回到了他们的故乡，与他们的亲人见了面，可以想象，他们欢乐愉快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第三日下午乘汽车到上海来的铁路接管人员全部到达，即分赴预定的各个接管单位，紧张地开始工作。

# 解放上海的浦东之战

徐 援

淮海战役时，我在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三纵队三十九师一一五团工作。渡江时统一部队番号，改为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七团，我任团长。渡江后，我团奉命追击逃敌，并进行了解放上海的浦东之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现将我团横渡长江、追击逃敌和浦东战斗的经过回忆如下。

## 一、渡江前的准备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们的部队进驻到江苏省海安一带，我团住在海安县西胡集附近，这时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我们在那里住了二十余天，进行休息整顿。部队的休息整顿，除改善生活使战士们吃饱、睡足、养好身体而外，还有许多事要做，如医治疾病，突击治疗轻伤员，修理、补充各种军需物资等。作战部门要组织座谈和调查研究，写作战报告。政治部门要深入连队调查了解战士、干部的思想情绪和存在的问题，以便进行教育，研究解决。供给部门计点上缴和请领各种物资。总之，部队在战斗空隙中休整，也是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做好必要的准备。

我们部队休整了二十余天以后，为了做好渡江的准备工作，三月上旬，奉命前进到黄桥以南的广陵一带。从海安胡集一带行军

到广陵，约有九十余华里，走的都是大路，都是白天行军。国民党的飞机，在淮海战役时，日夜不停地来来去去，气势汹汹，可是当我军靠近长江江岸时，敌机反而少了，有时几天见不到一架。我们两路纵队，长长的行列，浩浩荡荡向广陵一带行进，真是饮马长江了。

战士们经过二十多天的休整，恢复了体力，雄赳赳气昂昂，走起路来也更加轻快矫健。初春的阳光，照在人们的身上很舒服。部队干部也不骑马，在战士行列中一起走，有说有笑。来自北方的战士沿途欣赏着南方的风光。我呢，向来好打猎，在路旁田野里见到野鸡，我和警卫员一路上打了四只，师长赶来了，我给了他两只。我们这次行军是非常愉快的。

到达目的地安营以后，师首长即召集我们去参加会议，会议没有布置具体任务，只是起个打招呼、鼓士气的作用。这位九十三师师长傅少甫，四十余岁，中等身材，文化水平虽不高，但他对革命赤胆忠心，打仗有一颗突出的雄心，总是要求自己的部队打主攻，总想作第一梯队。这次抢先开会，就是从这个思想出发的。所以在会上他总是问：“渡江我们争取第一梯队有信心吗？”“我们师谁愿当第一梯队？”“哪个团有作第一梯队的思想准备？”会议开得比较活泼，三三两两都围绕渡江的问题谈论着。我们驻在广陵一带十几天，军部召开了研究渡江的会议。据师部传达，首先介绍了长江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并介绍了对岸敌人防务概况。江的对岸，蒋介石经营了三个多月的防御工事，钢筋水泥的大碉堡很多，外面还布置了铁丝网、竹签、钢轨拒马。在靖江对面的是江阴城，靠城的石山，也叫黄山，山上有炮台，有要塞炮，就是有名的江阴要塞。它是长江的重要门户，蒋介石在此设有重兵。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里过江，首先占领江阴的黄山炮台，下一步的任务，待过江后由军

部统一部署。此外还传达了如何部署练兵。当我们把这次渡江的任务、敌人的情况和部署练兵的要求传达到全团时，却遇到出乎意料之外的思想阻力。原因是我们的战士大多是北方人，不习水性，对山地平原作战有经验，也有把握，而面对滔滔大江，如何作战夺取胜利，思想上却存在着某些顾虑。至于敌人的工事、炮台要塞，战士们是不怕的，他们说，只要过了江上了岸，打仗我们包下了。我们团部掌握了战士们的思想情绪以后，经过分析研究，认为政治工作走在前头，加强渡江必胜的教育，下定解放江南人民的决心，转变这些思想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实际上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对战士们才有稳固可靠的说服力。为了正确地了解一下大江沿岸的实际，有一天早晨，北风大起，天气骤变，我一个人骑着马向江边驰去，进行了实地调查，弄清情况，回来后进行了宣传教育。这些实际情况较有说服力，从而解决了战士们的一些思想问题。

有一天师部开会，研究渡江的准备。我们提出，北方战士怕水，最好能准备一些救生衣。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解决少数，千军万马怎能配全呢？大家想办法，还是南方同志想出办法，说毛竹有很大的浮力，将毛竹做成三角形套在腋下，人在水中可以不沉。经过试验效果良好。于是动员群众搞了几千个毛竹浮水圈。有些战士怕晕船，经向上级提议，准备了一些八卦丹。于是我们组织了水上练兵。船有大有小，小的可坐十余人，大的可坐七、八十人，都是木帆船。为了练习射击，我们经过研究，大船上装了几个沙袋，既可以压船，又可以作掩蔽，更可以依托射击。因为船是动的，射击的目标会在眼前摇晃不定，有了沙袋依托总比较好些。我们练兵，日间在河港里练习，夜间也到江边敌人看不见的地方练习。在战士们轰轰烈烈练兵期间，军部、师部首长都到江边实地观察地形，研究渡

江的战术。

当时蒋介石表面上已“引退”，由李宗仁当国，派人在北京与我党谈判和平条件。这消息在我们部队中知道的人不多。约在三月下旬，听说和谈可能成功，但不久中央下令，命令我们的第三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靠拢。因美帝派了兵舰还有陆战队到了上海，我们进攻上海，他们可能参战，如果美帝参战，我们就集中两个野战军的强大力量，把蒋、美军一并歼灭。这个消息的传达，全军倍加兴奋。四月间又传达了上级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过江后的群众纪律和群众工作，并指出江南没有进行过土改，群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受其欺骗宣传，对我们还不了解，我们不能用北方老解放区的情况来套江南。江南人民的风俗习惯与北方不同，如对老少男女的称呼等，必须事先学习。同时，还宣讲了毛主席的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强调了进城的纪律和党的城市政策，请示报告，以及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缴获归公。此外，还要求我们全体指战员坚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江南有江南的特点，也有新的困难，如江南雨多路滑，水网多以及敌人的破坏等等，给我们行军作战会带来一些困难，因此我们要有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

## 二、横渡长江

四月上旬部队进入紧张阶段。因上级传达，和谈可能决裂，要准备迅速地进行渡江战斗。接着军部即布置各师、团都要召开渡江誓师大会。因当时受客观条件限制，大会只能以团为单位进行。军、师部首长和机关分头派人参加。一天下午，全团都集合在一个空场上，团长、团政委、团政治部主任及师首长都讲了话，各连

都派代表发了言。战士代表则纷纷表示决心，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一定打过长江去解放京、沪、杭！誓师大会开完后，又开展了立功运动。过去已立过战功的，决心要带头再立新功，未立过战功的，保证渡江立功。在营以下各党支部也都召开了党员大会，动员党员研究渡江过程中，如何带领群众，如何起保证战斗胜利的作用。当时在淮海战役中发展的党员，未及举行入党宣誓的，在渡江前补行宣誓仪式。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战士都反复开会动员，动员会议足足开了一个多星期。

四月二十日，渡江的命令下达，署名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命令的大意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和平，我们要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并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立即下令大军趁日渡江。当天军部和师部把渡江任务传达到我团，我团是师的第一梯队。二十一日上午我们召开了排以上的干部会议，进行动员。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打过长江，立足后即进攻江阴城，攻下城后，下一步听命前进。

当时据前线记者综合报道：我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横贯一千余里的战线上，粉碎了敌人的防御体系，横渡了长江天险。西起九江（不包括九江），东至江阴，均系我军渡江区域。从四月二十日起，我中路大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间国民党防线，二十四小时已渡过三十万人。二十一日傍晚，我西路大军开始渡江，从九江到安庆，有无数突击队同时奔向各港口，有秩序地登上预定的快船……。与此同时，我东路三十五万大军，横渡长江下游宽大江面，直捣敌人的巢穴，迅速切断京沪道路，猛追逃敌。

当时的情况确是这样。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师长在前线指挥所又叫我们去重申了命令和任务。回到团部向干部传达后，于下午七时全团即向江岸出发，上级指定中天生港是我团的集合点。我和团政委及各营长先走，首先到中天生港看船。中天生港是长江口的一条河流，在长江入口处河较宽，水较深。但在上流（即港的里面）水势较浅。当时为了防止敌人飞机侦察发现，破坏船只，所以师部的船只都在中天生港里面。港的上流受潮汛影响，潮来水深，船只活动方便，潮落水浅，仅可浮船，行动较难，如果是大船那就更难行动。当我跑到罗家圩，正是退潮的时候，天已黑暗不见五指，渡口的船只虽在向外开动，但是很慢。我们再向前走，到达中天生港时，团直属队还未到达，经多方联系，到深夜十二时才全部集合好。可是港里的船只还没摇到。我们上船处距江口约有三、四里路，由于退潮船摇不出来，直急得人眼睛冒火。电话向师部报告，师长指示，叫我们自己找船过江。于是我带二营及团机关跑到中天生港港口，只见渡江回来的船很少，等到二十二日凌晨二点，回来的船多了，但一个营的人坐不下，又等了一小时，我们控制了二十余只船，又去向师部报告情况，师长说：“上船走！”于是我首先跳上船，二营干部、战士也上了船，团参谋、电话员、通讯员也都登上船来。于是二十余只船一起扬帆出发了。我坐的是一只大船，船老大姓姚，他告诉我说，这是只航海的大船，别看它出口慢，到了江中就很快。船出港口后，船老大一声“扯篷”！当时是东风，船到江中行驶如飞。这天夜里我们的炮兵整整打了一夜的炮，炮弹大部落在对岸的黄山炮台上，山上发出片片的火花，这就使我们的船得以顺利前进。对岸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我想上了岸先抢滩头，只要在岸上取得立足点就是初步胜利。天快亮了，风也逐渐小了，船将

傍岸了。距离南岸约百余米，船老大已落帆停驶，对我们说：“可以下船了”。我便率全船战士跳下水，下船处水深还有一米左右，全船人员涉水上岸。一上岸才知道岸上已没有敌人了。于是我们按照预先约定的目的地——林家庄等待队伍会齐。等了四小时，我团的二营战士全部到达，别的师、团的战士很多，经过联络，才知道二七八团也到了一个营，九十二师到了两个营，是该师于参谋长带领过江的。我们军队有个习惯，如果许多建制的部队同时到达一个地区，自己的直接上级不在时，可公开推举级别较高的干部作临时指挥员。于是我们大家公推九十二师于参谋长作三十一军渡江后南岸部队的指挥员，负责与别的部队联络和指挥。至此，我们才知道蒋介石的军队在沿江防线上，由于我们大军连日冲击，已全线撤退。所谓“长江天险”是阻挡不住人民解放军的，是挽救不了蒋家王朝彻底覆灭的命运。我们部队第一步的任务，到此胜利完成。我在横渡长江的船上，曾作过一首诗记述当时的情况：

“舟稳东风缓，云阴月未圆。三军奔对岸，万炮掠前山。  
午夜临深水，黎明抢险滩。飞船擒虎将，拔剑舞江天。”

### 三、四百里追击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小雨，下午天晴。中午十二时于参谋长叫我去，他说：“二十九军已联系上，长山东的小山头已于上午占领，香山被敌五十一师反击占去，现已夺回。你团的任务是负责警戒江阴城的敌人”。原来二十九军就在我军的左侧，他们的任务是过江后攻占黄山要塞。所谓长山、香山即黄山要塞的一些小山头。敌军虽全线溃退，但还留了几个比较可守的据点，负隅顽抗，牵制我军，黄山之敌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奉命警戒江阴城，当时还不了解确实情



况。于是令二营分散到胡家埭集中。走了四小时全营到达。当时还准备攻打江阴城，曾布置收集攻城器材，并组织干部去观察地形，了解情况。据当地人民群众报告，江阴敌人将大批物资用木船运往无锡。我即派二营干部潘寿全率一连去追击。当晚八时左右，接到我团刘政委来信说：上级告知，江南沿江防线的敌军，已作战略撤退，指定我团前进的地点是金家村，着我团到指定地点。同时，于参谋长也来信告诉我，要二营到金家村警戒南闸之敌。南闸是江阴城南的一个大镇。这夜由于几天几夜没有睡觉，我看了刘政委和于参谋长的来信后，倒头便睡了。团书记史孝先送二营报告来，唤醒了我。报告说，江阴城敌人南撤，并说前方部队已发出信号。但我被睡魔缠住了，没有立即行动，给敌人安全地逃走了。第二天(二十三日)早上弄清了情况，赶紧集合部队到金家村去，可是金家村未找到，只好住在横塘里。潘寿全率一个连追击，结果缴获了十船物资并俘敌百余。二十二日夜全军都过了江，横塘里住不下，我团率一营住在板桥镇。二十三日上午师长、师政委也到达了。敌人作战略撤退，大批的部队是走不赢的。于是我军展开了十二天的猛烈追击战。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军部命令全军扑向武进。当夜到达武进城东的周家村。二十四日拂晓进入武进城。武进已无敌人，于是下午又指向宜兴县的和桥镇。夜里大雨，进到重桥已不能行，遂在重桥宿营。二十五日下午到达和桥镇。我们住在和桥镇东边的东北沟一带。二十六日凌晨四时准备出发，刚要集合队伍，师长来指示说：路线另有变动，要我团经潘店一带到长兴。师部已经出发了，要我团在师部后面跟进。当时我们在地图上还未弄清楚路径，但必须急追师直属部队，两个多小时奔走了四十余里，到宜兴县终于赶上

了。出城后稍事休息，师部令我团跑步到师部前面作前卫队。我把队伍带到师部前面行军，经潘店、插长兴，在潘店吃早饭。饭后见师长，他要我团经黄泥坝到湖滏镇吃午饭，也就是要我团于二十六日午前到达湖滏镇。湖滏是个大镇，我们在吃饭时遇到一个有趣的人物。这人是个医生，三十来岁，白净的面孔，他自称有高级知识，对我军没有畏惧。还说吃饭非米饭不行，每餐都有鱼，但在特殊情况下，有酱油汤下饭也可。意思是这里是鱼米之乡。我们刚到江南，而且又是突如其来的，老百姓多数存在观望态度，不大讲话，我们遇到这个人滔滔不绝还是第一次。午餐甫毕，师长率二七八团到来，遂催促各营集合出发，刚出村，见师部同志和二七八团干部、战士在村南吃饭。在我们前面有二十八军，阻止我们前进，我即把师部写的行军路线给他们看，他们不听。师部知道后，派人去联系，要我们暂行停止前进。当夜宿于湖滏。次日（二十七日）早晨出发，到合溪休息吃午饭。湖滏已接近山地，合溪一带全是山区。路上我们看到毛竹成林，人工培植得象队伍一样整齐，每棵毛竹上都标有阿拉伯字，可能是以此作为成材的标志。竹林片片相连，河中水清如镜，山上流水潺潺，山花盈野，绿草如茵，风景宜人。祖国壮丽的河山，今天是属于全国人民了。

我们行军到林城桥，已是晚上九时，夜宿林城桥。路上蒋军的散兵很多，我们收容了一部分。据当地居民谈，蒋军于昨天乘船去杭州，是路警部队。二十八日下午奉命趋泗安镇，进行追剿。下午六时到达该镇，各营安顿休息。泗安镇也是个大镇，分上下泗安，横约七华里，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师部驻下泗的西部。二十九日早晨天阴，少顷，即有倾盆大雨，雨是阻止不了我们追剿逃敌的决心的。凌晨四时，师部通知我团准备行动，并将部署告诉我们，二营左翼，一

营右翼，三营为二梯队，合击独山镇。我们于五时出击，迅速前进。当我团二梯队刚到朱大庄时，师长疾传停止令，命令我带三营南进，因发现一股敌人南去。于是我率三营和团直属机关部队一起前进，一、二两营已分头去独山镇进行合击了。上级发的地图已用完了，我们只好听枪声摸索前进。到达李家桥地方，雨下得很大，远看有一股部队向东而去，这与昨晚老百姓谈的情况符合。当时虽展开部队，准备堵击，但还有疑虑，我吩咐部队到近处探明情况再开枪，结果却是我们的二十四军队伍，几乎发生误会。我们在李家桥吃午饭，饭后分头清剿山区逃敌。经过围剿，俘敌八十，获战马七匹。雨仍不停，遂宿于附近村庄。三十日回泗安。一、二两营都胜利归来，二营俘敌八百，获战马七十匹，一营的缴获也与二营差不多。夜宿泗安附近的大泉庄。五月一日行军到庙桥（地图上溪桥）。五月二日进到蜀山。在蜀山住了三天，进行整顿工作。至此，追击逃敌和探查山区的任务已完成了。

五月三日，南下的部队解放杭州。南京、杭州都解放了，在京沪杭地区内，只剩最后一个蒋军顽抗据点上海了。于是我大军集中围攻上海。我军在蜀山一带整顿三天后，即奉命东指上海，但去上海必须绕过最大的湖泊——太湖。太湖面积很大，南北约一百五十华里，东西约一百二十华里，西部的半圆形还比较整齐，东部则有不少河沟，密布如网。我军进攻上海的出发点，是嘉兴、嘉善，正好要绕过太湖一周。我们由泗安一带绕太湖东进，五月五日冒雨行军，夜宿野庙。五月六日到达无锡，宿于南门外。当时工厂已全部开工，电厂发电，夜间灯火辉煌，物价稳定，市面正常。七日由无锡到达苏州。在无锡到苏州的路上，白天行军，突然敌机空袭，我军略有伤亡。夜宿于中桥。八、九两日在中桥休息。军首长传

达了渡江后纪律、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九日早晨四时接兵团命令，立即向上海进军。

#### 四、解放上海的浦东之战

我二七七团五月十日进驻吴江，十一日到达外角。在外角，我们传达了上级进攻上海的部署：华东各军除三十一军外，其他各军负责对上海市区的正面进攻；三十一军的任务是迂回黄浦江以东，消灭浦东之敌，截断残敌向东海逃走之路。我军的第一梯队是我九十三师，我师的先头部队是我团。进军的第一步是嘉兴、嘉善，进一步打向上海以南的南汇县地区，到南汇后再待命进军。传达完了，于下午六时即向嘉兴出发，行八十里，拂晓到达嘉兴以东的德丰桥。次日又进至嘉善以东的太平桥。夜里大雨，敌人又破坏了公路上两座大桥，前进为水流所阻，遂止于嘉善城的东关。是夜雨停后继续前进到三旻镇。五月十五日到达南汇县以南的三墩车站。

三墩车站在南汇县南十余里，地滨东海，距东海约十余里。此地是上海的东南角，地势偏僻，选此地点作为进攻浦东之敌的出发地，是为了便于隐蔽，不让敌人事先发觉。我们在三墩休息了两天，并做好了作战的准备。各连队也再次进行了动员，鼓足勇气，准备投入战斗。同时也教育战士注意封锁消息。五月十七日上午上级下达了进攻的命令，进攻的时间是当天夜间。进军的路线，是由三墩经南汇，循公路直抵川沙，沿上川小铁路旁的公路，扑向新陆车站一带。敌人究竟盘踞在什么地方，当时还未明确。这就需要我们边侦察边准备打了。十七日中午提前开饭，饭后再检查一下战斗准备，带足弹药。至于炸药，因当时目标不明，还不能准备。后来几百个炸药包，是随后勤的驮马带上来的。下午二时了，部队都等

得着急，我一面向师部报告，一面就叫部队出发。当时天色阴暗，已有濛濛细雨，部队勇敢地前进。我们走的是公路，桥梁已全部被破坏，遇到河流，只好在河岸两边临时挖土填条小路通行，有些小河就排上木板而过；河面宽的只好绕道，踏着铁路桥上的枕木过去（因为这个铁路桥是空心的）。过了川沙不远，我们就转入农村小路，那时雨越下越大，泥路遇雨，加上大部队行走，路更泥泞更滑，一不小心就跌交，而且又是黑夜中行军。在这大雨中和泥泞的道路上行军，战士身上除背着枪和背包外，还背着装满子弹的弹带，有的战士还捐着数十斤重的机枪，跌倒了爬起来再走，一夜中行走了七十余华里，没有一个掉队的。

拂晓到达花石桥一带，据前头部队报告，前面发现敌人。这股敌人是在小铁路的新陆车站一带，向我鸣枪示威。询问当地居民，说法大致相同，说这股敌人大概有一个营，武器装备很强，在新陆车站修建了据点。我们一面将情况报告师部，一面准备三营与二营从南北两面包围敌人，团指挥所设在花石桥村的一座小楼上。电话兵架通电话，师部即来电话催促前进。我们团部开会商议，因战士们行军一夜，先让各营驻下吃早饭，再一面探察敌情，一面先派一部分部队进行包围。新陆镇是个小集镇，只有几十户人家，车站又在镇的西头，四周都是空旷的田野，包围是比较困难的。十一时，我二营、三营对敌人已形成了包围圈，但两个营都有伤亡。敌人据守新陆镇是一个步兵营，约三百余人。我们部队对敌人包围后，即进入进攻作业，选择有利地形，构筑阵地，准备下午二时出击。敌人这一个营，地处上海的背面，他们认为是战斗的后方，万一逃走不了，一部分可以从此地窜到海岸，用小船渡上大轮逃走。他们没有想到人民解放军行军神速，已把他们包围。他们发现我们部队后，

惊慌万分，所以轻重机枪、步枪齐鸣。敌人还想坚守，没有逃跑的象征。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电告师部，师部考虑，白天进攻，伤亡要大，不如稍延几小时，也就是不要在下午二时进攻，反正敌人是跑不掉的。于是我们改为晚上六时进攻。

我们团部带第一营进到离新陆约两华里的地方，时将拂晓。八点钟左右，看到在团部住地的左侧约三、四里处，有几根桅杆，桅杆上挂着旗帜，因为距离较远，看不清是什么旗帜。查看地图，那里是黄浦江，登高用望远镜细看，是挂星条旗的美国兵舰。在渡江时，上级曾交代说，打上海，美帝国主义可能参战，美国有兵舰在黄浦江一带。经过进一步观察，共有美国兵舰八艘。发现这个情况，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如果美国兵舰开炮，我团是前头部队，就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而我军的山炮营也紧跟着我团在前进。我们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师部，师部对如何炮击兵舰作了指示，并要我们做好准备。我们构筑了工事，山炮营也进入了阵地，可是到十时左右，八艘美国兵舰都移动了，不多时，鱼贯地开出了黄浦江。于是我们集中力量攻打新陆车站的残敌。

晚六时，电话正常畅通，包围敌人的两个营进攻准备也做得很好。在火力上，我们各营都有四挺重机枪、两门迫击炮；每连各有轻、重机枪四挺，六〇炮三门，火力是相当充足的。团指挥所仍设在花石桥的一家小楼上，团参谋长在前线指挥。当发出攻击信号后，我们的迫击炮、六〇炮和轻重机枪，一齐向敌人据点猛烈开火，把敌人的火力全部压下了。火器一响，部队即展开活动，半小时后，与敌人短兵相接，我军猛打猛冲，打得敌人狼狈不堪。一小时全部解决战斗。打死打伤百余敌人，俘敌一百六十余，武器被我全部缴获，干净利落地夺取了初战胜利。

新陆战斗刚结束，师长即来电话，要我们赶快整理一下队伍，继续前进包围金家桥之敌。金家桥也在小铁路线上，位于新陆车站的西面几华里。我们部队连续作战，战士和干部都很疲劳，但是为了执行战斗命令，决定派第一营去打，二、三两营作预备队。我率一营干部先去看地形，半路上遭到敌人射击，封锁线不能通过。当时二七八团副团长也去看地形，我们在顾家宅相遇，都对前面情况不明，于是报告师部。师长指示：我团二、三两营暂留原地收拾战场，先遣一营南插。当时天阴夜黑，方向难辨，当地向导讲话又难懂，部队前进了一段，感到这样行动确实不行，于是报告师部，师长同意夜间休息。

第二天(十八日)早晨，吃了早饭后，一营即向南猛进。打新陆时，一营是预备队未打仗，二、三营打新陆已获胜利，一营也要争立战功。一营干部、战士们接受任务后，猛进五里，包围了高行，同时派了一个排搜索东沟之敌。东沟除几座平房外，有美孚公司油库六、七个。东沟敌人见我军进攻，一面抵抗，一面准备上船逃往浦西。我们在战斗中，炮弹误中美孚油库，以致石油流出，满江火花，经久不熄。在我们向高行进击时，路上遇到师部的一位科长，他告诉我们说，高行西北有敌人一个要塞大队，分驻在郎中桥和顾家宅。于是我们商量决定，一营集中力量歼灭东沟残敌，以二营包围郎中桥，三营包围顾家宅。后来探明情况，考虑到不过分分散兵力，遂决定以四个连先集中包围顾家宅残敌，二营作预备队。经过半小时战斗，东沟方面的残敌全部解决，生俘三十余，武器全部缴获，我军占领了东沟，派一营的一个排守之。顾家宅方面，下午包围，夜遇大雨，十九日凌晨解决战斗，俘敌一百五十余。

十九日，派二营包围郎中桥，敌北逃，俘敌三十余。同时派一营

乘胜追击庆宁寺残敌，敌逃，我遂占领庆宁寺，派二营的四连防守。

二十日，敌三十七军部队袭击我二七八团。二七八团驻在庆宁寺附近村庄。敌人袭击，我二营四连往援，结果浦西的敌人乘机占领了庆宁寺，并占领了附近的英商造船厂。二十一日，我们派二营再攻庆宁寺，转战一天，敌人又乘船逃往浦西，我夺回了庆宁寺。这次战斗，因敌人有准备，所以只俘一敌，缴获了一些物资。我军的战斗任务是歼灭浦东之敌，战斗界线是黄浦江，只能在浦东打，不能打过浦江，并规定不准向上海市区发炮。因此，残敌向浦西逃走，我军不能追击。这几天我大军正在上海市西部和南部猛攻敌军。

我们部队再次占领庆宁寺，肃清了散在一些村镇的残敌，浦东大片地区，已全部在我军控制之下。剩下的只有敌人的核心据点高桥镇了。高桥镇的敌人较多，工事也较坚固，镇的周围都有地堡。要攻下这个据点，需要组织更大的兵力。这时我三十一军的其他师也全部到齐，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师部传下命令，我团另有任务，沿江防务由二七八团接替，命我团到王庙子接二七三团的防务。二七三团属九十一师，军部命令该团攻击高桥镇之敌。于是我团即驻在王庙子。这时我团新的问题发生了。因战士们身上背的米袋里的米，食用殆尽，当地又不能征粮，连日战斗，战火纷飞，有些战士的衣服已烧得不成样子。我们截获敌人装物资的船只很多，船上满载大米，也有军服和军用铝锅、水壶等，因我军纪律严格，一切缴获都要归公，不能擅自动用。后经军部上报兵团请示，经批准，取了一部分大米，暂时解决了我团的食粮问题。二十四日，姚副军长到了浦东，师部检查我团的作战情况后，向我团打来电话说：“你们团浦东的战斗，打得不错。”这是对我们的鼓励。

二十五日夜间，我军会攻高桥镇。高桥镇是浦东较大的集镇，



人口也较多，商店林立，象个小县城。这个据点，是掩护敌人逃走时的断后部队，这据点如入我手，可以用一〇五的榴弹炮扼住黄浦江出口和长江的入海口，敌人就难逃走，所以敌人约有一个师的兵力守此。二十五日晚六时我军发起攻击。当时我师是第二梯队，我团是第二梯队中的前队。第二梯队担负三个任务：一、梯队如因某种原因打不开这个据点，我队即补上；二、如一梯队突破后，我队即向纵深发展；三、如敌人逃窜，我队负责搜捕追歼。战斗结果，前一、二两种情况没有出现，敌人逃窜，我们二梯队倒发挥了作用。

高桥战斗的时候，正是我西线、南线和西北面的大军，打得敌人节节败退之时。当时西线已打破外围守敌，南线已逼近上海市区，西北线也已打到吴淞一带，曾出现大的争夺战。敌人看到全线溃退，纷纷争着上船外逃。在这情况下，高桥之敌惊慌万分，士无斗志。我军下午六时炮击，七时就进入突破口，八时打进镇内，十时已鸦雀无声。敌人一部分被我消灭，一部分突围溃逃。我们向师部报告情况，提出向高桥侧面的村庄搜索、攻击残敌，师部同意。于是我们前进搜索杨家宅、钟高，未发现敌人。又搜索了三个地堡，也没有发现敌人。第二天拂晓，继续搜索到林家宅、孙家宅，发现敌人遗弃的大批物资和弹药。我团一营据当地居民报告，有几股敌人于拂晓向黄浦江岸逃去。我一营战士和干部迅速追去。赶到江岸，大部分敌军已到江边，正在用小渡船驳上大船。我们跑步向前，二十几挺机枪密集向驳船扫射，打得黄浦江水花四溅，已上船的敌军全部打落江中，岸上的逃敌四散逃跑，我们的机枪不停地扫射，当场打死、打伤几百个敌人，其余的敌人都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我们派一个连整顿俘虏，一个连收拾枪枝弹药，一个连警戒。中午全部带回团部，共俘敌一千二百余人。

刚吃午饭，据报告江中仍有敌人的船只，于是即派一个连跑步到江边，确有载着武器的敌船，当我一开枪、喊话，便将船靠岸，缴获了战防炮四门。我们二营、三营在林家宅、孙家宅也搜集到大批物资，有军服、军毡、战刀、食糖、酱菜以及手表、照相机等等，可装几房间。这说明，敌人是把浦东当作后方的。至此，浦东的战斗结束了，敌人全部被歼灭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全部解放。当天下午我们部队休息。第二天收集战斗情况，给师部作了一个简要的战斗报告。本团渡江时共有战士、干部二千三百多人，渡江后直到浦东战斗结束，减员较少，伤亡五十五人中，连级干部伤十二人，亡四人；排级干部伤二十人，亡五人。这证明我们的干部是冲锋在前，身先士卒的。我团渡江后的追击、围剿中，俘敌一千七百三十一名；浦东战斗中俘敌一千五百六十三名，共俘敌三千五百九十四名，缴获的物资不计其数。渡江后三十五天中，由于行军力强，速度快（最高速度每小时十八华里），所以多数场合，只要发现敌人，敌人是跑不掉的。例如一营对高桥的逃敌追击，一小时狂奔十八里，终于全部歼灭了敌人，如果迟到一小时，千余敌人就会上船逃走。渡江到浦东战斗结束，渡过一条大江，绕过一个湖，走过十二座县城，行军一千八百余华里，前后战斗九次，这就是我二七七团，横渡长江，猛追逃敌和浦东之战的全部简报。

（谢胥浦 整理）

# 邓发同志和我从巴黎到上海

朱 学 范

邓发同志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卓越的领导人，一九四五年九月，他代表解放区八十万职工，同我前往法国巴黎出席世界工会大会。他是第一个出席世界工会大会的中国解放区工会领导人，受到各国工会代表的特别重视。一九四六年一月，他同我从巴黎回上海。他也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个公开到上海的解放区工会领导人，受到上海广大职工的热烈欢迎。邓发同志此行，影响很大，意义深远，时隔三十多年，记忆犹新。

邓发同志是著名的共产党人，解放区工会的领导人，国民党蒋介石怎么会同意他同我一起代表中国工会出席世界工会大会呢？这是因为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是中国劳动协会的团体会员。一九三九年十月，我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同志。我向他报告了国际工会联合会已接受中国劳动协会加入，并向他请示，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如何出席国际工会会议的问题。周恩来同志说：可以让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劳协，以后同劳协一起出席国际会议。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使劳协有了最坚强的支柱，是当时轰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件大事，并且受到了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重视。到一九四五年，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劳协已经有了五、六年历史，蒋介石无法否认。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我在重庆接到邓发同志从延安发来的电报：

中国劳动协会朱学范先生：

今年二月六日在伦敦召开之世界职工代表大会，赖先生之助，曾允许中国解放区职工会得派自己代表前往出席该会，远道闻之，无任欣慰。但不幸竟受当局阻难，不发护照，致代表不能成行，解放区八十万职工闻之，同深愤慨。现世界职工大会又将于今年九月在巴黎集会，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决定派遣自己的代表董必武、陈郁、邓发、章汉夫四人出席参加，并愿意与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合作。本会除直电世界职工大会筹备会接洽外，特告先生，深望多加赞助为祷。谨致

革命敬礼！

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

邓 发 于延安

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由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起，由各解放区工会的代表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延安开会成立的。它的目的是：各解放区的职工会联合起来，交流各解放区职工对敌斗争、发展生产等经验；促进全国职工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争取民主自由，力促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更有效更迅速地驱逐日寇；和世界职工团结起来，更有效地消灭日、德法西斯。电报中提到的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所派的四位代表，其中董必武、章汉夫当时正在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

同年八月，我接到世界工会大会的通知，要劳协派一个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大会。那时，周恩来同志陪同毛主席正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我同易礼容同志到八路军办事处，

见到了王若飞同志，请他把这一情况转告周恩来同志，并且要求派解放区工会代表来。周恩来同志很快就答复我们，同意派解放区工会代表来，一同出席巴黎的世界工会大会，并且一再提醒我要注意国民党当局决不会心甘情愿的。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周恩来同志给我送来了亲笔信：

学范先生并转

中国劳动协会理事会大鉴：

迳启者，陕甘宁边区职工联合会久以团体会员资格参加贵会，兹因边区及中国各解放区职工联合会正在筹备联合组织，在弟上月离延之前，曾与该筹备会主任邓发先生谈及与中国劳动协会关系问题，邓先生告弟，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颇愿以团体会员资格加入劳动协会，并嘱弟前来洽商。同时，该筹备会及陕甘宁边区职工联合会亦愿以其所推定出席巴黎世界职工大会之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三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使之成为中国统一的职工代表团。弟曾以此意，面告学范先生及政府当局，均蒙赞许。现特函达如上，务恳迅予采纳，并代向社会部、外交部请领护照，并转告中国驻美大使馆签发董、章两先生由美赴欧护照，以利团结，实为至感。专此候复，并颂大安不一。

弟周恩来启 卅四年九月九日

我接到世界工会大会的通知和周恩来同志的信以后，就向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一再提出，出席世界工会大会的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一定要包括解放区工会的代表在内。谷正纲对我的要求，一口拒绝。我争了几次，他火了，说他不能作主，要我去找陈立夫。陈立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对我的要求，同样是一口

中國勞動協會

朱學範先生鑒

周  
九  
月  
九  
日

周恩来同志给中国劳动协会朱学范同志的信

吳十死先生至行

中國勞動協會理事會大鑒

這確者，漢甘肅邊區總

工會會久以國陣會會員資

格予加責會，一取回邊區及

中國解放區總工會會心在

弄備總合理職，在 上月辭

這二會，曾以該弄備會之任

仰蒙先生提及與中國勞動協  
會關係問題即乞先告中  
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  
頗願以團體會員資格加入勞  
動協會。並盼早日與中  
國職工聯合會及漢甘肅邊  
區職工聯合會之類以之推定  
出席巴黎世界職工大會。



代表董必武。即於二十餘年三  
人參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  
後之戰為中國唯一的誠實代表  
團。才曾以此為宣言。  
李一花先生及政府當局均極  
贊許。現時出題為上。請長  
週于律納。至代而社會所  
外亦不。法領。實。此。行。告。

中國往美之後，皆答美意，  
由是中華美對，政體也，以利  
國語，定有正感。

于中候

多，正切

七年，不一。

金  
金  
金

廿九年九月九日

恩子亮先生教鉴：

此次接 先生精彩的题词，和贵报之间的  
诚意合作精神，使中国组织之统一时代  
表团出所适治之奇耻之大念，这不但  
足以表示全国之表示贵报之团结团  
结，且由此而更言之，中国组织之团结  
统一的基础，这足以值得我们的庆幸的。  
此词为表示中国组织之团结统一起见。  
中国劳动协会向工会报告之念是人  
数不足包括所有解放区组织之念之念是  
人数较为妥善，纵然除限日并建区组织之念  
之外，其他解放区之念尚未正式参加劳  
协协会，但 先生既用是字在工会报  
言之主张，故在解放区组织之念法定加入  
中国劳动协会，因此希望将所  
解放区组织之念之念之念之念之念之念  
之组织组织是报大会为所，以此理

敬礼！

邓发

邓发同志手迹

拒绝,并且以不发护照、不给经费来要挟我。我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利用当时的国际有利形势,同陈立夫据理力争,并且我也对他“摔纱帽”,我说:如果你坚决不答允,我也没有面子出去开会。如果不发解放区工会代表护照,劳协也不去参加大会。陈立夫迫于当时国内国外的形势,最后不得不同意邓发同志一人作为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巴黎的世界工会大会。我在重庆为邓发同志办好出国手续以后,先去巴黎,报名发言。邓发同志到达巴黎后,受到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大家都想听一听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工会代表的主张,都想了解解放区广大职工的斗争和生活。当时大会规定一个代表团有一次发言,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就由邓发同志发言。邓发同志就在世界工会大会上代表中国工人阶级作了有名的八项主张的讲话,使各国工会代表一新耳目。这八项主张,就是:一、必须建立一个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二、惩办汉奸卖国贼,解散一切伪军,并没收其财产,一切敌伪制造的职工会必须解散;三、立刻实行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应依照工人要求及其自由意志来组织工会;四、要限制过长工作时间,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应实行每周四十八小时工作制;五、应改变陈腐的学徒制,应根据学徒掌握技术程度,提升为工人,并领取工人同等工资,对于女工应实行同工同酬;六、工人应有权过问和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以改变工人无权地位;七、应实行工人免费教育,以消灭工人文盲状态;八、中国战后急待发展工业及恢复正常经济生活,但没有职工高度的劳动积极性是不能的,因此更有实行上述要求的必要。邓发同志的发言,公开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揭穿了国民党企图在国际上表示中国工人运动是由它统一领导的假面具,在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提出了战后中国工会工作的

纲领，表达了团结一致的中国工人阶级要求改变自己的地位和争取工会权利的坚强意志，得到了各国工会代表的热烈支持，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国际上的地位，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

邓发同志在大会上发言后的第二天（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写了一封信给我：

学范先生勋鉴：

此次赖先生积极的赞助，和我们之间的诚恳合作精神，使中国组织了统一的代表团出席这次世界职工大会，这不仅是形式上向各国工人表示我们之间的团结，而且由此而奠定了中国职工团结统一的基础。这是值得我们庆幸的。我们为表示中国职工团结统一起见，中国劳动协会向大会报告之会员人数，弟意应包括所有解放区职工会之会员人数，较为妥当，虽然除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之外，其他解放区工会尚未正式参加劳动协会，但先生既同意弟在大会发言之主张，故各解放区职工会决意加入中国劳动协会。因此希望将各解放区职工会之会员数目作为中国已有之职工组织呈报大会为荷。匆此 谨致

敬礼

弟邓 发

十月五日

我接到邓发同志的信后，极为高兴。这封信和周恩来同志九月九日的信，都是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它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分裂中国工人运动的阴谋彻底破产，它宣告了以解放区工会为主体的中国工会统一团结的斗争胜利。同时，也为国际工人运动的统一团结的扩大和加强，作出了贡献。

邓发同志和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一九四六年一月

二十三日到达上海的。一月二十六日，我们一同乘飞机从上海去重庆，在上海活动了三天。邓发同志来到上海，对正在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上海工人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一九四六年一月的上海，工潮汹涌，广大工人群众在地下的中共上海市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上海电力公司二千八百多职工坚持怠工；二万失业工人为了要求复工和组织工会的自由，游行请愿；法商电车公司工人要求年赏等福利待遇，卖票员“大请客”，创造了既赢得了社会同情，又坚持了斗争的新的斗争形式；英商老怡和纱厂、新怡和纱厂九千七百多失业工人开展了索取解散费的斗争；中纺公司的棉纺织厂工人要求发胜利赏金，在一月二十四日举行罢工等等。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工人刊物《生活知识》的记者访问了邓发同志，邓发同志对上海的工人运动和罢工斗争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工人应当有组织工会的自由，罢工的自由。工会是工人自己的，工会职员应当由工人用民主方法选举，工人内部应当不分党派、宗教信仰，大家团结起来，组织全国性的总工会。工人罢工是不得已的事，资本家不过份的剥削，职工生活能够维持过去，又何必罢工呢？邓发同志的谈话，对当时上海工人的斗争，是一个有力的支持。邓发同志还谈到中国的政治前途，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和平、民主，非和平不能建国，非民主不能团结。他对中国政治前途相当乐观，他说：整个世界在走向和平与民主的道路，中国也不能例外；目前虽然还有逆流阻碍不肯进步，但是历史的方向不是少数人把持得了的，中国一定会走上民主团结的道路。

邓发同志和我访问了北四川路上海邮局。我是上海邮局的老邮工，邓发同志是第一次同上海广大邮工见面，受到上海邮工的热

热烈欢迎。邮局的军乐队在苏州河边的大门口奏起乐曲，许多邮工列队迎接我们。当我们走到天井里，已经挤满了人，“邓发来了”的声音还在四周的工作间里回荡，几个楼梯上还有不少人急急忙忙地跑向天井里来。邓发同志笑着走向前去，同邮工们亲切握手，彼此问好。邓发同志同邮工们从邮局的底层走到四层楼，又从四层楼走到底层，参观了每一个工作间。当他走进每一个工作间时，邮工们都热烈鼓掌，争着向毛主席问好。走到上海邮务工会办公室时，早已给挤得水泄不通了。邓发同志对邮工的各种操作，发生很大的兴趣，问得很详细。他向上海邮工表示：全国工人要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而奋斗，为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而奋斗。离开邮局的时候，邓发同志挥着呢帽，向楼上楼下四周围欢送的邮工道别。

邓发同志和我从巴黎到上海以前，曾经到过英国、瑞士、意大利、埃及、印度、菲律宾等国家。特别是访问英国利物浦的中国海员工会，也是我国工运史上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利物浦的中国海员工会是在一九四二年由于我的帮助，在英国共产党员陈天声同志领导下组织起来的，有三、四千中国海员参加，他们都在英国船上做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负着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繁重的运输工作，流血牺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不闻不问，漠不关心。当邓发同志将去看望他们的消息传出后，他们万分兴奋。我们到达利物浦车站时，利物浦中国海员工会负责人和许多中国海员已在站台上等候着，把站台挤得满满的。每一个来迎接的海员都争着和邓发同志握手，要了解中国解放区的种种情况，向毛主席问好。我们到达工会接待室后，进行了热烈而亲切的交谈。他们把从解放区毛主席身边来的中国工会的领导人邓发同志同大家见面，当作一件大喜事。邓发同志对他们讲了

话,鼓励中国海员要加强自己的团结,并且还要加强同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为彻底消灭法西斯根源而斗争,为坚持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而斗争。邓发同志参观了码头,访问了中国海员的宿舍。这些宿舍是当地英国人办的,非常简陋。邓发同志对中国海员的劳动情况和居住生活,都问得非常详细。邓发同志嘱咐他们,工会一定要关心会员的生活,要为会员争取民主权利。中国海员对邓发同志这样关心他们,十分感动,都说邓发同志不愧是中国工会的卓越的领导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邓发同志和我一同到了重庆,不久,他在从重庆回到革命圣地延安途中,飞机失事,不幸同叶挺、王若飞等几位同志一起牺牲了。当时,噩耗传来,我万分悲痛。我和邓发同志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到一九四六年一月朝夕相处四个月,受到他的很多教益,在共同的战斗中,结成了深厚的阶级情谊。他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团结作出的重要贡献,使我永远铭记在心里。现在追记这篇文章,一方面是把亲身经历的中国工人运动的这一段重要活动记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寄托我对邓发同志的深切的悼念。



# 回忆上海工人的护厂斗争

张 祺

上海解放已经三十年了。解放前夕，我是上海地下党的市委委员，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斗争。今天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真是一场冲破黑暗迎接黎明的战斗。

## (一)

一九四七年九月，刘(伯承)邓(小平)大军过了黄河，人民解放军转入了大反攻。这年年底，毛主席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我们听到这些消息，心里是多么的激动啊！我在上海坚持党的秘密工作有十多年了，就是盼望这一天快点到来。如今，解放军真的就要来了，我的心情怎么能够平静呢？

从那以后，我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如何组织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里应外合解放上海。我有这种想法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历史上多次有过先例。一九二七年三月，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曾经在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胜利地占领了上海。虽然后来由于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武装起义的胜利果实丧失了。但是武装起义，消灭敌人，解放上海的思想，在上海工人中有很深的影响。又比如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刚投降时，党中央也曾经决定解放上海，派粟裕同志率领四个团的兵力南下包围上海。新华社已经广播刘长胜同志任上海市市长，我们在上海街头贴出了欢迎刘长胜当市长的标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还组织了一支地下军，带了武器占领了沪西一个汉奸老板开设的信义机器厂。当时参加这一行动的有一万多工人，我们打算以这个厂为据点，进一步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虽然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又决定新四军不进上海，我地下党改变了武装起义的计划，但是，武装起义，里应外合这一思想已深深印在我们地下党许多同志的脑子里。这次解放军就要来了，我又日夜思考着如何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起义，迎接解放。然而，这个思想没有多久就起了变化。

一九四八年八月，在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市召开了中国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根据中央指示，地下市委决定我们上海推派一批同志参加这次大会。我记得汤桂芬同志是上海代表团团长，朱俊欣、李家齐、韩武成、孙明、欧阳祖润、倪复生、江怡、杨春林、沈鸿春、沈翔声、蒋阿龙等同志，都是这次大会的代表。多数同志是由交通员带领，经过苏北解放区去的，也有少数同志是在香港学习后，从那里经过朝鲜仁川到达东北解放区的。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其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职工运动，应比以往任何时期要更加善于联系群众，聚积力量，扩大队伍，以便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国民党统治区职工们和革命职工团体，应该十分注意保护一切公私企业的机器和设备，反对破坏迁

移和分散这些机器与设备。”“特别在人民解放军到来时，职工们应当尽力保护一切公私企业及其工厂机器和物资不受破坏和损毁，并应联合各界人民监视反革命分子，维持社会秩序，以待新的秩序之建立。”整个决议没提武装起义这个词。六次劳大的文件很快传到了上海，我们通过学习研究，思想上得到启发和提高，开始认识到我们的任务不是搞武装起义，而是要发动与组织群众，把工厂保护好，配合解放军，进行接管。一九四九年春，中央进一步明确了一点。

当时上海局利用香港的地方，轮训部分干部并总结工作经验。根据组织上通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我坐火车离开上海到了广州，接着就到了香港。那时香港和广州自由来往，用不到护照，两地的生活习惯也差不多，银元也是通用的，一元换一元。我住在香港学士台，地处一个土山腰里，是个中等的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两边都有楼房连着。这里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学习班所在地。参加这次学习的一共有九个人，大多数都是从上海分头来的。工人方面有我和陈公琪，店职员方面有陆志仁、周炳坤，学生方面有吴学谦、吴康，教师方面是个女同志，名叫陈育辛。除掉我们上海的这七个人外，还有南京的两位，一位是朱启銮同志，是我过去就认识的，另一位是一个很活跃的青年，可惜忘记了他的名字。按照秘密工作的规定，我们互相之间不能叫名字。组织上给每人都编了号，我是一号，陈育辛是八号，那个不知姓名的青年是九号，其他的编号已经记不得了。

我们这期学习班一共办了两个多月，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检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个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我记得当时批评了我们上海工委个别同志在一

九四八年上半年工作中的急躁情绪。第二个阶段是学习如何配合解放城市，如何接管城市的经验。当时讨论了华北和华东几个城市在接管中的经验教训。第三个阶段是研究如何从组织上保证迎接解放这一任务的完成。当时大家一致感到党中央关于白区工作方针中所说的“以待时机”，就是指迎接解放这一时机。这是我们长期坚持地下工作等待的决战时刻。要取得决战的胜利，原来按工人、店职员、教师、学生等系统进行工作，已经不能适应形势，需要把条条改成块块，按地区组织，因为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可能发生巷战，地区之间被分割，需要独立作战。在学习期间，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方方同志以及许涤新同志都来讲过话，中心是要护厂护校，反复强调不能在上海解放时把机器都给敌人搬走或破坏了。具体管理学习班的是个名叫阿程的同志。这次学习使我们总结了反对美蒋斗争的经验，明确了当前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迫切任务。

一九四九年一月下旬学习班结束，我们分头回到了上海。一到上海，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同志就向我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军事上，人民解放军有绝对的把握解放上海，上海党必须广泛动员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有计划地进行保护工厂、机器、原料、物资，反对国民党屠杀、破坏，维持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首要的任务，亦是最好的里应外合。这样，我的思想就更明确了，不是只有武装起义才是里应外合；组织群众，保护工厂，反对国民党屠杀和破坏，维持秩序，保障安全，这就是里应外合，而且是“最好的里应外合”。在地下市委的会议上，市委书记张承宗同志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提出了取消条条的工作委员会，建立地区委员会的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我记得在市委下面分五个区：沪东

区委书记陈公琪，市委分工由我联系；沪西区委书记夏明芳，市委分工由马纯古联系；闸北区委书记吴学谦，沪中区委书记周炳坤，南市区委书记马飞海。吴学谦和马飞海也是市委委员；另外还有浦东地区，由周小鼎等负责。在区委下面，工人、职员、学生、警察等按条分工领导。通过学习讨论，不但明确了方针，而且从组织上作了调整，这就为全面开展护厂护店护校、迎接解放的斗争，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 （二）

一九四九年一月，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主力大部被消灭，形势急转直下，我解放军陈兵江北，隔江相望，江南解放指日可待。我们听到这一喜讯，便加紧迎接解放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首先是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明确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任务。一九四九年春节的一天，以探亲访友为掩护，在宁武路河间路转角一家老虎灶楼上陆文才同志家里开会，宣布成立沪东区委。参加会议的除区委书记陈公琪同志外，还有区委委员苏博、陆文才、沈默等同志。在会上，我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市委的决定，有的同志流露出对不搞武装起义觉得不大过瘾的情绪，我就谈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向大家说明现在的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了，在军事上解放军有绝对的把握解放上海。今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要从乡村转向城市。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些，要看到解放后城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我们地下党的同志长期生活在城市，比较熟悉城市，许多同志懂得工厂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和群众有联系，解放后还需要我们多发挥作用。不搞武装起义，改搞保护工厂，配合解放军解放上

海,这是斗争的需要,也是党中央对我们上海地下党的爱护和信任。经我一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统一了思想。接着,又讨论研究了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具体部署。会议结束了,女主人端出了饭菜。窗外北风呼啸,室内同志们欢聚谈笑,就象温暖的春天一般。远处传来国民党飞行堡垒的怪叫声,仿佛是敌人临死前的几声悲鸣,眼下的上海虽然还是个黑暗世界,但是一场冲破黑暗迎接黎明的战斗已经开始了!此后,区委又多次召开会议,对上海解放的几种可能作了设想。我又反复向大家强调要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在解放东欧时,有些城市过早举行起义,力量受到损失的教训,要大家沉着、坚定,不能过早暴露地下党的力量。

早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地下市委就决定抓住有利时机,扩大和发展党的力量。这一方面是保护工厂、迎接解放斗争的需要,因为当时还有不少厂我们没有党员,即使有的厂有我们的支部和党员,但工厂的关键技术部门我们没有党员;另一方面在抗战胜利后的和平民主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涌现了大量的积极分子,为扩大和发展党的力量提供了有利条件。当然,整个发展党的工作是积极慎重、个别进行的。几个月的建党工作使我们党的力量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上海解放时,全市地下党员达到八千多人,工人方面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沪东区党员约一千几百人,这是整个护厂斗争很重要的组织保证。

与发展党员相适应的,就是发展上海工人协会的会员。上海工人协会本是我党对外的一个半公开名称,只是在重大斗争中以工协的名义发布宣言、声明,借以指导斗争,并无专门机构和专职干部。这时我们就以上海工人协会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把党外的积极分子吸收到这一组织中来。我们组织了工协党团,以加强领

导,还起草了一份《上海工人协会简章》。其中第一条,说明我们工人协会的前身,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是上海总工会,抗日战争时期是上海工人救亡协会;第二条,说明我们工人协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执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决议,以团结上海职工,保护职工利益,争取职工解放为宗旨。在发展会员时,还向对方说明:现在解放军快来了,我们工人协会的任务是领导工人保护好工厂,迎接解放。在党外积极分子中,年纪大一些的,对上海总工会和工人救亡协会的印象很深,因此都把工人协会看作是党领导下的工人自己的组织;年纪轻一点的,经过几年斗争的锻炼,对党也有了感情。因此,要求加入工协的人很多。工协会员一般都由各个支部自己发展,因此没有一个全市的完整的统计。它的人数不会少于党员的人数,因为据我知道,在沪东区,工协会员就有一万人左右,当然各厂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厂党员只有八、九十人,而工协的会员却有一、二百人。也有的厂工协会员没有超过党员数的。但是,大部分的工协会员后来都参加了人民保安队,有些表现好的还参加了党。那时,为了工作的需要,工人协会党团也用工协名义去突击开辟一些空白单位。后来工协党团就成为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的一部分。

为了在解放后顺利地接管,我地下党发动所有的支部党员调查研究、收集情报。从本厂的机构、人员、设备、地址、敌特在工人中的活动,到本厂及附近驻有多少部队,什么番号,以及武器配备、有多少碉堡、在什么位置等等,统统都收集起来,有的还画了地图交上来。我们收到后,马上交给刘长胜和张承宗同志,由他们转发给中央和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据长胜同志告诉我,当时地下党送来的调查材料和情报非常多,有军事、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甚至包括物价指数都有。我们的报务员每天从晚上十二点钟

用密码发到半夜三、四点钟都发不完。这一情况说明当时我们在调查研究上发动的面是比较广的,收集的材料也是大量的,包括国民党特务头子的住址我们都搞得一清二楚,中纺十四厂的同志甚至把国民党特务、流氓头子向工人敲诈勒索打秋风的帖子都收集起来,从中搞清这些坏蛋的住址。解放后,我们看到解放区用江南问题研究会名义编印的准备接管用的《上海调查资料》,其中很多材料都是根据我们送去的调查材料和情报编印的。这些材料对我解放军了解敌情,顺利地解放上海和进行接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解放军快要来了,眼看国民党就要垮台,上海的敌人惊慌万状。我们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普遍进行政策攻心,瓦解敌人。主要的方法是向国民党大大小小的特务写警告信,连上海特务头子陆京士那里,我们也写信给他,指出蒋介石大势已去,晓以利害,警告他不得再干坏事,要放下屠刀,将功赎罪。记得我们还发信给国民党工福会在沪东的特务头目范才驎。不仅发给范的父母,要他们不让自己的儿子再做坏事,而且还把信寄到范的小老婆那里。这件事把范吓了一跳。因为一般说,小老婆的住址是秘密的,共产党连这个地方也知道了,真是不得了。我们用工人协会或“你的一个朋友”等化名发出的这些警告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那些小特务收到信以后心神不定,他们知道写信的人很清楚他们的底细,而且就在他们的周围,他们的一举一动,写信的人都知道,但又吃不准是谁,从此有所收敛,这就显示了我政策攻心的巨大威力。我们在信里责成他们要把工厂的机器、原料等等保护好,将功赎罪。这些家伙虽然不会听话,但对工人的护厂斗争不敢公开阻挠,在客观上对我们的护厂斗争减少了阻力。

护厂斗争还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



战线。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团结争取的对象。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但不少民族资本家对我党不了解,犹豫动摇。国民党强迫有些民族资本家迁厂,他们中间有些人也不愿走,也想把工厂、机器、原料保护好,怕国民党破坏。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写信向他们宣传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的约法八章,向他们宣传我们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争取他们和工人们合作把工厂保护好。当时,我们争取了中纺公司的总经理顾毓琮、中纺十二厂厂长郑彦之、中纺十四厂厂长王子宿等上层人士。通过我们的工作,郑彦之发了四亿多元伪币作为厂里护厂队的活动经费。王子宿召开全厂职员座谈会,表示工厂是大家的命根子,保护工厂人人有责,使该厂国民党特务不敢公开破坏护厂。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赶筑工事,下令征调日亚钢铁厂生产的竹节钢,我们争取该厂资本家余铭玉,采取消极应付的办法,使每天的产量从二十吨下降到一吨,而且最后迫使国民党全部撤出驻厂的军队,一吨钢也没有拿走。另外,我们还写信给工厂关键部门的技术人员,宣传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鼓励他们和工人们一起把重要的技术部门保护好,解放后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由于我们进行了这些工作,使很多民族资本家的情绪稳定下来,不少技术人员成为护厂斗争中的重要力量。

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乱做一团,南京反动政府实行疏散,军政机关提出了“应变”的口号。我们党抓住这一口号,发动各行各业工人要求发应变费、应变米。这一斗争虽然在各个单位有不同的结果,但是有一点是成功的,就是使全市的工厂、企业、学校,乃至家家户户都储备了大约三个月的粮食、油、煤、酱菜。在沪东的中纺十二厂,我地下党同志和厂方谈判,争取到无锡购进大量粮食,又储存了不少煤球,另外还发给每个职工两至三个月的“应变粮”

和“应变费”。为了不使银元外流，又争取到应变费和工资不发伪币，改发银元。由于十二厂打开了缺口，使沪东其他厂的斗争也争取到类似的胜利。储粮应变，这一方面可以稳定群众的情绪，同时又为解放后顺利地进行接管和恢复生产创造条件。记得解放初，在一次会议上，陈毅同志还表扬了我们。他说，我们解放军进城前很担心粮食问题，所以也作了一些准备，想不到你们上海地下党工作做得这样细致、周到，发动群众储粮，使我们进城后放下了心。

为了把工厂保护好，在各厂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了党员、工协会会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护厂队伍。它的名义在各厂是互不相同的，有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等等，这样做是为了使敌人不易察觉是我地下党统一组织的。护厂队日夜不离工厂，进行值班巡逻。我们提出了“机器是工人的命根子”、“保住工厂就是保住饭碗”、“天快亮了，我们工人要出头了”、“保护工厂，保护饭碗，迎接解放”等口号，得到广大工人的热烈响应。有的厂许多不是护厂队的工人也挟了被头铺盖进厂，睡在厂里，更壮大了护厂队伍和声势。这支护厂队伍在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中纺十厂和十二厂都发生国民党派兵来厂运布的情况，我们护厂队即发动工人一起拦截敌人卡车不准运布，并提出运布要用棉花来换的条件。在中纺十二厂有一千多工人把敌人的卡车团团围住，迫使敌人只好把空车开回去。敌人白天运不走布，就晚上来，但我们护厂队日夜值班，敌人的阴谋仍然不能得逞。随着战事加紧，敌人见形势不妙，就派军队进驻工厂，这时在纱厂，我们就以厂内女工多，驻军不方便为理由，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厂。万一阻止不了，敌人进了厂，我们一方面寄宣传品给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警告他们不准破坏机器，否则，就要走上与人民为敌顽抗到底的死路。另一方面，以护厂队和

他们接近，给他们讲形势，讲前途，瓦解敌人的士气，送便衣给他们，策动他们开小差，不要再为反动派卖命。护厂队特别注意控制企业的要害部门。如杨树浦发电厂，敌人要在高楼顶上架机关炮，这样就对高压炉发生危险，而且会给我解放军从楼下进攻时造成困难。我护厂队即找匪军连长谈话，警告他，如果楼顶架炮，万一高压炉中了流弹，会使方圆三里内全部化为灰烬，你们都要完蛋，吓得他连忙下令把机关炮从楼顶上搬下来。这一阶段的护厂斗争和敌人短兵相接，相当紧张。敌人妄图用屠杀公交三烈士来阻挡广大工人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斗争。但是，广大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在我党提出的“反屠杀、反搬迁、反破坏”的口号下，以更加英勇的姿态投入了这场迎接黎明的战斗。

### （三）

五月中旬，上海的外围战已基本结束，敌人被迫龟缩在市区。二十四日，张承宗同志和我在南京路四川路口中央商场楼上一家贸易行里碰头。因为我在这个贸易行里挂个职员的名义，作为掩护。这天，国民党打肿脸充胖子，明明吃了败仗，却在南京路上游行，大吹大擂所谓保卫大上海的“胜利”。看看国民党的军队到了南京路四川路口，却不向外滩走，折向北面，朝苏州河北方向开去。这时，张承宗同志笑着对我说：什么“胜利”，明明是吃了败仗朝北撤退，看样子今天晚上他们都要走了，你赶快回沪东去准备一下，给大家一个消息，人民保安队要全部出动。这样，我们就分手了。

实际上，就在这一夜苏州河南解放了。二十四日晚上我解放军开始向苏州河北进攻，二十五、二十六日整整又打了两天。

五月二十七日早晨，四川路桥北堍邮局的国民党军队撤走了，我人民解放军已从沪西方向突入苏州河北，我连忙赶到沪东去，先到姜才宝同志家里，部署了公用事业职工迎接解放的工作，接着又赶到杨树浦路英联船厂对面的一爿小炒货店。这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这爿店原来是警察局党委邵健同志职业掩护的地方。在这里，我亲眼看到我英联船厂的人民保安队把解放军领进厂里去。按照我地下党的决定，在解放前一星期即把人民保安队的臂章发了下去，在解放当天佩戴，便于识别，防止敌人浑水摸鱼。所以这时我们的护厂队都戴上了人民保安队的臂章。这个厂的护厂工作是搞得比较好的，在二十五、六日这最紧张的两天里，这个厂党支部的同志团结全厂护厂队员，向敌人发动政治攻势，宣传党的政策，劝降了敌军一个团的兵力放下武器。我解放军进厂后，迅速缴了敌人的枪械，但解放军把敌人缴械后马上又离厂了，赶到前面去消灭别处的敌人，这一个团俘虏的看管吃饭问题全由我人民保安队帮助解决了，后来他们觉得这些俘虏长期耽在厂里不是办法，向我们汇报后，由我们和解放军联系，把他们押走了。当时沪东区委的联络点设在中央玻璃厂。看到解放军把英联船厂的敌人缴械后，我就赶去中央玻璃厂，准备和沪东区委取得联系。谁知半路上被国民党军队拦住，我只好又返回炒货店。联络员对我说，没有什么事了。但是我不放心，又绕道到了中央玻璃厂，在那里碰到了沪东区委书记陈公琪和区委其他同志，知道沪东的敌人基本上都解决了，没有发生什么大的破坏，杨树浦发电厂三班头的工人坚持了二十四小时，保证供电，我才放了心。当我知道杨树浦一带人民保安队和我人民解放军共同在工厂门口站岗时，一阵胜利的喜悦激动了我整个身心。

正在这时，张承宗同志打电话到中央玻璃厂，要我马上到瑞金

路励志社去，他在那儿等我。我立即赶到那里，这里原是日本人的三井花园，坐落在现在瑞金路广慈医院对面，日寇投降后成了国民党的励志社所在地，解放初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的驻地。我进去以后，就见到了华东局的许多负责人，其中有陈毅、刘晓、刘少文、舒同、曾山等同志，他们和我亲切地握手。解放军和上海地下党胜利会师了！这种兴奋心情真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只有我们这些长期做地下工作的人才能体会到。我还见到了上海地下党撤退到解放区参加六次劳大、这次随军进城的朱俊欣、汤桂芬等同志，战友重逢，分外高兴。当时，部队正在向首长汇报战况。华东局的一个负责人给了我一个任务，叫我到民政局去找曹漫之局长，赶快把被关在监狱的我地下党同志放出来，并给了我三百块银元作为这些同志的临时生活费。我立即拎了一旅行袋的银元坐了电车赶到江西路汉口路原来租界的工部局，我原以为民政局在这里面，可是进去以后怎么也找不到，原来民政局在上海大厦后面塘沽路，是接收国民党地政局的房子。我正想出门赶去，却被站岗的解放军同志拦住了。他问我手里拿的什么东西，我说是银元，他又问我，你是从那里来的，盘问起我来。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穿的是一件长衫，手里拎了这么一大袋银元，难怪解放军要怀疑我、盘问我。正在这时，突然遇见了过去邮局地下党的金殿贵同志。他是解放前撤退到解放区去的，这次随军南下，穿一身解放军的黄军衣，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并向站岗的解放军说明我是地下党的领导人，这才为我“解了围”。我马上赶到民政局，找到了曹漫之同志，他热情地帮我打电话到提篮桥监狱，把我的去意告诉了对方。我又到提篮桥，见到了余敬成、杨光明等许多地下党同志。一见面，大家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知道上海解放了，就集中在楼下一个饭

堂里，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当时我要把这些同志接走，但监狱里办事的还是一些旧人员，他们说不行，得办个手续，要明天才能走。这样我就把带去的三百块银元分给这些受难的同志，每人三元、五元的，用来理发洗澡。第二天，我坐了一部客车把他们接出了监狱，一共有四、五十人。这件事后来被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志知道了，他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开部车子去接出来就完了，应当敲锣打鼓、放放鞭炮，拍成电影才行啊！陈毅同志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想得是多么周到啊！他从政治上充分估计迎接被难同志出狱这件事的重大意义，短短几句话倾注了他对我们地下党同志多么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啊！

在这里我还应当特别感谢解放后第一任的上海警备区政委郭化若同志。那时上海刚解放，路上还有敌军的散兵游勇和潜伏的特务活动。我每天在华东局开会到深更半夜，每次都是他要我坐他的汽车送我回家，并要他的警卫员帮我敲门，等我进门以后他才放心地离去。他这样关怀我的安全，使我十分感动，这充分反映了解放军对我地下党同志的亲密感情。

敌人是不甘心自己失败的，就在解放后最初的几天里，突然冒出了不少打着“华东地下军”、“江南中共地下军”、“苏浙皖地下司令部”、“中共地下军耀字部队”等旗号的坏家伙，有的甚至戴上伪造的白底黑字的“人民保安队”臂章（我地下党印发的是白底红字），跑到沪东有些厂去“接管”，妄图趁火打劫、浑水摸鱼、破坏治安，被我人民保安队识破后，把这些坏蛋抓了起来，押送给解放军。那时，我地下党和解放军胜利会师后，陈毅同志即向解放军下达命令，只有人民保安队才是我地下党领导的真正的革命组织，因此解放军对人民保安队的同志非常信任。人民保安队的同志更把解放

军当作是自己的亲人，军民亲如一家。在中纺十二厂，解放军还给该厂人民保安队赠送了“护厂英雄”的锦旗，给了全体队员极大的鼓励。

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和上海人民、特别是上海工人阶级的紧密配合，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整个上海解放了。在上海解放过程中，水、电、电话、煤气始终没有中断，大多数的工厂没有停止过生产，我们地下党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了上海，迎接了解放，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破坏上海的罪恶计划。毛主席和党中央电贺上海解放。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经毛主席亲自修改、批准发表的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其中说到：“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对我们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作了很高的评价，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

在上海解放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的不少指战员光荣地牺牲了。我们地下党和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中也有一些同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们。

上海解放的第四天——五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的领导下，召开了纪念五卅、成立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大会。从此，上海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也结束了长期的地下工作，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黎明前的战斗胜利结束了，迎来的是一个建设新上海的更加艰巨的战斗！

## 解放前夕沪西工人的斗争

施惠珍 顾龙桂 张翼钧  
蒋明道 姜东成

时值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一些曾经在中共地下沪西区委各级组织工作过的同志进行多次座谈，回忆当年亲身经历的护厂斗争。

当时我们沪西区一千多名地下党员，眼看长期为之奋斗、日夜盼望的翻身解放的日子即将来临，真是欣喜若狂，感到浑身是劲，个个夜以继日，千方百计，广泛地发动和团结群众，护厂护校，迎接解放，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度过了紧张战斗的日日夜夜。

当时的沪西区包括现在普陀、长宁两个区和静安、闸北、徐汇的一部分。全区工厂林立，工人集中，有产业工人十余万人，其中五万余人集中在三十几个五百人以上的大厂，其余，都分散在大量中小型工厂中。在旧社会，工人们备受重重剥削和压迫，富有反抗和斗争精神。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我党就在这里领导过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同志，在反帝斗争中惨遭杀害，激起了著名的五卅运动。抗战爆发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总结了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制订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市委坚决贯彻了这一方针，使沪西区党的力量



不断壮大，党群关系更加密切，群众运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抗战胜利后，这里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震惊中外的申九“二·二”斗争，发生于一九四八年初，是沪西区工人运动的一个突出事件。通过长期斗争，涌现了大量积极分子。我们的党员、积极分子与群众同生死，共命运，血肉相连，形成了一股雄厚的革命力量，为反对破坏，反对迫害，保护工厂，迎接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九四八年底，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里应外合、迎接解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中共地下上海市委开始着手改变原有组织形式，在沪西建立地下区委，由市委马纯古同志分工领导。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宣布正式成立区委，以夏明芳同志为书记，委员有王关昶、施惠珍、安中坚三位同志，四月间，又增加李德鸿同志为区委委员。区委下面按行业建立中纺、民棉、杂纺、五金、卷烟、面粉、劳工教育和地区等八个分区委以及学生和教师两个系统，领导全区工厂、学校和地区，全面开展以护厂护校为中心的斗争。

### 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斗争

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战役结束，南京政府自知无法支撑，下令各地组织“应变”，拆迁机器，搬运物资，转移资金，破坏工厂，准备逃跑，妄图垂死挣扎。当时，党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占绝对优势，胜利有绝对把握，大城市的中心工作主要是护厂。护厂就是“起义”，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我们坚决依靠群众开展斗争，反对蒋帮破坏阴谋，完整保存城市，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为此，就需要加强核心领导，团结大批骨干，充分发动群

众,进行护厂斗争。

一九四九年初到上海解放,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的领导下,我们发展了许多经过斗争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同志入党,加强了党的核心力量。同时,我们吸收一部分有觉悟的工人参加“工人协会”和成立半武装的人民保安队,形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作为护厂斗争的骨干。

当时,广大群众渴望解放,日夜打听解放军进军消息,迫切要求了解党的城市政策。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大量散发了地下市委统一编印的《新华通讯》、《上海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六次劳大决议》、《关于工商业政策》等宣传品,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这些宣传品,都是由地下党员、工协会员和其他积极分子冒着生命危险,采取各种办法秘密散发的;有的还秘密翻印,有的还秘密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的新闻,印发出去。许多同志白天工作,晚上通宵达旦搞宣传品,忘记了疲倦。这些秘密小报,群众争相传阅,在车间里传,在宿舍里传,高级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家里也在传,传来传去,纸张磨破了还在传,传得人民斗志旺,敌人心胆寒,传得中上层人士心安定,许多人一时看不到就到处找。这些宣传工作对发展革命势力,分化瓦解敌人,影响极大,为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我们要求所有地下党员和工协会员,在本单位揭露国民党破坏工厂的阴谋,宣传保护工厂的重要意义。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大部分民族资本家意识到保护工厂与自己切身利益的密切关系,护厂很快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纷纷提出“保护工厂,防止破坏”,“保护工厂,防止搬运”,“保护工厂,人人有责”等行动口号,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护厂斗争。中纺一厂、中纺第二机械

厂、第一印染厂、第一绢纺厂、新裕二厂、新生纱厂、民营中纺二厂、阜丰、福新面粉厂、大隆机器厂、华通电业机器厂等单位的工会，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就利用工会合法身份，全面发动，上下结合，公开领导护厂斗争。没有掌握工会全部领导权的单位，如信义铁工厂、新安电机厂和永安三厂等单位，就在一些力量强的车间里首先突破，自下而上地组织护厂队，逐步推开。中纺公司各厂还利用公司向各厂发出的关于护厂的通知，使护厂工作合法化。私营厂通过统战工作，争取不少高级职员和资本家支持和参加，使护厂工作能公开进行。还有许多工厂在先行单位的带动和影响下，普遍组织护厂队。护厂的组织形式不一，有的成立护厂队，有的成立消防队、救护队、抢修队、纠察队等，技职人员成立“职员联谊会”。虽然名称不同，但目的都是护厂。那时许多厂成立护厂组织后，利用国民党的“应变”口号，要求发应变费，开展储粮应变和发实物工资的斗争，要求厂方到苏州、常州、无锡一带购买供应全厂职工三个月食用的大米、咸菜、酱菜、乳腐等。这在当时物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下，对保障工人生活、稳定群众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工厂开大锅饭，吃大锅粥，不少工人吃在厂里，住在厂里，精力集中，一心护厂，这就大大增加了护厂的力量。

与此同时，一场反对拆迁机器，反对搬运物资的尖锐斗争，在许多厂开展起来了。如中纺一厂，一天突然开来十多辆卡车，闯进成品仓库，装满了布匹，企图搬运出去。当时布机乙班地下党负责人发觉后，立即把这个消息传到各车间，工人察觉到这是敌人破坏工厂的阴谋，纷纷涌出车间，有四百多工人将卡车层层包围，有的将石块塞进车轮底下，有的把汽车轮胎里的气放光，使卡车全部瘫痪，工人们一拥而上，将布匹全部搬进车间。以后经过谈判，迫使

厂方保证进多少原料,出多少布,并要有一个半月的原料储备。中纺六厂、七厂等,也发生过搬运棉纱的事情,都被工人拦了下来。这类斗争,不仅发生在中纺系统,在私营企业也陆续发生,如申新九厂资方曾将十二台细纱机拆下装箱,企图搬运出厂,被护厂队发现后加以阻止。申新九厂在“二·二”斗争中,一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被开除出厂,一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捕出狱后均不能进厂,所以,他们采取了厂内外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工人进行护厂,即厂内的党员和工协会会员组织工人推动厂方进行护厂,厂外工人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在厂外进行活动,以配合厂内的护厂工作。申新九厂的护厂队不仅阻止了资方拆迁机器,而且还做了统战工作,使资方不去香港,留在上海。申九资本家吴士槐在“二·二”事件中,受国民党胁迫,参与过镇压工人运动,因此顾虑重重。地下党组织摸清这一情况,一天内连续给他几封信,阐明政策,劝他出面护厂。他逐步了解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消除了顾虑,就请护厂队长到家中说:“警备司令部特派员反对护厂,怎么办?”护厂队长明确向他指出,“工人靠机器吃饭,你也靠工厂过日子,只有护好厂,大家才有饭吃”,要他负责搞好护厂工作。这时他从衣袋里取出飞机票说:“不瞒你们,共产党一天给我三、四封信,要我护厂,我原已准备去香港,现在不走了。”护厂队长接着又对他说:“现在听说有人在抄黑名单,如果捉走一个人,厂方要负责。”他说:“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塞金条了。”这样他开始支持护厂,从那时起,直至解放,申新九厂没有一人被捕。

当时,私营厂在轰轰烈烈开展群众性护厂斗争的基础上,普遍开展统战工作,推动资方支持和参加护厂活动。如新生纱厂资本家李天真,原是黎元洪时期的电讯科长和张作霖的盐务处长,他在

接到我地下党的信件后,消除了怀疑,高兴地说:“共产党还知道我李某人,要我搞好护厂,为人民立功,我一定要把护厂工作搞好。”他六十多岁了,不但支持工人护厂,还扶着拐杖,亲自参加夜间巡查。我们促使资本家出面,与国民党打交道,使工人护厂斗争公开合法地、大规模地展开起来。

我们还对一批中小型工厂的资本家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这些资本家由于产品销不出去,资金周转困难,同时害怕战争,害怕共产党,打算回乡避难,纷纷提出关厂解散。这样既影响广大职工生活,也不利于团结起来保护工厂。因此,我们发宣传品给他们,向他们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还从各方面想办法,做到不关厂,不解散。经过这些工作,有的资本家就打消了逃跑的打算。有些行业,营业困难,为了顾全大局,许多工人愿意减薪,以保护工厂。这样,大多数工厂被保存了下来。

这些中小型厂,以机器、毛、丝、麻、针等杂纺、染织行业的小厂较多,不少厂只有十来个工人。多数单位既没有地下党员,又没有工协会员,给开展护厂工作带来了困难。区委提出要千方百计打开这些厂的局面,我们通过工会开展护厂工作,如三区机器业工会有个同志以公开的总监事身份,到各小厂去开展护厂工作,并发展工协会员;有的同志利用三区机器业工会制钉拉丝行业组组长的身份,去制钉、拉丝行业各厂,发展工协会员,开展护厂工作;有些同志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发展了工协会员,增强了护厂力量。还有不少同志通过发展纺协、职协会员,在技职人员中做工作,开展护厂活动。实验民校、女青年会夜校和沪西公社夜校的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实验民校在来自上百个工厂的工人学员中,发展了地下党员和工协会员,开展护厂工作,还在英华里、梅芳里、金家巷、药水弄、

余姚路、平民村等工人居住集中的地区，建立了一千二百人左右参加的贫民团，发动了城市贫民，支持沪西工人护厂，保护了地区。

我们不仅在工厂、地区、学校中开展护厂、护校工作，而且对中纺公司也做了一些配合工作，进行反对搬运物资，反对抽逃资金的斗争。中纺公司是上海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拥有大量纱布和外汇。为了防止敌人搬走物资和抽逃资金，我党吴克坚同志通过关系对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琮做工作，同时石家庄新华电台两次指名劝导顾毓琮弃暗投明，这样顾就毅然向我党靠拢。当时，国民党军司令汤恩伯和国民党特工头子谷正纲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声称坚守上海六个月，要中纺公司提供五十万匹棉布和大量资金，名义上是为了买煤买米提供军饷，实际上想捞一笔横财逃走。顾毓琮为了抵制他们，就与业务处商量，设法应付。我们通过在中纺公司工作的纺协会员做好业务处正副处长的的工作，要他们支持顾毓琮。他们一方面推说公司缺少现金，难以提供这笔资金，另一方面由业务处出面，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留在仓库里的质量较差、卖不出去的二十万匹棉布对汤恩伯敷衍搪塞。

### 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坚持护厂活动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后，国民党军、警、宪、特感到末日来临，惊恐万状，象树倒猢猻散，各自寻找出路。工福会特务头子陆京士，在溧阳路总部召开会议，对一些特务说：“你们愿意跟我去台湾的，发两个月生活费。”许多特务想：两个月以后怎么办？因此除了少数特务头子准备逃往港、台外，极大多数考虑外逃前途莫测，留下又自知有罪，进退两难，不知所措。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开展了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我们调查到了他们的家庭地址，发出了有

针对性的警告信，要他们放下屠刀，悬崖勒马，将功赎罪，取得人民的宽大。他们收到警告信后，思想斗争激烈，很多人睡不着觉，有的直接来找护厂队负责人，商量该怎么办？如工福会一级干部、中统通讯员沈雨邨收到信后很紧张，翌日清早他就找护厂队负责人，问该怎么办？护厂队负责人就向他指出：“只好家里多蹲蹲，外面少跑跑，少管闲事，少招冤家”，这样来限制他们的破坏活动。特务们接到我们的信后，大多有所收敛。军统特务头子范才驎的得力干将桂殿秋，在接到警告信后，自知罪重，约了几个心腹爪牙，在兆丰公园碰头，大哭一场，表示自己准备逃走，嘱人带信请护厂队负责人不要难为他的家属。这些有针对性的警告信，对动摇敌人、瓦解敌人，作用很大。同时，在地区中，反动派的基层政权也处于分崩离析状态，从伪区长到伪保长，眼见大势已去，都力图通过各种关系向我们靠拢，我们乘机向他们展开政策攻心，根据不同对象寄送信件和宣传品，警告他们不得继续为非作歹，并要他们保护好地方，将功赎罪。这一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在他们的合法掩护下，我们公开发动地区群众成立纠察队、消防队等组织，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但是，也有一小撮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狗急跳墙，垂死挣扎，他们暗里破坏护厂斗争，遭到失败，就公开地进行破坏，甚至血腥镇压。

沪西特务头子章祝三、沈庆云等在澳门路五百三十五号（三区棉纺工会）两次召开各厂特务和伪工会理事长会议，叫嚷要以他们的护工队代替我们的护厂队，并要特务抄护厂队的黑名单。同时，伪警备司令部也召开各厂厂长会议，命令不准成立护厂队，成立了的要停止活动，还派武装特务驻厂。有些特务头子“坐镇”重要工

厂，监视工人活动。伪警察局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职工，一时，反动军、警、宪、特纷纷出笼，张牙舞爪，妄图以此破坏护厂斗争。这在中纺公司所属各厂尤为突出。如上海第一绢纺厂特务头子吴健带领了一批爪牙，敲掉了护厂队的牌子，护厂队负责人当即带领工人向特务和厂方严厉责问，迫使特务哑口无言，厂方乘机表示：“护厂是应该的，但是上面命令护厂队停止活动，你们可以成立消防队、救护队、纠察队等组织。”这时，我们就灵活机动，同意改换名称，同样达到了护厂的目的。伪警备司令部派驻该厂的特派员见明斗斗不过，妄图暗地下毒手，通过该厂的爪牙搞了一张六十多人的黑名单，但被工人及时发觉，揭穿了他的阴谋，迫使他不报，又一次取得了斗争的胜利。面对敌人的破坏，大家就更警惕、更谨慎、更深入地广泛开展护厂斗争。

又如第一印染厂厂长在工人的推动下，召开工会理监事、支部长以上人员、各车间行政管理人员联席会议，讨论公开成立护厂队，由厂长任总团长，工会理事长（中共地下党员）为团长，下设两个副团长、四十一个委员。该厂特务竭力反对，肆意破坏，蛊惑人心地说，炮弹不生眼睛，万一落在厂里谁也护不了厂，连护厂人的性命也难保；还说什么要护厂可以由护工队负责，等等。护工队是国民党用来镇压工人运动的打手组织（部分同志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经过批准，参加护工队或取得对护工队的实际领导权的，那完全是另一回事），群众立即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当场揭穿说：“护工队只有少数人，护厂工作人人有责。”经过一场辩论，最后通过成立护厂队。但是过了两天，特务头子吴健气势汹汹地来该厂找工会理事长，责问她：“啥人叫你护厂？”话未讲完，整装车间几十个工人一下子拥到现场，特务吴健两手向腰里一插训斥地说：



“你们小姑娘护什么厂？你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护厂是共产党搞的。”一个女工讽刺地反驳说：“吴先生讲话真滑稽！我侬工人护厂有啥不好？你说护厂是共产党搞的，难道国民党不要护厂而要破坏工厂吗？”逼得他无话可讲。但他们不肯罢休，又造谣说厂里有鬼，以此来恐吓青年女工。一次两个女护厂队员在晚上拿着木棍值班巡逻，发现一个黑影，女工不怕，拿起棍子对准黑影当头一棒，那个装鬼的连声叫“你们真的打吗！”一看原来是个小特务。揭穿了阴谋，女工极其气愤，当场要拖他到总值班室去，他急忙逃之夭夭。敌人的阴谋一次次被群众击败，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就更疯狂地进行反扑。在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该厂特务，突然到工会里抓工会理事长，不见，就坐着等候，并监视工会活动。这个可疑的行动，当时被护厂队值班人员小潘发觉，立即设法通知有关同志隐蔽起来，免遭逮捕。工人知道了这个消息，把小潘也拉到车间藏了起来。四时许，全厂被近百个伪警包围，还开来了飞行堡垒，跳出五、六个特务，以社会局名义找理事长，找了半天找不到，扑了一个空，特务头子大发雷霆，一面训斥本厂特务：“饭桶，几个共产党也控制不住！”一面拉了本厂特务金振民就走。

那时，敌人象疯狗一样，到处捕人、杀人。特务、伪警察除了在中纺第一印染厂行凶未能得逞外，还到许多工厂如民营中纺二厂、中纺第一毛纺织厂、中纺七厂等，捕捉护厂队负责人。有的工厂护厂队负责人在群众掩护下，没有被捉去，如伪警察局开了飞行堡垒去第一毛纺织厂，企图逮捕护厂队负责人，工人被激怒了，大家勇敢地睡在飞行堡垒车轮前，阻止了他们的捕捉。也有被他们抓去的，如中纺七厂的护厂队负责人被捕后直到解放才获释放。敌人最恶毒的暴行，发生在第一印染厂第二工场。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一

批特务带着近百个伪警，到澳门路包围了第一印染厂第二工场，特务根据混进工协的杭云生告密的黑名单，逮捕了十九位同志（大部分是工协会员），连夜押到伪警察局严刑拷打，并于二十四日晨秘密杀害了共产党员、工协负责人孙方璟同志和工协会员张如松、李阶平同志，造成惨痛的“印染血案”。

那时，有些比较暴露的共产党员、工协会员，为了免遭无谓损失，每天晚上都无固定住宿的地方，但是白天继续在群众掩护下，想尽办法开展护厂工作。敌人虽已十分虚弱，但仍然企图垂死挣扎。如沪西三区机器业两个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探听到：三区机器业护工队十一大队大队长黄大中，搜罗一批护工队员，在华山路淮海路附近一座洋房里，拉来一个伪军营长和国民党青年军军官，训练一支凶暴的武装特务组织，直属伪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在解放前夕，他们天天捕人、审人、打人、杀人，并与浦东武装特务部队有联系，他们还准备了武器、电台、粮食，妄图去浦东“打游击”。但是任凭敌人何等凶残、毒辣，都逃不脱人民的巨掌，解放初，黄大中等一伙都受到应有的惩罚。

敌人的凶暴残杀，吓不倒沪西工人护厂的决心，沪西工人护厂的意志更加坚强，斗争开展得更加广泛，更加谨慎，斗争的水平不断提高。英勇的共产党员、工协会员和广大护厂人员，冒了生命危险，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护厂，直至解放。

### **建立人民保安队，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

一九四九年三月间，根据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即将解放上海的形势需要，我们根据上级指示，秘密建立了一支半武装性的人民保安队。它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护厂、护校，保护地区，配合

解放军解放上海。当时为了统一指挥，建立了人民保安队沪西区指挥部，由王关昶同志任总指挥。区指挥部开始设在澳门路六〇九弄，以后转移到陕西南路六十三弄十六号祥生饭店，后来又转移到武定路春江浴室弄内和康平路的民房等处。

参加人民保安队的人员是工厂、学校和地区里政治上可靠、身强力壮的青年，他们大都是工人协会会员和地区的贫民团团员，也有一部份是纺织协会、职员协会、教师协会等组织的会员。为了适应战争状态，便于各地区独立作战，把全区划分为五个块，成立五个分区。各基层单位建立大队，全区共有五十多个大队和若干直属中队，共二万余人。第一分区以中纺公司所属工厂为主，有三千余队员，所属地区是江宁路以西，长寿路以北，苏州河以南，直至曹家渡。第二分区以私营棉纺厂和面粉厂为主，有四千余人，所属地区是新闻路以北，江宁路以东，苏州河以南，直至恒丰路桥，保护的重点是归化路变电所、泰兴路的电话分公司、新闻路的自来水厂。第三分区以毛纺、染织、丝织、针织等中、小企业为主，约四千余人，所属地区是从延平路至曹家渡。第四分区以机器业工人和城市贫民为主，有四千余人，其中包括实验民校和金家巷、英华里、大旭里、余姚路、南姚、北姚等地区有二千余人。第五分区是苏州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以民营中纺二厂、裕通面粉厂和大隆机器厂为主，有二千余人。其它从曹家渡至周家桥等地区，建立了若干直属中队。

早在一九四八年底，沪西区委即动员全区各级党组织，进行广泛的调查，为解放上海、接管上海提供了大量材料。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根据党的指示，为里应外合的需要，进行了系统的调查，获得了许多重要的资料。一是敌情的变化。伪警备司令部在沪西威

海卫路设有第一稽查大队，配备装甲车数辆，是镇压人民的机动部队。全区有三个伪警察分局。普陀、江宁二个分局处于横贯全区的要道江宁路上，是历来镇压人民的反动据点。全区共有一千二百名伪警，六挺机枪，四百五十支步枪，七百支手枪，还有数千名败退下来的残余匪军，盘据在沪西区的一些厂、校。二是敌产和需要重点保护的设施。全区有二十余家官僚资本企业，解放后要归人民接管。区内的变电站、水厂、电话分公司、仓库等需要重点保护，各工厂的方棚间、锅炉间、水塔、原料仓库和成品仓库都列为工厂的重点保护。三是交通要道。区内苏州河南北的通道有恒丰路桥、造币厂桥、叶家宅桥、三官堂桥等桥梁，有长寿路、小沙渡、叉袋角等十几个摆渡口。此外，还把大小街道、死活里弄绘成地图，以便在战争发生时，利于行军和设置沙袋、铁丝网等障碍物。此外，我们还对军、警、宪、特等机关人员和他们的动态进行了调查，在解放军包围上海，近郊发生激战时，又进一步掌握了各厂驻卫警和特务、流氓的枪支情况，及地方上的私人自卫枪支情况，准备一旦需要，就先行缴获，武装自己。

为了武装自己，各厂工人秘密赶制三角刮刀、匕首、长矛、铁棍、石灰包等土制武器。同时，秘密缝制了许多人民保安队的臂章，后来为了统一标记，市人民保安队指挥部印制了统一的臂章。五月上旬，我们沪西区领到了二大皮箱臂章，放在南阳路的一个隐蔽地方。

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后，各大队除了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文件进行政治教育外，还利用护厂队的名义，组织消防和进行保护重点设施的演习活动等。许多工厂的机器设备和要害部门，由本厂人民保安队和护厂队员负责保护，做到每个车间、每台机

器、每项重要设施都有专人负责。对全区的重大设备,都由人民保安队区队统一安排大队包干,组成三到五人的小组,日夜秘密看守,其中有不少是女工,她们和男同志一样,冒着风险,不分昼夜,负责看守,一个多月来从未间断,直至解放。各分区还组织了部分女人民保安队员参加的由医院、女青年会夜校和实验民校所组成的救护队,进行急救、包扎和担架等训练。绢纺一厂救护队,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由救护队长带领,直达苏州河北岸的前沿阵地参加救护工作。不少单位的救护队还抢救了被流弹和敌军射伤的居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近郊后,盘据在市区的蒋帮残军退守沿苏州河两岸的工厂和险要地区,妄图负隅顽抗,破坏工厂。针对这一情况,我们采用了各种方法瓦解敌军。第一种是做好策反工作,动员敌军缴械。当时蒋军为了控制苏州河南北交通枢纽造币厂桥,派了一团伪军分驻在桥南同兴被服厂、新裕一厂和桥北的造币厂内,形成犄角之势,团部设在同兴被服厂内。那时除了由该厂人民保安队做好驻在厂内蒋军营长的工作外,市总指挥部领导成员杨秉儒同志还派了地下党员,通过关系,约敌军团长直接谈判,阐明党的政策,要他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我方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通过谈判,敌军愿意率领全团缴械投降。又如窜驻实验民校的七三七九交警总队一个连,由一个姓胡的副官带领,该校人民保安队负责人摸清他们是才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情况,就利用各种机会主动和他们接近,动员他们放下武器。到二十四日深夜,解放大军开始进入市区。再加我们做了工作,他们眼看无路可走,就向学校要便衣,在解放军到达前,全部逃走,留下了机枪、电台和枪支、弹药、军服。第二种是党组织一面通过厂方出面与敌军

官周旋，一面发动工人做好敌军的士兵工作，上下结合，促使他们放下武器，离开工厂。如私营中纺二厂，地处苏州河北三官堂桥堍，原有新旧桥梁两座，新桥被敌军炸毁，敌军为了控制旧桥的桥面，派了一个营进驻该厂，伪营长就住在厂长的小洋房里。我们通过厂方对伪营长做工作，同时发动工人找蒋军士兵拉家常，谈形势，讲出路，促分化，许多士兵思乡心切，表示不愿为蒋家王朝卖命，再由厂方发给若干银元作路费，工人送便衣，创造条件让他们回家。就这样，到了下午，逃走的蒋军越来越多，终于达到不战而溃，为解放军进入苏州河北岸，扫除了三官堂桥南北通道的障碍。

第三种是对顽固之敌，采取里应外合逼其投降的方法。如恒丰路桥是南北交通枢纽，紧靠该桥南堍的福新面粉七厂厂房是八层楼的钢骨水泥建筑，五月二十日一支溃散后再杂编起来的交警总队二百余人驻进该厂，居高临下控制了恒丰路桥。为首的一个营长十分顽固，叫嚷要与工厂共存亡。沪西指挥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第二分区队长几次和该厂人民保安队大队长联系，研究对策，在敌军人数超过厂内工人的情况下，集中全力发动群众一起做士兵工作。后来在工作过程中发现有一个伪军分队长表示不愿打仗，我们就针对这个分队长做工作，使这个分队长所带领的士兵都同意不进行抵抗。后来解放军包围了该厂，反动营长仍胁迫士兵继续顽抗，拒不投降，人民保安队就和外面解放军密切配合，让解放军从该厂人民保安队控制的房子隔壁一家造纸厂内，打个墙洞进入该厂。那个反动军官还妄图凭借工事抵抗，被不愿抵抗的士兵从背后一枪击伤，士兵们扯起了白旗缴械投降。通过以上几种方法，就瓦解了敌军一个整团、三个营、若干连，共计二千余人。

人民保安队和广泛的群众性护厂斗争相结合，在解放前夕不断挫败了敌人的破坏计划，保护了工厂、地区和各项重点设施，终于配合解放军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凌晨，完整无损地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全部沪西地区。

### 战火中的三天

人们用斗争迎来了解放，当大家看到亲人解放军秩序井然地坐满了马路两旁人行道的时候，个个心情激动，欢庆解放。我们地下党员和广大积极分子，更是欣喜若狂。工人、学生和居民们一群群一队队敲锣打鼓，高呼口号，高唱革命歌曲，扭起秧歌舞，用各种方式尽情庆祝解放，欢迎解放军进厂、进校。有的送来了一桶桶开水，有的还送上面包。但是解放军纪律严明，不随便进入民房，不取人民一针一线，喝开水也先付钱。这种情景使各界人民深为感动，一致称颂。

苏州河以南的沪西地区虽已解放，但斗争仍很激烈。人民保安队广大队员，士气倍增，斗志昂扬，决心以战斗的实际行动欢迎解放军，庆祝解放。他们戴起了市指挥部统一制成的白底红字的人民保安队臂章，日夜在地区内站岗放哨和巡逻，协助解放军维持秩序，继续保卫各项重点设施。同时，针对部分商店老板怕乱怕抢，不敢开门的思想，协同由学生组成的人民宣传队，劝说未开门的商店迅速开业。经过宣传，解除了思想顾虑，就在解放后的当天，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全区苏州河以南各店，一律开市营业，工厂也迅速恢复生产，社会秩序良好。

人民保安队还根据事先掌握的情况，对驻卫警、义务警、武装特务和其他持有枪支武器的人进行缴械，用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

并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逮捕了一批人犯，其中包括特务骨干分子樊天一、张文龙等，以及解放前夕由伪警备司令部派驻各厂破坏护厂的武装特务。但是，斗争是尖锐复杂的，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妄图变换手法进行反扑。如永安三厂樊天一被捕后，他的爪牙蒙蔽了一些人，发动了所谓“保樊”丑剧，很快就被该厂党员和群众识破，挫败了他们的诡计。

这时军事管制委员会尚未宣告成立，接管工作还未开始，国民党特务企图浑水摸鱼，乘机捣乱，破坏人民接管，破坏党的工商业政策。如中纺公司第二纺织机械厂，在五月二十五日中午，突然来了六个人，乘着吉普车，佩带手枪，直闯厂长室，自称是东北民主联军驻上海办事处，奉命前来接管工厂。人民保安队负责人发觉后，感到十分可疑，立即向分区指挥部汇报，分区指挥部派了武装的人民保安队及时赶到，了解到他们是假的，立即包围该厂厂长室，勒令六人缴枪，并押送区指挥部审查。私营信和纱厂原黄色工会理事长特务袁志良等人，拿了一封伪造的军管会介绍信，找私方厂长说是奉命前来接管，要厂方召开领班和工人代表会议。他们还利用其在厂内的爪牙，蒙蔽了二百多个群众，手持彩色纸旗欢迎他们，在一百多台细纱机上插了“欢迎袁志良接管”的旗子。面对这种情况，我人民保安队负责人挺身而出，说明党的政策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不会前来接管，揭穿其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阴谋，迫使他们狼狈逃退。第二天他们又来捣乱，并企图谋害护厂队负责人，分区指挥部获悉，立即派人当场逮捕三人，稳住了该厂的局面。还有永安三厂、保丰纱厂等都发生过类似情况，有的冒充“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人民解放军东南工作队”、“东南民主联军”、“东南挺进纵队”等，也有的冒充人民保安队，均被我



们及时识破,并逮捕其为首分子。三天内,仅第二分区总计就拘捕了各类人犯四十多人。

二十五日下午,解放军三野九兵团领导和马纯古同志联系,要求沪西区指挥部派五十名人民保安队员作向导,协助解放军解放苏州河以北广大地区。沪西区指挥部从第二分区队挑选了政治可靠、身体强壮的五十名向导(其中三分之一是地下党员),于二十五日下午三时集中在西康路劳工医院大门内。这时突然从苏州河北打来一颗炮弹,在他们集中地点附近爆炸,当场有三、四个行人中弹伤亡。人民保安队队员由于事先受过训练,迅速卧倒在地,无一伤亡。大家站起来,并坚决表示:枪林弹雨吓不倒我们人民保安队队员,坚决完成向导任务。王关昶同志到现场进行动员后,队员们分别在大时鸣钟邮局、江宁路乐三记洗衣店门口和劳工医院等处待命。二十五日晚,陆续为解放军的一个营、一个连和一个侦察排做向导,在从恒丰路桥至造币厂桥的地区内,抢渡苏州河。当时,许多渡口还在敌军火力控制下,解放军和向导在恒丰路桥左侧,用木船强渡过河,在长寿路、莫干山路等渡口,则用木船临时构成的便桥渡河。为了防止被敌军发现,有的打通了沿河的厂房墙壁,荫蔽登上苏州河北岸。过河后,解放军在人民保安队的向导下,分多路攻克了麦根路火车站(现东站)和北火车站等敌人主要据点,有部分人民保安队员和解放军一起,还继续向虹口、江湾地区挺进。

在行军途中,子弹在耳边呼啸,人民保安队员走在前面,遇有情况解放军就忙着抢先,掩护人民保安队员,以免人民保安队员受伤。如在临近北火车站时,蒋军从对面仓库中,用密集的机枪扫来,解放军眼明手快,把人民保安队员按倒在地,靠墙壁隐蔽起来,避免了伤亡,人民保安队员无比感动。有的向导还协同解放军押送

俘虏。在胜利完成任务后，解放军同志热烈欢送，全体队员带着亲人解放军的深情厚意，陆续于二十六日凯旋归来，少数直到二十七日晨方才回来。除了第二分区外，其他各分区也有许多队员为解放军当向导，象华通电业机器厂一些同志，还获得了解放军颁发的奖状。

四月下旬的一天，上级党组织派沙文汉同志，由马纯古同志陪同，到沪西区检查工作。王关昶同志汇报了全区护厂斗争部署以后，沙文汉同志指示沪西区委应以苏州河以南工厂区为保护的重点，对苏州河以北要考虑其地理特点，作独立作战的准备。根据这项指示，区委任命顾松盛同志为第五分区政委，统一领导浜北地区的工作。二十五日凌晨，苏州河以南全部解放，敌军退守苏州河北。我第五分区一时与区指挥部失去了联系，他们在错综复杂的情况面前，临危不乱，沉着应付。大隆机器厂人民保安队积极保护了附近的铁路线。当他们看到一批游民聚众撬掘铁路护路木桩时，当机立断，鸣枪驱散，从而完整地保护了该段铁路。另外，驻守造币厂的敌军溃逃时，带走大批银元，大隆厂人民保安队早已有所警惕和防备，发现后立即上前将一麻袋一麻袋的银元，缴了回来。

二十六日凌晨，沪西苏州河以北地区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某团进入浜北后，因运输不便，缺粮三天，我人民保安队得悉后，积极设法向私营中纺二厂厂方借粮四千余斤，协助解放军解决了胜利进军中的困难。人民保安队就是这样和广大工人、各界人民一起，用实际行动，从各个方面支援和配合了解放军。

二十六日晚上，下着瓢泼大雨。各厂人民保安队配合解放军，除留一部分护厂外，分别在各分区队集合，分多路出动巡逻，警惕地防止敌人利用坏天气进行破坏。

二十七日，雨过天晴。经过三天激战，这时全市都已解放，明媚的阳光照耀着解放后的上海。地下党员、工协会会员、人民保安队队员和广大职工一起，实践了自己的誓言，用鲜血和生命为完整地保护工厂、保护学校、保护城市，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取得了护厂斗争的历史性胜利。沪西地区的每一台机器，每一个工厂，每一项重点设施，都没有遭到破坏，使敌人的破坏阴谋彻底破产，从而使解放后的新上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得以充分发挥其老工业基地的作用。这是中共上海地下党长期来贯彻执行了毛主席“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的胜利成果，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多少年来，前赴后继，英勇斗争，流血牺牲所取得的胜利成果。

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妄图颠倒历史，对许多地下党员、工协会会员、人民保安队队员和老工人，捏造了许多诬陷不实之词，把许多人打成叛徒、特务，不少人被迫害致残、致疯、致死，充分暴露了这伙反革命分子对人民革命的仇恨和残暴的法西斯本性，最后终于为历史车轮碾得粉碎，受到历史的公正而严厉的审判。

回忆历史，拨乱反正，让我们更加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继续奋斗！

#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 第一印染厂护厂史料编写组

上海第一印染厂，原是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三一年建造的一家大型棉布印染加工厂，号称远东第一大厂。抗战胜利后，伪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成为官僚资本企业。它是为中纺系统十几家棉纺织厂生产的棉布进行印染加工的工厂。所生产的花布、色布畅销国内市场，是中纺公司每年得利最多的一个重点企业，所以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视，各派反动势力都想插手这个厂，企图从中取利。反动派为了巩固它的统治，在这个仅有七百多人的工厂里，先后建立了十几个反动组织，其中有施耀宗、江玉堂为首的国民党区分部，有施耀宗为首的“工福会”，有严桂生、王福才为首的中统特务小组，还有为数达一百多人的护工中队和以周摩西、林其楠为首配备了手枪的义务稽查大队摩托车分队，加上伪中纺公司各派系安插进来的政客和一批青、红帮流氓势力。总之，工贼、特务、党棍、地痞、流氓，成群地压在工人头上，进行残酷的统治和剥削。

早在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间，我党地下组织就派了两名党员进入厂内，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抗日胜利后，广大工人为了争取民主，保障生活，要求国民党政府发救济费，组织工会，曾先后在沪西平民村集会，并大闹伪市党部，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工人们在亲身经历中，看到杨善等同志是代表工人利益，能为工友们热心办

事的人。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以自己在斗争中的实际行动扩大了影响，获得了好评。可是，当时厂内地下党的力量薄弱，斗争缺乏经验，在一九四六年初工会成立后不久，领导权被大工贼陆京士的爪牙施耀宗一伙所篡夺。他们骑在工人头上无恶不作，经常找借口发帖子、“打秋风”，敲榨工人血汗，平日西装革履，出入舞厅，贪污工人会费、合作社经费更是家常便饭。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工贼，在他们控制下，工会完全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成为官僚资本欺压工人的御用工具。厂里的地下党员经过研究，把施耀宗的罪恶事实一桩桩、一件件在工人中揭露出来，激起群众对他们一伙的义愤。

一九四七年春，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新阶段。为了迎接革命新高潮，在中共沪西区中纺系统委员会的领导下，于一九四七年五月成立了一印厂地下党支部，共有十二名党员。从此，他们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地带领广大职工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一系列斗争。党委和支部经过多次分析研究，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广大工人，认为必须利用工会这个合法组织来领导工人群众同敌人作斗争，决定作好一切准备，夺取工会的领导权。要在工会改选中，进一步壮大民主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集中力量打击反动势力最顽固的施耀宗一伙。除了在群众中广泛开展口头宣传活动外，一方面做好胆小怕事的工会小组代表的工作，使他们站在进步力量一边，劝说他们绝对不投施耀宗的票，或者弃权。另一方面，利用反动势力刘志远、邵忠义与施耀宗的矛盾，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粉碎他们联合起来竞选的阴谋，从而使选举的形势有利于杨善等六位地下党员。一九四八年八月工会改选结果，经过地下党支部事先研究安排的二届工会理监事候选人名单全部当

选，夺取了工会的领导权。

这场选举斗争，使以施耀宗为首的首届伪工会领导成员全部落选，只保留了一个候补理事。这是一场民主、进步势力与反动、黑暗势力的大搏斗。通过这场斗争，阶级阵线分明，谁个劣，谁个好，广大工人群众明明白白，全厂工人为这次工会选举胜利而奔走相告。从此，秘密支部成为领导和团结工人的战斗堡垒。

### （一）搬迁和反搬迁

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横渡长江，蒋介石反动集团妄图凭借长江天险，重振残兵败将，阻挠我人民解放军南下。蒋帮一面放出和谈空气，一面继续欺压蒋管区人民。在一印厂内，反动派秘密策划在工厂里拆除机器设备，准备迁厂到台湾。地下党支部根据上级指示，在全厂工人和职员中广泛展开了宣传，揭露敌人假和谈阴谋，提出了“反对搬迁，保护机器和工厂，就是防止失业，保护饭碗”等口号，得到了广大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支持和赞同。地下党支部发动党员团结和组织周围的积极分子，对重点车间和重点设备确定专人负责保护，防止敌人破坏，并布置可靠的积极分子对厂内的坏蛋暗中加以监视。当时，印花车间的王福才（中统特务、护工队中队长）和技术员周摩西（伪义务稽查大队骨干分子）两个坏家伙，在工人和部分技术人员中活动，散布台湾是个海岛，有美国人保护，把印花机搬到那儿照样可以办厂等。地下党组织发现这一情况，认为必须加强工程技术人员中的工作。印花车间主任王菊生（英国留学生）和雕刻车间主任技师（曾在英商纶昌印染厂工作），为人正派，过去受过外国人的欺压，富有爱国主义和正义感，不愿跟反动派到台湾过寄人篱

下的生活。党组织就根据他们的态度和与他们谈心。经过启发，他们完全同情积极支持反拆迁斗争，并以实际行动和工人们一起对车间内的机器和印花滚筒进行盘点并加强保管。不久，又传来了反动派企图把一批旧的印花滚筒运往军火工厂做弹头的消息，工人们就不把这些滚筒报废，进行维修后继续使用，甚至把切削下来的紫铜屑也贮藏起来，不让运出厂去。

大炉间是工厂的心脏，为了防止敌人因拆不走锅炉而进行破坏，地下党员老高和老工人盛妙生两人，发动大炉间几个老工人按三班分工负责保护锅炉设备，确保运转。老高还告诉几个拉煤的老工人，对大炉间的每一车煤都要认真进行检查，把各种异物拣出来，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其次，对染色车间的黑布车、红布车，整理车间的拉幅车、电光车，机修车间整修的紫铜烘缸等重点机器设备，都由所在车间的地下党员会同积极分子采取定机定人的办法看管保护，使敌人策划搬迁的阴谋未能得逞。

## （二）“应变费”的斗争

二月初，上级党组织指示一印厂地下党支部：在中纺公司里的职员已经发放“应变费”的情况下，也应开展争取中纺公司发给工人“应变费”的斗争。支部经过研究，决定由工会出面与厂方交涉，搞一笔“应变费”，争取购买到一批能保证全厂职工三个月食用的粮食。

工会里的地下党组成员研究后，由杨善（地下党员）召开工会理监事会议，说明局势紧张，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关心工人生活，故向厂方交涉发放工人“应变费”，购买一批粮食加以贮藏。杨善

和两个常务理事负责与厂方交涉谈判,但是没有得到结果。后来经过工会地下党组研究,认为针对厂方态度,下次交涉时必须依靠群众对他们施加压力。

一天上午,正当总工程师刘蕃昌和各课主任都在厂长室开会时,杨善等带了几个工人代表走进去,问厂长购买应变米的钱准备好没有?韩良勋(人事课主任)这坏蛋感到不妙,立即站起来说:不是厂长不肯买米,而是怕我们厂跑得太快而冒尖出事,想看看人家厂怎么样再说。刘稻秋(厂长)马上接着说:韩主任说得对,主要想看看人家厂的行动再说,而且厂里拿不出这笔钱来。杨善就说:我们工人说话爽气,要办就办,拖拖拉拉做啥?如果厂里没有钱,为什么不去找中纺公司?我们工人可以和你们一起去,局势这样紧张,早办一天好一天。一个青工代表对着韩良勋说:韩主任只怕冒尖,就不怕厂里工人闹起来你无法收场吗?你想想,万一发生什么变化,上海被封锁,全厂工人没有饭吃,大家都来找你人事课,你吃得消吗?韩良勋听了,脸上显出一副尴尬相。接着工会常务理事小董(地下党员)严正地表示:我们工会是受工人委托来和你们商量的,你们这样拖拖拉拉办事不爽气,那么就由工人直接找你们谈,工会不管这件事了!“笑面虎”韩良勋看到工会代表发火,马上装出一副笑脸说:嗨嗨,嗨嗨,大家不要急,一起再商量商量嘛!这时总工程师刘蕃昌对厂长说:要应付突然事变,厂里没有点准备是不行的。理事长说得对,厂里没有钱可以去找公司,你现在打个电话约一下公司总经理,能否下午去公司请他想法拨些钱。你如认为一个人去不好说话,我愿意陪你去,或请工会也派几个代表一起去商量。刘稻秋推了一下眼镜,看了看韩良勋。韩良勋点头示意后,刘稻秋便无可奈何地说:好,好!就按总工程师意见办,你们工会也派几个代



表，鄙人一同去总公司找总经理商量吧！

下午，厂长带了刘总工程师、人事课主任、会计课主任，工会由杨善和两个常务理事参加，共同到中纺公司找到了顾总经理。在会议室，刘稻秋先开腔说：今天来找总经理，主要是厂里职工想买一批米，钱不够，想请示公司能否拨一些钱给厂里？理事长杨善接着就对刘稻秋说：刘厂长你的话没有讲好，总经理弄不清楚，还是我说一说吧。她随即转过脸对总经理说：最近以来时局这么乱，大家都在搞“应变”，我们厂里有七百多职工，当然也应该搞点应变措施，所以工人派我们与厂长商量，准备买一批应变米，但厂长说没有钱，因此我们才一同来找经理商量的。顾听了后马上脸一沉说：公司里近来也很困难，头寸很紧，也拿不出钱来呀！工会另一个常务理事听了总经理的话后发问说：总经理，你说公司头寸紧，那为什么公司职员发了那么多应变费，而我们工人要买点米就说没有钱，这是啥道理呀？总经理听了便站起来讲，这是谁说的？你们不要听谣传，哪有这回事！于是小董又对他说：总经理先生，这件事是公开的秘密了，中纺公司职员拿了应变费抢购银元、外汇的消息快要见报了，不是什么谣传！我们今天是客客气气和你商量弄钱买米，如果不客气的话，明天工人就会来找你要发应变费的！小董这么一说，好似一颗子弹击中了总经理的要害。他红着脸正要说话时，旁边的刘总工程师说：总经理，公司要我们厂维持正常生产，但厂里预防突然事变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万一有什么事，生产怎么维持呢？今天代表同厂长商量买一批米，目的也是为了在任何情况下，能保证生产不中断，请你考虑一下。总经理听了这些话后，沉思了一下便问：你们要买多少米？杨善回答说：全厂员工三个月的吃粮，五百担。总经理听了后说：要买这么多？公司有困难，拿不出这

么多钱！刘稻秋听了马上朝着工会代表劝说地讲：总经理讲太多，那我们就先少买一点，请公司另外多给些备用金就是了。工会代表三人商议之后，小董就表示：一次买太多，可以分批买，先买二、三百担。这时，总经理即把公司总会计处主任找来，会同厂长等商量后，答应说：你们先回去，公司明天拨一笔钱给你们，先买二百包再说。杨善考虑谈判有些结果，为了不使问题搞僵，最后表示同意。

第二天，工会便催促厂会计课派人去公司领回应变费伪金圆券三十万元，并买了三、四万斤大米，同时还买了一批咸黄鱼和咸菜等副食品。这些物资，为后来开展护厂活动提供了物质准备。

### （三）护厂和反护厂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国共和谈破裂，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午夜我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蒋介石吹嘘的长江天险象肥皂泡一样被扑灭。一印厂地下党支部将这一胜利消息印成了传单，并张贴在厂内，还通过地下党员及积极分子在群众中展开口头宣传活动。工人们奔走相告：解放军过江啦！一群群人围在一起，谈论我人民解放军象天兵天将。厂内一些国民党特务、爪牙们，也聚在一起议论，哀叹“土八路这么凶，中央军不象话，长江江防筑了几个月，一天就垮了！”

此时，地下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在敌人面临将被消灭之时，它们还会进行垂死挣扎，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动员全党，组织工人进行护厂，配合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开始时秘密地把一些思想进步、同情党、靠拢党的积极分子，发展为“工人协会”成员，并以他们为骨干，保护机器，监视敌人，防止破坏。为了使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都投入到护厂运动中来，要迅速争取护厂合法化、

公开化、群众化。为此，地下党领导的厂工会，利用伪中纺公司发给各厂进行护厂的通知，督促行政公开组织护厂团，由工会理事长杨善同厂长刘稻秋磋商，确定由厂长和工会在四月二十六日联合召开全厂各部责任人、各支部长和工会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确定了事先研究好的护厂团组织名单：由厂长任总团长，工会理事长任团长，还设两名副团长，下设总务、纠察、联络、调查、消防、救护等六组，各组配正副组长四人。厂内那些反对护厂的坏家伙代表，一看护厂团组成人选中他们的人比较少，心里发慌，就放出阴风说：打仗炮火连天，家里有老有小，保家还来不及，那有心思来护厂！有个坏蛋又说：炮弹、炸弹没有眼睛，万一落在厂里，谁也护不了厂，等等。他们散布战争恐怖的谬论，当场老工人代表起来驳斥说：我们工人的饭碗是什么？是工厂！如果工厂被破坏了，就等于饭碗被砸碎了，那时你一家老小去吃什么？所以我们大家应保护好工厂。染色车间老工人李海亮说：我不相信一颗炮弹会把我们工厂都炸光，但我相信一颗炮弹落在工厂里会引起大火，如果没有人护厂，没有人灭火，再大的工厂也可能被烧光。所以我们工人一定要把工厂保护好。老工人的发言，得到了到会工人、职员代表的热烈赞同。

在会上，他们第一招失败了，又来第二招。一个被称为军师的坏蛋阴阳怪气地说：既然要护厂，那就叫厂里的护工队来搞就是了，用不着另起炉灶搞什么护厂团！当他话音刚落，几个爪牙稀稀拉拉拍手附和说：对，对。但是许多工人、职员代表听了这话是辨出味道来的，群众知道厂内护工队中有一支是工会控制的，但还有一支护工队是中统特务王福才控制的，因而许多代表起来反对。女工代表、艺训班的艺徒代表、技术员、工程师代表也都赞同全厂职工

参加护厂。于是工会理事长归纳大家意见说：保护工厂，人人有责，我们一定要把大家组织到护厂团里来。经过表决，通过由四十一人组成的护厂团领导机构，还决定了三件事：一、由行政拨出布匹做护厂团的袖标；二、凡客商来厂提货，需经护厂团同意才能出厂；三、总仓库钥匙每天日班下班后，应交工会负责保管。这样，护厂团的领导权和工厂的机器、仓库、大门都切实掌握在我地下党员、工协会会员和基本群众手中，反动派破坏护厂的阴谋宣告失败。

反动的顽固分子是不甘心失败的，尽管他们的阴谋一次又一次地被揭穿，但他们一遇机会就钻空子。护厂团成立后第四天（四月卅日），人事课韩良勋、金震民利用草拟护厂团组织细则的机会，背着护厂团团长，以“人事组”的名义召开会议，推翻了廿六日会上通过的护厂团下设总务、纠察、联络、调查、消防、救护等六个组的决定，而改设人事、工务、总务、会计、膳食和消防组，并在“人事组”下设医务、纠察、联络三个股，把原来的纠察、救护、联络三个组统统划在“人事组”的管辖下，并擅作分工，推定工政股特务金震民为纠察总队长兼第一小队队长，企图篡夺护厂团的领导权。这情况被我地下党组织发觉后，一方面由杨善出面找厂长和韩良勋进行交涉；另一方面发动群众进行抵制，要护厂队员仍按原来的组织体制执行任务。经过斗争，两个坏蛋自知理亏，只好龟缩在人事课办公室里，不敢再过问护厂团的事情。

数天后，工福会特务、工会指导员吴健，奉了主子之命来厂工会，找工会理事长，气势汹汹地说：护厂团是谁叫你们搞的？客商来提货为什么不发货？……正当工会理事长向吴健说明情况时，正在工会的工务员、护厂团员李风鸣便把吴健不准成立护厂团的消息传到了装璜车间。这个车间是全厂女工最集中，也是我地下

党力量最强的地方。当女工们听到这个消息时，马上关了摇布车，几十个人戴了护厂团袖标涌向工会办公室，围住吴健评理。吴健两手撑在腰上怒气冲冲地说：你们来干什么？谁叫你们护厂的？女工们毫不畏惧地回答说：中纺公司叫我们护厂的，是我们工人自己要护厂的，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工人护厂？吴健睁大了眼睛，大声喊叫：你们这些小姑娘能护厂吗？不要上当，护厂是共产党搞的！这时，有个女地下党员嘲讽地对着吴健说：吴先生讲话有点滑稽，我们工人保护工厂有什么不好？你说护厂是共产党搞的，那么国民党不要护厂而要破坏吗？吴健被女工们驳得哑口无言、张口结舌，脸上露出横肉，一阵白一阵青。为了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工会理事长杨善一面动员女工们回车间生产，一面把吴健连拖带拉地推进了厂长办公室，由工会、行政同吴健谈判，达成了协议：一、护厂活动照常进行，但不戴护厂袖标；二、客商来厂零星提货照发，但大批提货必须用白坯布调换。这个老奸巨滑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得到了这点“面子”，夹着尾巴溜走了。事后地下党支部把装璜车间女工们敢于斗争的精神和谈判的结果，在全厂护厂团员中进行了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护厂斗志。

但是厂里一些坏蛋对他们的失败并不就此甘心，他们抓住护厂团不戴袖标这一空子，散布说：护厂是共产党搞的，所以有些人袖标不戴了，不护厂了等等。后来又造谣污蔑说：护厂团中男男女女在一起，夜里不做好事情。有的不仅在厂内散布，还到一些女青工家里讲，要家长不让自己姑娘参加护厂活动。敌人这一招，开始曾在少数女护厂团员思想上产生一些顾虑，有的家长也阻挠她们在夜间参加护厂活动。地下党支部发觉这一情况后，便采取了措施，对厂内一些破坏护厂活动的坏蛋，以上海工人协会名义对他

们印发了警告信，警告他们要认清形势，改恶从善，停止一切捣乱和破坏活动，否则将受到人民的惩罚和制裁。警告信发出后很起作用，不少坏蛋破坏护厂活动的行动有所收敛。个别坏蛋收到信后，表示要改恶从善，不再做坏事。

就是这样，在和工贼、特务、坏蛋的破坏进行反复斗争的过程中，护厂队伍不断扩大，护厂活动也持久地巩固下来，护厂活动内容也更广泛了，从巡逻查岗到训练救护、包扎。厂医务室两个女护士，一个是天主教徒也热情地为护厂工作。护厂活动深入人心，真正在群众中扎了根，许多参加护厂的工人搬了铺盖住进厂内，坚持参加护厂斗争，与工厂同命运，直到上海解放。

#### （四）团结大多数

五月初，我人民解放军解放杭州，切断上海到杭州的铁路、公路，把蒋介石军队南逃的后路堵住，上海的敌人处在人民解放军的钳形包围中。夜间，火光闪闪，炮声震天，厂内的护厂工作有秩序地进行，除了两人一岗，还派出了巡回流动岗哨，同时对主要通道、机器房、配电所等，加派秘密纠察加强值岗，注意动向。

厂地下党组织分析研究了我人民解放军在上海外围战斗告捷的形势，为了完整地保护工厂，决定进一步发动职员、技术人员支持护厂工作。全厂有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一百多人，其中工程师以上有十多人，他们支持护厂还是反对护厂，对打击韩良勋、金震民、周摩西、凌其楠等反共顽固派，争取中间势力，发展民主进步力量，夺取护厂斗争全胜有重大影响。在“保护工厂，人人有责”的口号推动下，绝大部分工程技术人员、职员都关心工厂的命运，他们中间不少人收听陕北电台广播，和工人交谈新闻，脸上流露出解放

在望的喜悦。总工程师刘蕃昌在护厂团成立大会说过：工程技术人员要做好本职岗位工作，努力保护好工厂。厂地下党组织支持这一意见，进一步推动他们在本职岗位上做好护厂工作，做到日班、夜班随时可以找到技术人员处理各种事情。另一方面，争取部分技术员参加自来水塔、输电设备、机器设备运行检查，防止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故。如许林卿是个工人出身的电气技术员，从建厂开始进厂当学徒，对全厂电网很熟悉，技术又好，不要图纸，一看现场就知道哪一条线路发生故障，在护厂斗争紧张时刻，常常做夜班，一刻不懈地对输电设备等进行检查。

一天，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突然派来一名军官，说是奉上级命令驻厂办公。这个情况立即引起护厂团领导中我地下党员的注意，敌军官在厂设点办公，这对争取护厂胜利是个严重障碍。为此，护厂团负责人杨善要总团长刘稻秋想法说服那个军官回去。但刘稻秋胆小，怕惹怒敌人引起麻烦，不敢表态。杨善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总工程师刘蕃昌，指出这是伪警备司令部蓄意破坏，监视工人护厂，希他找刘稻秋厂长商量，设法把那个伪军官撵走。在刘蕃昌的影响下，刘稻秋在会见那个军官时冷淡地表示：一、一印厂按中纺公司规定，早已成立护厂团，各项工作在厂长主持下，正在有秩序地进行；二、本厂办公地方甚小，只能在原布仓库旁边一间小房子里放一小桌子坐坐。这样，那个伪军官处在我工人群众监督之下，他的一举一动，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没几天，这家伙就不辞而别，溜走了。

### （五）在敌人眼皮下印制人民保安队臂章

五月中旬，人民解放军逐步向市区挺进，市区即将解放。厂地

下党支部接到上级一项紧急任务，即为上海人民保安队沪西区指挥部赶制锌版及印制六百只上海人民保安队袖标，以备上海解放时使用。党支部研究后，决定由杨善去找机动车间参加工协的老工人完成制锌版任务。五月二十日，杨善找了老工人俞银泉，要他凿一块上海人民保安队镂空字锌版，以印制袖标，在解放时派用场，最好能在今天下班前完成。银泉师傅听说解放时派用场，心情万分激动，表示一定能完成。但他不是白铁工，便悄悄地找来护厂队员李宏宝、孙阿清两位老师傅到小阁楼仓库，由阿清师傅在楼下望风，老俞在小阁楼上协助宏宝师傅做锌版。宏宝师傅技术熟练，敏捷地剪下一块6寸×12寸的锌皮，银泉把事先准备好的字样用笔描在锌皮上，仅仅半个小时，他们就把上海人民保安队的镂空锌版凿好，交给地下党组织。

印制袖标的任务，党组织交给装璜车间党小组去完成。装璜车间党小组长把锌皮交给了地下党员王明珍，要她在三天内印好六百只人民保安队袖标。王明珍接受任务回家后，经过一番思考，当夜去找小组里另一个党员赵菊英，两人一起研究具体做法。

第二天清早，她们提前上班进车间，趁一时还无人，就立即动手把车间里堆放的零头漂白布拿来，一人按袖标尺寸一块块剪下来，一人就用缝纫机缝起来。不多一会，缝好了三百多只，后来又以护厂团、救护队需用袖标的名义，公开缝了二百多只。但印刷六百只袖标是个艰巨任务，白天装璜车间特务、流氓多，易引人注目。她们商定，把印上海人民保安队袖标的意义，向参加工协的女工吴阿妹交底，由她来担任警戒、望风。她们还是用老办法，隔天三人提早上班，趁大家还没有来，三人将车间里的布匹堆起作围墙，中间留下一个空隙，由阿妹坐在布堆外面假装补工作服，她们两人就



在布堆空隙间动手印刷袖标，一人双膝盘坐在地板上，用手揪好坏布袖标和锌皮，一人跪在地板上，一手端住盛有印料的肥皂盒子，一手用小牙刷认真仔细地一张又一张地进行印刷，终于在上班前完成了印制任务。

第二天，她们把印刷好的六百只上海人民保安队白底红字袖标，按时交给了党组织，怀着胜利、喜悦的心情，进一步团结群众投入到激烈的护厂斗争中去！

### （六）赤手空拳粉碎敌人垂死反扑

五月二十三日，这是敌人进行垂死挣扎的日子，在我们一印厂内同样是如此。下午三时许，伪警察局出动飞行堡垒及近百个便衣武装警察，从大自鸣钟（现西康路、长寿路交叉口）起至西苏州河摆渡口，布满哨位，在靠近一印厂宜昌路口停了一辆红色飞行堡垒，车厢上架着机枪，前面还有一辆小吉普车。

这天下午，厂内的一些特务、爪牙气势汹汹、十分猖狂。二时左右，中统特务王福才摇摇晃晃走进工会办公室，面带奸笑和值班常务监事潘学锦（地下党员）打了招呼后，朝靠墙壁的椅子上一坐，跷起二郎腿，一面抽烟，一面看申报。这家伙往常来工会溜溜，坐上片刻就回车间生产，这一回与往常不同，坐上一个小时还不走。这一反常情况，引起了小潘的警惕，他坐在办公室思考着，前几天党小组研究了敌人动向，获悉反动派将来厂抓人，这与王福才现在不寻常的动态，看来很有联系。他边思考边注意厂门口动静，突然看见警卫室一个警卫陪同五、六个戴鸭舌帽的便衣特务，向人事课工政股特务金震民的办公室那里走去。

不一回，两个特务从人事课走到工会，凶相毕露地问小潘：“理

事长杨善在哪里？”“不知道，刚才她还在的嘛！”小潘回答说。两个特务又转身回人事课，中统特务王福才也起身跟到人事课，接着装璜间的几个特务、爪牙也被喊到人事课。小潘心里着急，思考怎样把这情况迅速告诉在外面开会的杨善和董选文同志，让他们不要回厂。正巧工会的公务员小李匆匆跑进工会，小潘对小李使个眼色，走出工会，轻轻地说：“你立即设法出厂到国梁家去一次，把厂里情况告诉他，叫他不要上班，我等你回音！”小李利用公务员身份，溜出厂门。

小李刚出厂门，厂里一批特务纷纷从人事课跑出来，有的到装璜车间，有的到工会里，追查杨善的去向。这时，在人事课里，一个身穿黄色卡其服的便衣特务坐在椅子上，对旁边站立着的一批厂内特务分子、爪牙训话：“你们这批都是笨蛋，把共产党分子放跑了！”

国梁得到小李报信后，马上向在他家开支委会的同志讲了情况。支委会立即商定注意隐蔽，并由支部委员小曹通知工会党组成员杨善、董选文等同志，要他们立即分散隐蔽，并指定一名党组成员回厂，使护厂工作不间断地照常进行。

特务们在工厂里兜了几圈，象丧家之犬，夹着尾巴，带着一批小喽罗和工政股长金震民一起离厂。同时，留下两个特务继续在厂里守候。敌人这一阴险毒辣的反革命部署，被我地下党员张维全和原布间王更生（工协）等几个青年工人发觉，他们放工出厂后，分别站在长寿路以北西康路上的几个交叉路口，等候一些同志，要他们不要回厂，最迟的一直等到晚上九点钟才回家吃饭。

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这是颠扑不灭的真理。一印厂地下党组织就是依靠了群众，赤手空拳地粉碎了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反扑！

## （七）配合子弟兵

五月二十五日凌晨，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苏州河南的沪西区。坚持在厂里进行护厂斗争的地下党员和护厂团员们得此消息后，顿时群情沸腾，纵情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不一会，一支人民解放军队伍进驻到厂里，但当时苏州河北岸还有国民党匪军残部顽抗。解放军同志向护厂负责人要求配合，迅速赶装二百包沙袋，作架设掩体工事之用。为了消灭敌军残匪，全厂的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仅花了三个小时，就完成了二百多个沙包，运往摆渡口和造币厂桥头等处，配合解放军架设工事。

原来分散隐蔽在厂外的部分地下党支部负责同志闻讯后，纷纷回厂，地下党支部立即展开工作。除了会同厂内护厂队继续进行护厂和坚持生产外，还配合人民解放军搜查国民党匪军散兵游勇，并在分工地段进行巡逻、站岗，动员商店开门营业，维持社会秩序，以及收集敌军溃退逃跑时遗留散失在路上的枪支、弹药、汽车等军械物资。全厂一百多名人民保安队员佩戴上袖标，在沪西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紧张而有秩序地展开了活动，并以更加高昂的斗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投入新的战斗。

## 法电工人为实现“三不停”而斗争

权琳甫 马少林 孙进福  
许炳山 陆如松

创建于一九〇六年的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简称法电），是解放前法帝国主义凭藉其在华租界特权，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公用事业托辣斯。早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派了李富春同志到那里开展工作，散播红色种子。一九二六年法电党支部成立，同时工人组织起自己的工会，从此法电工人斗争就有了正确的领导和明确的方向。四十多年来，在旧社会的漫漫黑夜里，法电工人前赴后继向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法电回到人民手中，改名为沪南水电公司。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法电工人，一直是上海工人运动的坚强堡垒，在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中，表现得更为出色，为上海工人运动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水、电、交通是现代化大城市的命脉，犹如血液之对于生命，一天不能缺少。法电这一垄断性企业，规模庞大，直接关系到广大市民的生活和全市的生产。一九四九年初，我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所向无敌，继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百万雄师即将飞渡长江，上海解放在望。国民党反动派末日临头，一面对人民疯狂镇压，一面准备大肆破坏，企图使上海这个大城市陷于瘫痪。

针对这一情况，上海地下党领导提出：公用事业要力争做到“三不”——不停电、不停水、不停交通。法电工人围绕这一指示，积极开展护厂斗争。

在历次斗争中，法电地下党支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但千条万条，依靠群众是第一条。他们真心诚意为群众服务，关心群众疾苦，平时就注意广结朋友，扩大力量，从谈心到交心，广泛取得群众的信任。因此，尽管历史上法电党组织曾多次遭受到敌人的摧残、破坏，有些地下党员被捕、被关、被杀，备受各种迫害，但党组织依然屹立不倒，象一盏不灭的红灯，照亮每个法电工人的心，成为数千法电工人斗争的核心。

护厂既为国家为民族，也为工人自己，这个道理，很快为群众所接受，并得到热情的支持。不久，一支雄赳赳的护厂纠察队，就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组织起来了。与此同时，工人协会法电支会也宣告成立，借以领导纠察队，统一护厂斗争的步调。组织纠察队前后，法电总支书记权琳甫废寝忘食，积极执行上级党的决议，布置护厂任务。他日日夜夜与工人群众战斗在一起，情绪十分高涨。

过去多次罢工，法电工人总是走在斗争的前列，人们誉之为“红色堡垒”。敌人一向把法电当作肉中刺、眼中钉，恨不得一举消灭之。护厂纠察队决定与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的口号是：“人在厂在，决不允许敌人动一动我厂的一草一木”。五月十日，机务部门的纠察队开始执行护厂任务，到了五月二十日，七百多位纠察队员全部住进厂里。在反动魔王汤恩伯“格杀勿论”的白色恐怖下，反动派的警备车成天鬼哭狼嚎地在街上窜来突去，报纸上登载着今天枪毙“黄牛”、明天枪毙“奸商”（实际上是屠杀共产党员和镇压革命群众），真是“机关算尽”。对于这些花招，法电工人心

中雪亮，蒋家王朝的末日近在眼前了，敌人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灭亡之前必然更加疯狂，这是规律。纠察队里的每个战士，日夜张大警惕的眼睛，密切注意社会上、工厂内的各种动态，作好对付突然袭击的准备。

参加护厂纠察队的除七百多个男工外，还组织了二百多个工人家属进厂共同战斗。万一敌军进厂破坏，就由这一支家属队伍带着她们的孩子去“拚”、“斗”，强调“我们要活命”，“我们要吃饭”，用各种软硬方法，顶住敌人。说起家属，还得追溯到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法电那次大罢工。那是一次全市性的罢工，声势浩大。国民党反动派扬言要在全市逮捕三千个工人领袖，法电工人既然是他们的肉中刺、眼中钉，压力就特别大。当时，法电地下党布置了五线作战方案，配备了五套领导班子，严阵以待，非要斗倒顽敌不可。第一线的领导是朱俊欣、周国强、张仁卿同志；如果第一线遭到破坏，就由第二线的蒋阿龙、杨金根、龚长根同志顶上去；第二线倒下，则由第三线的许炳山、陆如松、马少林指挥。他们灵活机动，前后呼应，充分发挥领导艺术，终于粉碎了反动派的大逮捕阴谋。这次罢工，法电坚持了七天半，罢工中深受群众爱戴的工人领袖朱俊欣、张仁卿、周国强、张浩波、刘振铭等十六位同志遭到通缉，被迫撤退离厂，另有四十七名工人被厂方开除，民主工会被无理解散。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法电地下党组织坚强不屈，一面揭露反动派与工人为敌的狰狞面目，进一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一面发动群众发扬阶级友爱，说明“天下工人是一家”、“他们为我们受苦，我们应帮助他们”等道理，对被通缉、被开除工人的家属发起募捐，以解决家属们的生活困难。参加捐款的职工，仅车务部与机务部，就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每月到了发工资的日

子，工厂门口就有许多人自愿解囊，把钱投入设在工厂门口的捐款箱内。当时物价飞涨，大家收入微薄，但都能同舟共济，表现出阶级的情谊。尽管捐款的数目很小，但对广大群众的教育意义却很大。这一义举，从一九四七年底开始以来，一直坚持到解放，月月如此，从未中断。因此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更大，威信更高了。就是这一支家属队伍，在护厂斗争中与男工并肩作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法电工人不但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这方面，反动派和法国资本家曾经领教过好多次。如一九四六年闻名全市的法电工人“大请客”——一种别出心裁的斗争方式。这次怠工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是一次大胜利。从形式上看，斗争的锋芒是对法国资本家，实际上是为了冲破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限制罢工的堤防。交通不停，车子照开，乘客上车，一律“请客”，不用买票。有些乘客翘起大拇指对法电工人说：“你们的斗争办法真是妙啊！”法电这一炮打响后，在全市引起巨大反响，接着，激烈的年关斗争在全市各条战线开展，酒菜业、沐浴业、理发业等职工也运用了“请客”方式，使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经济上更进一步陷入困境。

这一炮打在法国资本家身上，痛在国民党反动派心上。他们恼羞成怒，竟然派出宪兵二十三团，开了警备车到法电来，说是要找工会代表“谈判”，实则要逮捕工会领袖，迫使法电工人屈服。法电工人是硬骨头，当然不答应。又一场斗争火辣辣地展开了。

恶狗进了工厂，这还了得！工人们闻讯，一群一群地围了上来。当时楼梯口已有宪兵把持，他们手执武器，居高临下，面对手无寸铁的工人，气焰十分嚣张。此时，只见人群中有一位工人，刷

的一声拉开上衣，露出胸膛，威风凛凛地朝着举枪欲发的宪兵大步走去，厉声高呼：“你开枪吧，譬如抗战八年，被东洋人打杀。”那个宪兵一时慑于他的气势，又见众怒难犯，被迫往后退却。在这当口，工人们一涌而上，冲进房间，把几位已经关在里面的工会领袖救了出来。这次斗争，法电工人称之为“劫法场”。法电工人有勇有谋，就是在一次又一次惊涛骇浪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法国资本家意识到工人的力量，终于也慢慢地被迫收起了那副趾高气扬的主子架势！

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腐败，法国资本家也有过切身体会。上海解放前一个多月，法国资方马西拉曾被逮捕，关了好多天。反动派目的是想借以敲法国人一笔竹杠，马西拉因此对国民党深为不满。后来他回国去了，接着调来另一个法国人勒莫尼。勒刚上任不久，对他前任的遭遇一清二楚，当然对国民党存有戒心。当时，领导法电工作的上级党组织马飞海、吴良杰、纪康等同志，和法电总支书记权琳甫同志一起，再三研究了法国资方的内心活动及他们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微妙关系，决定利用这一矛盾，使护厂斗争合法化。党组织委派许炳山、马少林、陆如松三位同志，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队的名义，先后三次到勒莫尼所住的南昌大楼去谈判。第一次去主要是宣传我解放军迅速发展的胜利形势，我党各项政策及保护外商企业的条例和规定，以稳住对方情绪，打破他不切实际的各种幻想，提高他对我党的认识。当这一预定目标达到后，继而向他正面提出，希望他参加护厂，和工人一起抵制反动派可能采取的破坏手段，并要他储备好六百包大米（每包二百斤）、咸鱼、萝卜干等，以供应护厂工人食用。勒莫尼向法国大班（经理）杜克莱和法国领事馆汇报后答复，愿意遵照办理。第三次前去谈判的目



的有两个，一是要他准备好五万银元“应变”，资方也满口答应了。他们为什么如此爽气呢？因为法国人看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而自己又无力保护自己的企业，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有所期待。我们有了银元在手，必要时便能发挥它的“神通”。因为反动派见钱眼开，上上下下，几乎无官不贪，有了银元便能阻止敌人的破坏阴谋。谈判的另一个也是主要的目的，是要法国资方通过法国领事馆跟反动头子汤恩伯打交道，拒绝敌人军队开进工厂。法国资本家出于他自身的利益，也表示接受。因此，直到上海解放，反动派始终没敢派军队进驻法电。

为了完成里应外合，使接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确实保证水不停、电不断、车辆照开，就必须在孤立一小撮敌人的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人，一起来保护人民财产。法电工人尽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减少护厂的阻力，为此展开了一场使人眼花缭乱的宣传攻势。他们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心理状态，发信五百多封。信中除了说明胜利在望、上海即将解放等道理外，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要工人提高斗志，迎接解放；要高级职员消除顾虑，为国效劳；要工头、领班、技术人员安心工作，等待接管；要特务、走狗老老实实，立功赎罪。除分别发信进行政策攻心外，党员同志更是废寝忘食，利用夜晚书写标语、油印文件、张贴传单。线路上的同志利用售票员职务上的方便，事先把准备好的宣传品放进票袋，把浆糊装入罐头及火柴盒子，趁一早去厂接班，见前后无人时，便沿途张贴。车间里是三人一组，第一人专涂浆糊，涂好走开，第二人悄悄贴上，最后一个抹平贴牢。三个人各司其职，动作敏捷，效果良好。一时，马路上、车间内到处都可看到由毛主席、朱总司令具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人们争相围观，奔走相告，人心大

为振奋。

调查研究,摸清情况,也是法电斗争的主要任务之一。要害部门,大小方棚的位置,沪南地区的沿途设施,工厂、学校、机关的情况,弄堂是“活”的还是“死”的,敌人碉堡的布局,黄浦江边的设施等等,都摸得一清二楚。此外,对地区情况,对敌人的动静也能做到了如指掌。这些情况,对协助解放军入城配合接管等,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时期,担任这些任务的同志真是辛苦极了。为了避开敌人耳目,有的同志每天风餐露宿,到公园过夜,有的到戏院打瞌睡,有的做“苦班头”,一落班就跑,夜里再回到厂里来护厂值班。他们完全做到不怕苦、不怕累,一心等待自己亲人的来到。

越接近解放,同志们的精力越旺盛,斗志越高昂。五月二十二日起,护厂纠察队开始轮流值班,彻夜巡逻。他们要保护车辆、水电设备完整无损,又要监视特务,预防破坏。当过法商公董局华董的大流氓杜月笙,一向仇视法电工人,在法电工人队伍中制造分裂,破坏罢工,与国民党反动派和法帝勾结一起,狼狈为奸。他过去曾在法电职工中拼凑过各种特务组织,发展流氓势力,对于这些人,纠察队员的警惕性特别高。原来法电交通部门拥有有轨电车、马达车六十二辆,拖车五十五辆,无轨电车三十八辆,公共汽车七十五辆,行驶线路有十三条,总长近一百公里;给水部门平均每天供水量约十万公吨,供应区域内近百万人口使用;发电部门约占全市供电量的十分之一强。这一切,都和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要保护好这些人民财产,使其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这本来就是法电工人的心愿。如今,他们正以实际行动来实现自己的宿愿。

二十五日早上,苏州河南地区解放,亲人解放军精神抖擞地来了,沪南区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马飞海来了。二十六日早上,一九四

七年底因被通缉而撤退到解放区的工人领袖、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的老英雄周国强也胜利归来了，全厂立即沸腾起来，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霄。

苏州河北面依然炮声隆隆，敌人还在负隅顽抗。法电工人又开始执行新的任务：配合解放军二十七军五十九师警备沪南地区；负责陕西南路到淮海中路八仙桥一带的社会治安；把行迹可疑的特务、坏蛋、国民党散兵游勇收押起来；清除并抢修马路上被抛弃、损坏的车辆，保证市内交通畅行无阻。为了更好地支前，运输队迅速地组织起来了。法电工人的豪迈口号是：“要人有人”，“要车有车”，他们把最好的车子开出来，帮助解放军运送弹药给养到外滩江海关一带，支援解放军追击苏州河北尚在垂死挣扎的敌人。当时，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拦路抢劫车辆的事屡次发生，他们企图往复兴岛方向逃窜。法电工人绝不允许敌人利用他们的车辆逃命，遇到这种情况，司机同志就把事先准备好的棉花球往司机座旁边的柴油箱内一塞，车子即使开动也是既开不快更开不远，三步五步一来就抛锚了，敌人只好干瞪着眼没办法。

在法电工人清除路面障碍物的时候，他们还得到一批意外的收获。反动派在主要路口设置了许多“沙袋”，名为沙袋，里面装的却是大米、黄豆等粮食。大家都清楚地记得，解放前夕老百姓啼饥号寒、沿门乞讨的悲惨景象，而敌人在覆灭前，却如此暴殄天物，真是恶毒之至！

上海解放后两个多月，法电电车三场挂灯结彩，喜气洋洋，上海市第一个工人自己的基层组织——法电工会宣告成立了。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及韩念龙等领导同志亲临参加。陈毅同志身穿短袖衬衫，热情洋溢地在会上

讲了话,对法电工人所走过的光辉历程作了高度的评价。

法电工人斗争了四十多年,终于迎了解放,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商一仁 整理)

# 确保电话畅通

沈 藩

上海电话公司原是美国纽约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上海的一个分公司，控制着上海市内（租界）全部电话通讯网。公司下设八个分局（江西路局、福建路局、泰兴路局、长阳路局、云南路局、海宁路局、汾阳路局、江苏路局），拥有十万家用户。解放战争时期，一千五百多名电话工人，在党组织领导下，和全市电力公司、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电车公司等六大公用事业职工团结一致，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为了配合解放战争，反击蒋帮的所谓“勘乱救国”的反动政策，电话党支部提出了“内战不停，电话不灵”的战斗口号，组织职工用罢工、怠工、示威游行等方式，针锋相对，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在接近解放的日子里，地下党运用外围组织——电话工人协会的名义，草拟了一个宣传提纲，通过积极分子散发出去。宣传提纲中提出了“保护工厂，保证生活”的口号，把护厂斗争同工人自己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把广大职工团结在党的周围。同时，还用已经撤退去解放区的党员罗培（倪复生的化名）、陆文达的名义，给公司高级职员和科技人员写了劝告信，晓以大义，要他们向人民靠拢，争取立功等等。在写给公司八个局的主任和自动机间的领班的信里，要求他们在解放上海的斗争中，坚守岗位，负责保护好机器等

项设备。当时电话系统地下党负责人冯绿荪同志还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工程师范宁寿家里，对他进行政策教育和细致的思想工作。劝告信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很多技术骨干都采取了积极态度。云南路分局机房领班张贵仁，还悄悄把地下党给他的信拿出来给进步工人们看，以表示地下党对他的信任。至于对那些国民党反动派的爪牙，象护工队长张万康等人，就用解放军先遣队的名义，写信直接予以严正警告，勒令他们老老实实，用实际行动立功赎罪。这些平时耀武扬威的家伙，接信后大都显示出垂头丧气、灰溜溜的样子。地下党通过以上活动，鼓舞了群众斗志，团结争取了技术人员，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为顺利进行护厂斗争打下基础。

临近解放前夕，伪警备司令部突然派人到电话公司监听电话。支部分析情况，认为敌人是通过监听来追踪上海地下党的活动的，就马上将情况向上级汇报，并采取对策，派党员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注意并记录他们窃听了哪些号码的电话和电话内容，把情况及时向上级报告。担任话务监督的党员王苏民同志，还利用职务便利，冒着危险将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保密电话号码都抄录了下来，转给地下党上级组织，成为向敌人展开宣传攻势的一个有效工具。

有一次，国民党警察局的“飞行堡垒”，突然打电话到江西路局测量室，要测量室按照他们报出的电话号码，查出户名和地址。那时，正在值班的是胡正明同志和吴士清同志，胡一听就知道敌人是为了要按址抓人。怎么办呢？胡机敏地决定利用公司的美商牌子，把敌人顶了回去。胡回答警察局说，我们测量室无权告诉你，按照公司规定的制度，要查用户电话地址，可打电话到总机交涉，转话务监督去查。敌人听了暴跳如雷，怒骂他有意贻误他们的紧要任务，宣称“抓不到人，就马上来抓你”。可是胡正明同志不慌不忙立

即通过电话巧妙地通知了敌人要查询的那几家用户注意，然后抢先向外国领班汇报，说明他是按照公司规章回答警察局的，公司必须给以保障，从而得到了外国领班的支持。不一会，“飞行堡垒”一伙匪徒，果然开着摩托车来了，他们带着手枪和手铐，气势汹汹地喝问刚才是谁接的电话？测量室的职工团结一致，没一个睬他。那些家伙摆出架势要动手抓人。地下党员就通过外国领班把那些家伙带到外国头子那里，外国头子表示工人执行规章是对的。那些奴性十足的坏蛋看到外国人出场，就吓得不敢噜苏，悻悻地夹着尾巴走了。

鉴于天津解放时电话设备受到严重破坏的教训，上海地下党在上海解放斗争中指示电话党支部，必须保证电话公司各分局的机房不受任何破坏。

电话党支部根据上级指示作了紧急部署。各分局的地下党员会同工协会员，在那紧张的日子里，日日夜夜始终轮流守护在机房里，密切监视着敌特人员和可疑分子的一举一动；严密注意机房的进出人等，防止外来陌生人进入机房；还随时巡逻着大楼和机房的各个角落，检视每一列电话自动机设备是否有异常情况，马达是否安全运转等等。因此保证了通讯设备的正常运转，保证了全市电话没有中断一分一秒钟。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市区苏州河以南地区解放了，苏州河北的蒋军，困守桥口进行顽抗，战斗极为激烈。福建路局的大楼，也受到蒋军的流弹袭击，但所有职工丝毫也没为战火所吓倒，仍坚持着各自的工作岗位，为迎接全市解放而顽强地工作。

党支部时刻同各分局机房保持电话联系。在苏州河北还没解放的时候，没有地下党员的海宁路局，工人积极分子陆连奎主动地

承担起守护机房的责任。党支部委员陈天保同志，忽然接到陆连奎的电话，说有一批国民党的散兵败卒，闯进了分局，陆与之交涉要求撤出机房，不但无效，反而被蒋军把机房里的职工统统赶进了地下室。支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用电话不断地对国民党官兵进行喊话，责以大义，晓以利害，同时指明出路，要他们立即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这批败兵受到电话喊话的影响，十分恐慌，就抢了些职工的衣服，换下军装灰溜溜地走了。

护厂工作的另一个侧面，是电话支部千方百计秘密绘制了一张电缆地图。电缆是把电话线路伸展到千家万户的纽带，如果电缆遭到破坏，电话线路就无法保持畅通。为了防止敌人破坏电话电缆，必须安排力量，重点保护。但是电缆地图是保密的，一向藏在外国头子手里，无法取得。电话党支部就派了顾笃璋、冯绿荪、徐家璠三人秘密作实地调查。顾等三人冒着生命危险，利用业余时间，分工包干，一条马路一条马路查看人井（电话电缆的地下检修室）的位置，把人井附近的路名、门牌号数暗暗地记录下来，而后画出了一张地下电缆地图送交组织，并由组织专门派同志巡逻值班保护，防止敌人破坏。

五月二十七日整个上海解放了，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通过英勇的护厂斗争，始终保持着电话畅通的电话职工，更加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地为全市军民辛勤地劳动，开始了新的战斗。



# 英联船厂斗争的日日夜夜

沙 玉 琳

## (一)

英联船厂是英国资本家开设的瑞镕、祥生、和丰、耶松及董家渡等船厂联合组成的企业，主要的两个船坞在杨树浦黄浦江西岸。一九四九年初，厂里一千多职工中，已有八名地下党员和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工人协会”。三月间，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上级党组织的周辛吾同志把厂里原来由上级分别用单线方式联系的沙玉琳、周云森、李学源、李坛贵、戴金林、毛志章等八名党员联合在一起，成立了支部，由我担任书记。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起重部的工人和伪厂工会的常务理事。

支部建立以后，我们立即展开一系列的工作。周云森负责刻印警告信，由李学源负责先后送、寄给厂内的反动分子和工厂附近的一些地痞流氓头子，警告他们要看清形势，不得再干对人民不利的事；我负责同英国老板交涉，以物价飞涨、时局不稳为由，迫使资方买进一批大米作“应变”之用。另外，我们还对工厂周围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机关、警察局以及仓库等进行了调查，画成草图，送给上级党组织。

正在我们紧张地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一天，周辛吾同志通

知我，要我们组织四十名秘密纠察队员，保护工厂。我和支部几位同志商量以后，决定从工协会员和“结拜弟兄”中选择四十余名同志，把纠察队组织起来。那时的“结拜弟兄”是我们地下党利用社会习惯团结和组织群众的一种形式。参加结拜弟兄的实际上都是厂里靠拢我们的一些工人。为了斗争的需要，曾先后由我和李学源出面，组织过两次这样的结拜，在斗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纠察队建立后，当时分析我们厂是英商的，国民党可能不会随便来搬拆机器、物资，护厂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破坏。但是厂这样大，部门这样多，怎么保护？大家商量，认为应该有重点。从历次罢工怠工斗争的情况看，方棚间是重点，方棚间一停，全厂都得停下来；另外两个船坞和泵房、水压机也很重要。把这些关键部门保护好，事情就好办了。于是，纠察队员分别将这些部门秘密地看管起来。

后来，上级党组织根据解放其他城市的经验，工人不仅要保护好工厂，而且还要协助解放军维持社会秩序，划定了要我们厂负责维持东至杨树浦桥，西至大连路，北到霍山路这一地段的治安。要担负这样艰巨的任务，原来四十多人的纠察队显然力量太薄弱了。上级党布置我们要扩大力量，组织四百人左右的纠察队。要组织这样多人，又须保密，这件事真是难办。但是困难吓不倒我们上海工人阶级。党支部讨论以后，想了一个办法，决定由我利用伪工会常务理事的公开身份，将工会的会员名册拿出来，排排队，把凡是对国民党反动派不满的以及住在离厂较近的新康里、公余里、长安里、太和街、鼎新里的富有正义感的职工姓名地址都抄下，必要时把他们紧急召集起来。后来在五月二十七日解放军到达杨树浦

的时候,这些同志成为人民保安队队员。

那时,英联厂的伪工会理事长叫凌仲芳,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工福会一级干部。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凌和厂里的一些反动分子都惶惶不可终日,平日的威风一扫而光。在南京解放以后,我们给凌送了警告信,他也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是逃还是留,正在动摇不定。我有意试探了他一下,发觉他害怕解放后会受到人民的惩罚,就对他说可以想办法立功赎罪,组织人员护厂,否则厂被破坏,一千多职工都要失业了。凌当时想脚踏两头船,对护厂虽然不表示反对,但深怕走漏了风声,共产党还没来,自己就先掉了脑袋,不敢出面组织。他对我说:“你的结拜兄弟靠得住,不会走漏风声,就从你的结拜兄弟中找些人吧!”我正好顺水推舟允诺下来,大胆地做了几十只袖章,并悄悄地刻了一个“英联船厂工人纠察队”的木章,由李学源等同志在袖章上盖好木章,藏在纠察队员杨振龙的家里。

五月初,伪上海市总工会以“反对共产党破坏”为名,要各厂组织自卫团,这正好为我所用。我就去取得凌仲芳同意,由我们纠察队打着自卫团的招牌,名正言顺地保护工厂。

## (二)

五月二十三日,在人民解放军包围上海、逼近上海市区的情况下,从前线溃退下来的一部分蒋军突然撤到杨树浦一带。英联厂和邻近的怡和纱厂、恒丰纱厂、海军工厂、申新七厂等,都驻进一些敌军,他们匆匆忙忙在江边修筑防御工事。这件事完全出乎我们的意外,如果敌人搞起破坏来,我们工人都是赤手空拳的,怎么对付呢?我同周云森、李学源、陈绍汉等几位同志商量以后,先派了谢云彪等去观察敌人动静,然后召集纠察队员,告诉大家不管有多少

危险，只有留在厂内，才能完成护厂的任务。大家都坚决表示要留在厂内，再加上因路远回家不安全而留在厂内的老年工人、青年工人一共约有八、九十人。

二十四日傍晚，厂里的敌军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两辆大卡车，乱哄哄地向杨树浦底逃去，我和同志们都暗暗松了一口气。但这时解放军已按预定计划，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这些敌军无处可逃，天黑时又回到了厂里。

敌军一回厂，对我们护厂工作确是很大的威胁。而且这时敌军已封锁了杨树浦路，我们无法同上级联系。大家议论了一下，觉得形势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国民党军队陷于孤立，士气低落，驻厂的敌军是二〇二师青年军。我们决定想法同他们接近，展开政治攻势，争取分化瓦解他们。

二十五日上午十时许，我带了王阿二、周炳建等四人，戴着自卫团的袖章到敌军驻地。敌军一个副连长说：“干啥事！”我说：“奉总工会的命令，与你们一起来保护工厂。”他说不需要，我就晓以利害。正在争执时，敌军连长出来说：“蛮好，蛮好，来了好帮忙做点事体。”我一听他说好，马上又叫刘鸣皋、唐永宽等一起去帮他们生火烧饭。我们几个人一边干活，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开了，这个说他的亲戚去当了兵，生活怎么苦；那个说他的表哥在部队里实在待不下去了，但不敢逃，逃一逃就是“临阵脱逃，就地枪决”，家里人都哭煞了等等。说得那些士兵个个垂头丧气。

王阿二嗓门最响，正说得起劲，不知哪个士兵悄声说：“指导员来了”。王回头一看，见是个军官模样的人，心里有点紧张，就拎起一只水桶走了。谁知那指导员跟在王阿二后面一起走，我们都为王捏了一把汗。没想到敌指导员见周围没人，悄悄同王阿二拉起

同乡关系来了。原来这指导员叫谈寿延，原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家就住在上海闸北，有妻子儿女，与王同是苏北人。他想要王阿二帮他弄套便衣，准备逃跑，并说愿意用两枝冲锋枪交换。

王阿二向我一讲，我心想敌指导员是国民党派在部队里干政治工作的，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就叫王再去试探一下。王去了以后，我和李学源、周云森、陈绍汉等同志聚在工会小楼里商量，决定如果敌指导员真想逃跑，就尽量争取他，并进而通过他争取全连敌军放下武器。

不一会，远远看见王阿二和谈寿延来了，于是我就以自卫团团长的身份告诉谈，既然认清了是非，就应立功赎罪，说服连长副连长，全连放下武器。谈表示愿意帮助做些工作。下午苏州河南解放了，我们的电台正在广播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的“约法八章”，对于放下武器的敌军有三项保证：1.生命安全；2.要回家的给路条；3.私人的东西不没收。我们把收音机开给他们听，他们也觉得只有这条路可走，表示愿意放下武器。差不多同时，王阿二、周炳建等也与驻在锯木间的敌军另一个排谈妥了。这样，到二十五日下午，驻在英联厂的一个连加一个排的敌军都答应投降了。

当天晚上，王阿二求胜心切，带了驻在锯木间的两个伪排长一起去做驻在海军工厂的敌军的工作。但驻在海军工厂的敌连长梁万才是个顽固的家伙，王阿二劝降时，他抽出手枪对着王阿二，声言要枪毙他。同去的两个排长用枪对着梁万才，掩护王阿二退出来。退出海军工厂以后，梁万才还在后面打了一梭子弹。

### (三)

二十五日傍晚，我们突然发现厂里增加了一些陌生的士兵。一

打听，说是从隔壁怡和纱厂又过来了一个机枪连。我们赶紧采取措施，先把他们的正副连长请到外国老板的写字间，派了四名纠察队员去“侍候”他们，准备紧急时就把他们反锁在里面。后来知道邻近怡和等厂的部队都是二〇二师的六〇六团一营三连，营部设在怡和纱厂。为了扩大战果，稳住已经同意放下武器的敌军，我想最好把这些厂里敌军的武器一起缴下，就叫王学素去看看他们营长的动静。王没找到营长，却见到了三营正营长杨一帆。这时六〇六团的正副团长都不知溜到哪儿去了，团里实际上都是杨一帆这个营长在指挥。王试探了一下，杨一帆表示愿意谈判。

第二天(二十六日)早上，王学素、王允一陪同伪营长杨一帆来到工会。我开门见山地对杨一帆说：“据王连长说，你來找我，要求保障生命和开路条是不是？”他开始对我究竟是什么人还吃不准，要我的身份证明。我把“伪工会常务理事”的名片丢给他。他说，这是交朋友用的，不能证明身份，要能证明我们是共产党方面的东西。我就叫王阿二把工人纠察队的袖章拿给他看。想不到他冷笑了一声：“很好！”并指着王学素和王允一说：“他们是你的人证，这些袖章是你的物证，共产党组织纠察队，专门捣乱军心，现在你跟我到营部去。”这家伙真是够狡猾的，如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就会给英勇护厂的同志带来严重威胁，也会使已经答应放下武器的士兵发生动摇，我们的劝降就会前功尽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想反正豁出去了，索性同他来硬的，便把台子一拍说：“杨一帆！这里是我们的团部，不是你的营部，你要来硬的，就别想走出英联厂一步！”杨一帆见吓唬不成，马上软了下来，说：“我是试试你们是否真的共产党，只要你沙先生确能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开给路条，我保证全团放下武器。”并问我什么时候缴枪。我要他先把怡

和纱厂过来的一个机枪连撤回去，同时要他通知恒丰纱厂、中纺公司宿舍、申新七厂、海军工厂的部队等候纠察队的命令，到指定的地点缴枪。杨答应一一照办。这样，除海军工厂梁万才的部队以外，其它厂的部队都表示只要有三项保证，愿意听我指挥。我随即派了刘鸣皋、祝德福等六、七名纠察队员一起到怡和纱厂监视敌军动态。

在人民解放军进展神速，兵临城下的有利形势下，通过我们的政治攻势，劝降了一个团的敌军答应放下武器，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又发生了曲折。半夜十二点钟左右，浦东方面忽然枪声大作，解放军在黄浦江对岸向杨树浦方向射击。这样一来，原来还没有完全稳定的敌军都慌了。我怕敌人乱起来，就马上赶到敌连部，王学素、王允一和谈寿延等都不在，说是给营长叫去了。我一看苗头不对，马上回来与几位党员同志商量以后，分头布置纠察队员准备好棍子，找地方隐蔽起来，以防万一。

刚布置好，王允一来找我，说杨一帆把各连军官都召集起来，要我去。我想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上海，他们已是瓮中之鳖，就壮着胆子带了几位纠察队员一起到了怡和纱厂敌营部。一进门，杨一帆带着威胁的口吻说：“沙先生，请你来没有别的事，要你同浦东联系一下，让他们停火。”还说如果做不到的话，就说明我们过去答应他们的条件是假的。我虽然也想到了敌人这一着，但是怎么同浦东的解放军联系呢？如果火停不下来，自己生命危险倒还其次，弄不好这些敌军真的蛮干起来，把工厂破坏了，完不成护厂的任务，我怎么对得起党对我多年的培养和信任呢？我就对杨一帆及在场的敌军官说：“你们所要求的生命保障，开给路条，我们都答

应了，共产党说话一向是算数的。”同时警告他们不准还击，以免发生误会，解放军已经四面包围了上海，如果硬要抵抗只是死路一条。杨一帆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经我这样声色俱厉地一说，他马上软下来说：“不还击可以，但左右两面驻在自来水厂和黄浦码头以及背后的部队都没联系好，他们见我们不还击，会怀疑我们投降了，或认为解放军登陆了，机枪、大炮一起朝我们这里打，怎么办？”我想这倒也说得对。为了稳住敌人，我就答应与浦东解放军联系，到电话间，胡乱拨了几个号码，假作同浦东的解放军联系。这时已是二十七日凌晨二点多了，我估计再过一个多小时天就亮了，解放军的枪声可能会停下来。于是打完电话就对杨一帆说，已经同浦东解放军的张师长联系过，因为要层层转告前沿部队，还得一个小时才能停火，杨也无可奈何。说也凑巧，隔了半个多小时，枪声陆续都停了。

这时，敌人完全信服了。杨一帆并主动地说他愿意劝说驻在正广和汽水厂附近南木仓库的一个军需营放下武器。经过联系，军需营长江某来见我，但他对我们还有怀疑，坚持一定要找我们的上级才肯谈判。我们同上级已有几天没联系了，立时三刻到哪儿去找呢？后来我想到福禄街老虎灶的李季孚是地下党员，可以找他来临时充当一下上级。于是我就带着敌江营长去找“上级”，走到福禄街，正碰上李季孚他们组织的维持秩序的巡逻队，拿着枪对着我和江某说：不许动！我一见，心想这下好了，又有人又有枪，这个“上级”硬了，江某必信无疑，于是高兴地对巡逻队的同志说：我是英联厂的沙玉琳，快去找你们的老李。我叫江某在门外等着，自己进去找到李季孚同志，同他一讲，李说陈明同志在，可以找陈商量。陈明就是负责地区地下党的丁祖宪同志，我把情况同老丁谈



了之后，老丁就代表上级接见了敌江营长，对他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表示欢迎。江这才同意将部队带到英联厂来集中。

拂晓，杨树浦路上已有人走动了，传说很多，一会儿说解放军已到提篮桥了，一会儿说解放军已到大连路了。我们即命令杨一帆将附近几个厂原先答应缴械的部队，带到英联厂集中。八时左右，缴械的部队全部集中在英联厂，邻近只剩下海军工厂的梁万才一个连了。我带了纠察队去找他，他持着枪不肯放手，说：“要我放下武器可以，你们让我走吗？”我想上海都已解放了，你还能跑到哪里去？就对他说：“一定让你走！”梁随即放下武器逃走了，余下的部队统统被带到英联厂集中缴械。

十点钟光景，解放军来了，我们象见了亲人一样，心里那股高兴劲儿就不用说了。我们坚持了整整四天四夜的斗争，总共缴获了敌二〇二师六〇六团一个团和一个军需营共二、三千人的武器装备。八二炮、六〇炮、重机枪、轻机枪、冲锋枪、弹药等等满满地装了几卡车，还有二十几匹战马和各种军用品，统统交给了我们的亲人——解放军。

#### (四)

二十七日早晨，上级党的周辛吾同志赶到了厂里，通知李学源赶紧去四区机器业工会苏博同志那儿领取“人民保安队”的袖章，并帮助我们按事先准备好的名单很快把人员集中起来，组成了人民保安队，进行收缴敌军枪械的工作，并协助解放军维持治安。

劝降驻厂敌军的任务胜利完成了，但是护厂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就在我们把缴获的武器集中在厂里时，有一批戴着“华东地下军”、“江南中共地下军”等杂七杂八袖章的家伙，神气活现地跑

到我们厂里来要接收。我们早已得到上级指示，只有人民保安队是我们党领导的队伍，其他都是冒牌，就故意先把他们放进厂里来，他们一进厂就被我们布置在汽车间顶上的机枪指住，乖乖地举起了手，我们把这些坏家伙都押进了汽车间。

由于解放军要继续前进搜索残敌，当时只留下一个班看守二、三千俘虏。李坛贵、戴金林、毛志章、刘绍康、魏祖康、李增伍等几位同志带领近百名队员，协助解放军把几千俘虏集中在翻砂间，并照料他们的生活。一直到三十日，才把这些俘虏全部押走。

（张培德 整理）

# 英电修造厂同志徒手解除两营敌军武装

徐巧根 杨崇泰 姜文杰

## 一、我们的厂

英商上海电车公司修造厂，座落在沪东地区惠民路许昌路的东北角，南沿惠民路，西临许昌路。这个厂除了办公室和印票间、轮胎仓库放在二楼外，其他都是底层建筑，水泥钢筋结构，十分坚固，厂内还装有暖气设备。它是电车制造和保养修理的基地，在当时还是一个相当现代化的工厂。

电修厂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期就有了党的种子，不少老工人曾经参加过当时由敬爱的周总理和陈云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领导的著名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自那年以后，革命的火种代代相传，革命火焰从不熄灭。上海解放前，在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地下党总支部的领导下，全厂职工仅二百九十人，但党支部中已有党员三十六人，他们分布在各个车间，还团结了相当数量的积极分子。这个厂，也有国民党各种反动组织和封建行帮势力，但是党的力量占绝对优势，可以左右一切，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群众心向着党，跟党走。

## 二、迎接解放

一九四九年元旦，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发出的号召很快地传到了电修厂，大家都知道解放军不久就要打过长江，彻底推翻蒋政权。

我们地下党支部为了迎接解放，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带领群众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的。

一九四九年初，我们曾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准备参加全市的武装暴动，迎接上海解放。后来，由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上级党组织通知我们把参加武装暴动的任务改为保证在解放上海的战争中保护好工厂，做到不断水、不断电、不断交通。

当时，我们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多次召开支委会，讨论了上级的指示，分析了具体情况，研究了工作方法。我们认为党交给我们的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从光荣来说，是党相信我们能够实现这个任务；从艰巨来说，如何保护好工厂，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难题。特别是要护厂就得住进厂，但工厂里从来不准住工人，如果单是护厂纠察队住在厂里，这不是向敌人作公开的暴露吗？因此，我们认为，为了圆满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必须很好地利用地下工会——工人协会，以它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党员和护厂纠察队才能在群众掩护之下一起住进工厂，达到保卫工厂的目的。我们也分析了，电修厂厂房坚固，足以保护职工及其家属生命财产的安全，又是外商企业，国民党可能不敢任意破坏。所以，我们一方面组织党员学习党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文件，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告、命令等；一方面秘密组织了护厂纠察队（后改编为“人民保安队”），准备在必要时住进工厂，保卫工厂。

五月二十日以后，上海外围战打响了。随着炮声，我们从关心群众出发，迅速在全厂个别串联发动群众，要求群众准备“应变”，买好粮食、腌货、酱菜，必要时搬进工厂，以避免生命和财产损失。广大职工群众感激党的关心，都纷纷作了“应变”的准备。

到了五月二十三日，我们接到地下党总支通知：解放军几天之内就要攻进市区，要作好护厂的一切准备。第二天，我们利用中午短暂的休息时间，分别告诉了全体党员，要求住在厂附近的党员，在动员群众搬进厂的同时，混在群众之中住进工厂；住在市中心区的党员当晚安排好家属，第二天来上班就住在厂里保卫工厂。通知发出以后，下午二时左右，乘外国管理人员回家休息之际，开始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把衣箱等搬进来了，到晚饭前后就陆续搬进了三十多户职工，我们都把他们安置在最坚固的翻砂车间里。我们的部分党员和人民保安队乘机生活在群众之中，担负起保护工厂、保护职工、保护家属安全的任务。

### 三、意外事件

当时的电修厂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情况，有两个番号不同的国民党全副武装的营，在五月二十四日晚先后窜进电修厂。我们原来考虑的两条有利条件，由于他们的窜入转化为不利条件。家属能够安全吗？工厂能够安全保存吗？都存在了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五月二十四日晚上九时左右，厂门外突然响起了汽车的刹车声，接着响起了敲门声，负责看管厂门的同志被迫开门询问，几个反动军官立即走进门来说：“我们弟兄今天要住在这里过夜，你们领我们进去看房子。”说完就逼着看守厂门的同志带领他们进厂去。他们看了厂内场地以后，走出门外，命令二百

多个士兵把装载在四、五辆公共汽车上的粮食和弹药搬进厂里。顿时，靠近厂门内的电车车道上堆满了粮食、弹药，还有迫击炮、平射炮和炮弹。他们用枪打灭了路灯，用粮食包当作沙袋堆成工事，还用手榴弹串起来挂在过道上作为防御措施，总之一切处于临战姿态。在他们安排好一切放出警戒之后，就跑到木工间，把所有的木板拖出来平放在地上躺下来休息。后来知道这营反动军队原来想从海上逃跑，因为吴淞口已处在我军炮火之下，蒋帮的运输舰早就逃到公海上，所以只得折回来躲进我们厂里。

反动军队的到来，使我们在厂的同志紧张起来，因为事先既没有估计到，又没有应付这种情况的经验。正在为难之时，突然又听到操着北方口音的人在叫喊开门。我们一开门就窜进来几个国民党军官模样的人。他们说：“我们奉团部命令驻到厂里。”我们当时很紧张，恐怕两批反动军队为抢驻地而狗咬狗地打起来，使厂里遭殃。于是我们的同志领他们到印票车间去。他们打开了印票车间的门以后，就召集其他士兵全部上楼睡到印票间。这批军队的建制也是营，属新六军忠字青年军。这个营是被我军从浦东地区打败下来的，一营只剩一百多人，长短枪配备齐全，思想很顽固，无投降之意。

两营反动军队进驻厂里，使我们的人民保安队、职工和家属带来严重的不安。

五月二十五日白天，由于厂里情况突然变化，我们护厂同志乘蒋军慌乱不注意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到工会，向地下党党组汇报了反动军队进驻电修厂的情况。党组同志接电后，向我们通报了市内军事情势，要护厂同志千方百计发挥党的政策威力，劝敌投降，保护好工厂。

#### 四、收音机旁

我们的对敌工作是从收音机上着手的。原来，第一批进厂的那营反动军队带着一架收音机，由于电源的关系，把它放到厂的门房间。我们守在门房间的同志和围在收音机旁的反动军队的官兵，大家都收听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尽管收听的人心情和要求不同，但人民电台全部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当时电台不时地播送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的战报，报道我军在全面包围上海以后正在胜利地解放全市，广播我军严格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发的公告和命令，劝告国民党反动军队放下武器，不要再为蒋政权卖命，宣传优待俘虏的政策等等。

电台的广播，在国民党反动军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士兵们越听越爱听，他们对上司已毫无顾忌，大家围着收音机用眼睛示意，表示出要缴枪投降之意。几个反动军官，既怕触怒士兵，不敢关闭收音机，又怕这些士兵传播消息，使所有士兵一心投降而不能向团部交代；他们既想听听共产党对反动军官的政策是怎样的，听了以后又不相信党对他们也是采取宽大政策，所以这几个反动军官和士兵的态度不一样，一边听、一边嘴里还口口声声地骂“他妈的”、“他妈的”，不知道究竟是在骂他们的主子无用呢，还是在装腔作势？

我们的同志听了收音机里的广播，浑身是劲，感到为党为人民立功的机会到来了，感到可以开展对敌工作了。于是在厂里的一些党员同志商量一下，一致认为我们可以利用刚才收音机里广播的内容向反动军队进行宣传，告诉他们党的政策，劝告他们缴械投降。当时我们碰到有些士兵来探听消息，就主动告诉他们：“共产

党、八路军来了，你们只要缴枪，就没有事，……”。我们在开展对敌宣传工作，敌人的士兵也在他们的队伍中偷偷地传播广播的消息，因此党的政策在反动军队中起了强烈的作用。此时，我们感到经过这样的宣传，胜利完成任务的信心代替了原来的忧虑。

## 五、从容应付

经过地下党支部在五月二十五、六日两天的对敌工作，敌人的军心已乱，投降的意向更明。我们决定向党总支或党组再汇报情况。但是，因为在白天电话机旁都有反动军队看守，无法自由通话，决定利用晚上的机会偷打电话。

当天晚上，党支部要三个同志到二楼厂部办公室去打电话，他们刚拿起电话机要拨号码时，突然其中的一个同志脚碰到一个人，原来一个士兵睡在写字台下面。这个士兵被踢醒后连声问：“谁？干什么？”我们三个同志急忙走出，并开会商量怎么对付。我们商量好如果敌军来追问的话，别的不说，就由一个同志对付，三人统一口径说：工会要我们看好厂房，上楼是看看有什么情况的。

果然，敌人没有放过我们。反动军官听了士兵的报告，在晚上九时左右，就派人叫我们上楼去。敌军官见了我们劈头就问：“你们一定有组织的，为什么住到厂里来？为什么晚上不休息，跑到楼上来？你们究竟干什么的？”我们从容不迫，并没有被他们的一系列盘问难住。我们中的一个同志回答说：“我们家都住在草棚棚里，怕打起仗来要吃流弹，所以工会要我们住到厂里，还要我们看好工厂。”其他两同志也随声附和，反动军官见我们面不改色，回答一致，不露破绽，息了一会，便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走开，我们有事还要来找你们。”我们根据发生的情况又作了商量，决定如果再



被喊去盘问，还是这个讲法不变。

深夜十二时左右，敌军官又派人来喊了。我们三个同志跟着上楼。这次，敌军官态度与第一次完全不同。三个反动军官都把手枪放在写字台上，气势汹汹，厉声追问我们究竟是什么人？我们一看便知道敌人色厉内荏，无非是搞搞恐吓而已。所以我们还是不动声色，不慌不忙地按照上次的讲法重讲了一遍，还说如不信可以打电话给工会去查对。敌军官看看我们不慌不张，前后讲话又没有什么漏洞，于是只得又放我们下楼。这时，我们心里都明白虽然敌人盘问两次，但是对我们的怀疑并未消失。果然，二十六日凌晨三时左右，反动军官又派人来找我们。这一次他们干脆把对我们的怀疑开门见山地说出来了。我们一到楼上，一个反动军官立即开腔说：“你们是共产党！”其他两个反动军官则在旁边助势追问。因为这是我们早有预料的，所以我们还是坚持把前两次的话重复一遍，并且还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们的许多职工家眷也搬到厂里来了。反动军官听后就对我们说：“好，领我们去看！”于是我们就把他们带到翻砂间打开了防火铁门，他们一见里面确实有许多家属睡在车间里面，才算解除了疑虑。

## 六、徒手劝降

经过两天的相处，我们在敌人中也渐渐混熟了，我们在厂里也可以自由地跑来跑去。

五月二十七日早上，我解放军胜利地跨过了苏州河上的所有桥梁，收缩了包围圈，进逼到沪东地区。

龟缩在电修厂的反动军队里的官兵更加慌张起来，当官的早已从团部知道我军进逼的形势。

这时我们地下党确定分工开展工作。我们首先瓦解底层的一支军队，因为他们与我们混熟了，而且早已心慌意乱，特别是一些士兵。他们曾偷偷地问过我们的一些同志，如果解放军来了怎么办？我们回答说：“不要紧，只要放下武器，表示投诚就好了”。有的士兵对我们的同志说：“我也是抽壮丁抽来的，不要打仗，要回老家去。”这些士兵听到了人民电台广播的消息，又听了我们的话，都有投降的思想准备。二十七日的早上，一个营级军官苦求我们留厂的一同志，帮助他弄了一套工作服，而后开了后门化装逃跑了。我们借此机会，宣传当官的已溜了，更增强了绝大多数士兵准备缴械投降的决心。但是，因为还有领头的军官，他们还得听从命令。于是我们对那个军官说：“你们的一个军官已经溜走了，你何必替他受罪？一旦打起来有什么好处，大家都是中国人，缴枪算了，等解放军来了，我们帮你们去讲，解放军会保证你们生命安全的。”那个当官的听了我们反复的劝说，大概也感到除了投降已无出路，后来就下命令说：“弟兄们！把枪都统统摔下来吧！”就这样，这营反动军队都放下了武器。这时，我们一面派同志去厂外寻找解放军，一面着手对驻在印票车间的青年军做劝降工作。

我们派五个同志去对他们说：“大家都是中国人，现在你们已没有地方可走了，我们听说只要放下武器，就可保证生命安全，何必还要打下去呢？……”。这个营真反动，我们一次又一次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对他们做了五次劝降工作，都没有成功。我们后来就碰头分析一下，觉得一是这营反动军队受毒深；其次我们讲的都是上海当地话，他们听不清楚，所以还有一部分军官和士兵有顾虑，说：“打也好，不打也好，都是一个样，反正都是死。”我们认为必须针对这种顾虑，继续做细致的解释工作。

正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两个新情况，一个是人民保安队的一个队员，当这营反动军队还未表示缴械投降时，却急着在二楼办公室窗口上扯出一面用面粉袋做成的白旗，当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后大家心里很着急，因为扯了白旗把解放军引来，反动军队一定会开枪，不是要惹出大祸来了吗？另一个情况是一个外厂的英勇的同志，手臂佩着明显的“人民保安队”臂章跑近电修厂门口时，一面开枪，一面呼叫反动军队投降。这时，形势紧张起来，驻在印票车间里的反动军队中有人把机枪架到窗口上准备还击。

当时，我们身感责任之重大，于是当机立断，一方面加强宣传劝说，一方面立即下楼把我厂门房间看门的一个“老山东”请上来协助说通他们缴械投降。当“老山东”转告我们的话以后，原来有顾虑的一些军士便问我们，谁能保证？我们五个同志一起拍胸说：“都可保证。”那个反动军官看到我们那样明朗的态度，就无可奈何地下命令投降。我们见他们都放下武器，就对他们说：“统统排队下去”。至此，他们只得听从我们的命令，走下楼集中排队，等候收容。

当我们全部劝缴了两营反动军队的武装以后，派出联络的同志也把解放军的代表接引到厂里来。解放军代表来了以后，便召集他们讲了话，向他们宣讲了党的政策。接着，就由解放军押送全部俘虏离厂而去。

徒手劝降成功以后，压在我们心底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下来。我们高兴地看到党的政策的无比威力，欢庆我们胜利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当俘虏押送走了以后，我们兴高采烈地清理反动军队遗留下来的枪炮弹药，除留下少数枪枝弹药作为护厂使用外，装了两卡车

送到解放军的接收站。

## 七、胜利会师

五月二十七日的上午，霪雨绵绵，全体同志胜利会师。厂里顿时热闹起来，大家高兴地互相祝贺，欢庆解放，欢庆我们的工厂完整无损地归还人民。

为了向党作出更多的贡献，除了一部分同志留厂保卫外，有一部分同志冒雨到惠民路的通北路口拖回一门平射炮和十多箱炮弹，清扫战场，收缴战利品。

# 解放上海接管前后的斗争

吴 雪 之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下，陈毅、粟裕等同志统率百万雄师过大江，以横扫千军如席卷的神速进军，攻克南京，解放了上海。这座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蹂躏了一百多年的我国第一个大城市获得了新生，全上海六百万市民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水深火热中解脱了出来。回顾三十年前迎接解放和接管前后的斗争，许多动人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略述梗概，藉资纪念。

## 一

整个上海的接管准备工作，早在一九四八年末就由上海地下党根据中央指示开始进行，经过全体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很大成果。

我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旬从香港回上海的。那时上海人民在各条战线上的斗争蓬勃兴起，国民党反动集团手忙脚乱，色厉内荏，妄图作垂死挣扎，疯狂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地下党组织一面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措施，广泛发动群众，展开面对面的公开斗争，一面继续隐蔽骨干，蓄积力量，机智沉着地进行配合人民解放军尽快解放上海和保护城市、准备接管的各项工作。

当时党给我的任务是负责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接管准备工作。上级领导是刘长胜同志，是单线联系的，另外有项克方同志知道与我联系的电话号码。我那时直接联系的地下党同志有二十多人，并通过他们联系着一部分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这些人大多分布在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或有关方面，如海关、铁路、轮船招商局、物资储备总局、资源委员会等等。这些单位也就是我们准备接管的对象。

我们的接管准备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通过党的组织和各种社会关系，调查、收集国民党在沪官僚资本企业的有关情况，如机构设置、历史沿革、内部组织、人员动态、重要设备、物资储存等等，尽可能摸清底细。当时我们把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写成材料，一式二份，一份送上级，一份自存。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调查材料，对领导掌握情况、布置接管和接管后的清理、整顿，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当时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官僚资本企业的工作人员，以及社会上、工商界的中、上层人物，除极少数死硬分子妄图负隅顽抗或准备逃跑外，绝大多数徬徨观望，主意不定，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清形势，决心弃暗投明，苦于缺乏线索与我党联系。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宣传和争取工作。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我们以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为指针，后来又以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为武器，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写信、走访、带口信、打电话和个别交谈、集体漫谈等方式，公开地或者迂回曲折地对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要求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工作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照旧供职，负责保护好资财、机器、图表、账

册、档案等，听候清点接管，并说明有功者奖，破坏者罚，凡愿继续工作者将予以量才录用。当时我们处于地下状态，在白色恐怖下进行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危险，需要胆大心细，既有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勇气，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广大地下党员和非党进步人士，正是这样怀着迎接解放的迫切心情，不分白天黑夜，窥察时机，见缝插针，忘我地进行工作，因而取得较好的效果。记得我也曾通过社会关系，走访过一个纱厂的负责人，约定到他家吃饭，促膝谈心，交代政策，促使他下定决心，支持工人同志的护厂斗争，保证了机器设备和各项资财完整无缺。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英明、正确，“约法八章”的威力无穷，是任何反动势力所不能抗拒的。

（三）与其他战线上的同志协同配合，发动群众，对反动派开展经济斗争。当时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许多官僚资本企业在反动头子威逼下，纷纷制订所谓“应变计划”，企图撤退机构，搬迁物资。为了保护人民财产，我们发动职工，坚决反对搬迁，遇有反动派顽固地下令搬迁，就组织职工消极怠工，大家不动手，也不离开工作岗位，使反动派无可奈何。那时我们不发动罢工，因为发动罢工，一方面会给反动派以借口，实行镇压，另一方面职工离开单位，不利于保护物资，可能造成损失，所以组织怠工是当时条件下比较恰当的斗争方式。还有些反动资本家，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眼看大势已去，搬迁设备物资又不能得逞，于是采取毒辣的破坏手法，借口物价上涨，对职工滥加工资，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使我们在接管后背上包袱。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面说服群众，反对增加工资，一面提出发“安家费”的要求，官僚资产阶级要逃跑，我们就发动职工加以包围，责问他们：“你们到台湾、到美国去了，我们怎么办？”一定要他们发给安家费，而且不要钞票，要银元，要黄金。这些要

求提得通情达理，不但符合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大家齐心协力，坚持斗争，而且得到社会上不少中、上层分子的同情和支持，迫使反动派不得不照办。由于这些斗争的胜利，在解放前夕基本上做到设备完整，物资无损，工厂继续开工，职工照领工资，为迎接解放和顺利接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二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解放军从徐家汇等方向，击溃敌军，进入苏州河南市区。那时我住在逸园跑狗场对面（今复兴中路）的一个公寓里，凌晨三点多钟，听到隆隆炮声中夹杂着朝天鸣放的枪声，知道解放军已到达邻近。天亮后忙去铁门边一看，只见无数解放军安静地坐在人行道上。我赶紧吃了早饭，找到同住一处的一个同志，开了汽车出去（解放前夕为了应付解放时的紧急情况，我们准备了一部小轿车），心想如果解放军拦阻，就请求把我带到司令部去，想不到解放军安坐不动，我们汽车到处开，无人阻挡。进城的解放军都年轻力壮，精神饱满，服装整齐，严守纪律，受到全市人民不管男女老少的热烈欢迎和同声赞颂。此情此景，使我这个长期隐蔽在白区从事秘密活动的地下工作者，顿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心情激动，终身难忘。

那天，我赶到建国西路一处联络地点，把所有由我直接联系的同志召集来，要大家把过去调查了解的材料迅速集中整理。记得当时我还没有摆脱秘密工作的习惯，首先问一位同志“这里安全不安全？”那位同志爽朗地回答：“放心吧，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安全不安全的问题了，弄堂口就有人民解放军！”



后来，刘长胜同志通知我去胶州路开会，那是前线指挥部。在那里，见到了陈毅等领导同志，他们首先关心地问我有没有吃饭。接着大家一齐坐汽车到沪西圣约翰大学开会，开了一个通宵，主要是讨论接管问题，我和另一个同志汇报了准备接管的工作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天清晨，我正准备到建国西路的集中地点，把同志们整理的材料汇集起来送交组织，可是接到通知要我到原国民党励志社去参加华东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到会的有二三百人，除了我和项克方同志是穿了西装，坐着自己的汽车来的以外，其余都是穿军装的高级将领和准备参加接管工作的军代表。快散会时，刘晓同志把我介绍给大家，并要我把集中在建国西路的同志全部接来，逐个地介绍与军代表对口见面，实际上就是地下党与解放军的会师。

后来组织上规定参加接管工作的主要同志集中在金门饭店（现华侨饭店）办公。我去时，第一个见到的是曾山同志，还有许涤新同志是我认识的。那天开了一个会，会后曾山同志交给我一本厚厚的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文件，要我仔细阅读。我请了一天假，认真阅读，深深地感到这个文件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外贸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方针，既反对放弃原则的投降主义，又反对盲目排外的孤立主义。正是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解放后不久，开放海关的布告就张贴在港口和码头上，为后来外贸工作的逐步开展奠定了基础。阅读了这个文件，结合连日来听了领导同志在几次会议上的讲话，也使我深深地感到，真正的接管准备工作在丹阳早就做得相当成熟了，所有接管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有关接管单位的情况、特点和接管中应注意的事项，大体上都已有了明确的规定和具体的规划，使我们更加心明眼亮，胸有成竹，信

心倍增。接着就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接管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始了紧张繁重的接管工作。

在对官僚资本企业准备接管和接管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客观上的复杂性,根据不同单位的不同特点,规定不同的任务和要求,采取不同的步骤和方法,不能千篇一律地“一刀切”。这里举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带普遍性的,一个是具有特殊性的。前者如海关。早在解放以前,我们就在那里建立了党支部,书记是郑铁宝同志。另外还有一个成立较久的公开的海关俱乐部,地下支部建立后就是它的领导核心。解放前夕,我们曾和海关负责人丁贵堂公开谈判,向他讲明政策,要他保证顺利接管。同时,通过俱乐部把广大职工团结起来,形成群众斗争的浩浩荡荡的大军。结果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所有的海关设备,包括办公大楼、档案资料、巡逻船只以及灯塔、航道等等,全部完好地保存下来,解放后没有很久,大小船只迅速通航。这种情况是普遍性的,可以说整个上海城市是完整地接管过来的。当时电话是通的,电车是开的,电灯是亮的,商店一直营业,工厂的烟囱一直冒烟。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证明党的政策的正确、伟大。

另一个例子是铁路。在那里我们也建立了地下支部,书记是沈正光同志。在我回上海前,支部曾遭到破坏,后来重新布置力量,组织起来,特别是在机车修理车间(机务段),我们的力量比较强大。但是由于性质、任务不同,我们在接管前后的做法就不能和海关一样。对待海关,我们的主要要求是保证灯塔等设备不受破坏,以便接管后迅速通航。对待铁路就要有所区别,当解放军包围上海、准备全歼顽敌时,我们要想尽办法不让火车开出去,防止敌人增援或逃跑,而当解放军进入市区后,就要以最快的速度把火车开

出去,以便解放军尽快调动,追歼残敌,扩大战果。这两个不同的事例,说明我们在执行上级既定的方针、政策时,必须具体分析不同情况,机动灵活地从实际出发,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处理。否则就会在实践中碰壁,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由于党中央方针、政策的英明正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和上级党组织的具体指导,在广大共产党员和全市工人阶级、革命群众的积极努力、密切配合下,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接管了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轻重工业工厂七十多个、交通机构十多个、贸易系统十大单位和大小银行四十多个,并迅速恢复生产,顺利完成了任务。

### 三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号召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很大的气力。

事实的确是这样。当我们胜利地完成了接管任务以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对上海进行封锁、轰炸,妄图“困死”我们,并且狂妄地“预言”,说什么“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管理经济,在上海维持不了六个月,六个月后就要退出上海”等等。面对敌人的挑衅,全上海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英勇顽强地进行了反封锁、反轰炸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但是六百万市民和几万大军要有饭吃,全市大大小小一万几千个工厂和各项公用事业,要有燃料、原料,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怎样保证这些必要物资的供应,不是一个简单的问

题。

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上海解放以前，中央就作了部署，在山东、苏北、皖北等处集中了大量的粮食、煤炭和棉花等，准备支援上海。可是当时军务紧急，战区扩大，部分交通线路受到阻滞，这些物资的运输发生困难。经曾山同志和中央派来上海帮助解决交通运输问题的吕正操同志商量，决定一面抢修津浦、陇海、淮南等铁路，一面把烟台到昌潍的铁路拆到蚌埠、裕溪口间，开辟了淮南铁路合裕段，同时打捞公私船只几十艘，增加水运能力，请傅秋涛同志当总指挥，从水陆两路大力抢运粮、煤、棉花等，保证了上海人民的生活供应和工厂继续生产，保持了局势的稳定，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预言”。

除了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和工厂燃料、原料的供应外，当时上海经济战线上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急需解决，一是货币，二是物价。那时国民党伪金圆券已经信用扫地，人民币还未大量发行，市场上银元、美钞、黄金等公开流通，投机分子兴风作浪，造成金融混乱。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解放军进城了，人民币不进城行吗？对于这个问题，起初我们准备用经济措施来解决，试探着抛出了十万银元，但是丝毫不起作用，投机倒把仍然猖獗。事实证明，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如果不狠狠地打击投机分子，金融市场不可能稳定。为此，华东局召开了一次会议，有李士英同志（当时负责公安工作）和我参加，研究结果，总的说来，我们坚决执行政策，维护人民利益，但是为了打击投机倒把，稳定金融物价，也必须采取断然处置。因此，决定“兵分两路”，一面由军管会发布命令，责成人民银行按照合理比价收兑伪金圆券和银元、美钞、黄金；另一方面，对集中在证券交易所大楼进行投机活动的不法分

子给予沉重打击，先用一部分武装包围大楼，不准自由进出，同时供应食品，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将银元、美钞、黄金持往银行兑换人民币。经过耐心的宣传教育，绝大多数群众接受劝导，自动去银行兑换人民币，但有少数投机惯犯不听劝告，继续抗拒，当即拘捕法办，同时在大楼内抄出大批银元、美钞、黄金，依法没收。这就是所谓“证券交易所事件”。经过这场斗争，排除了人民币流通的障碍，从此，人民币占领了上海整个市场。记得当时全市收兑下来的伪金圆券，共达三十多万亿元。这一大堆废纸，留之无用，毁之可惜，结果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弄到待解放的敌占区去使用，让国民党反动派自食其果，回笼消化，变无用为有用。

关于物价问题，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滥发伪金圆券，造成物价直线上升，一天跳几次，早晚市价大不同，严重影响劳动人民生活。解放初期由于生产尚未完全恢复，城乡交流尚未畅通，有些物资供应不够充裕，物价继续上涨，我们采取折实工资的办法，以保证工人和职员的生活。往后，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根据统计资料进行科学分析，弄清情况，摸出规律，随即调集大量物资和货币陆续投入市场，经过反复斗争，终于打击了投机，平定了物价，得到广大人民的赞扬。

综上所述，上海接管前后，客观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斗争是尖锐的，我们的工作繁重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巨大的。今天回顾起来，我们之所以取得这些成绩，首先应该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当年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没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我们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上海的迅速解放，接管工作的顺利完成和解放以后立即克服重重困难，建立起正常秩序，使人民生活安

定,生产蒸蒸日上,都是不可能的。近三十年来,尽管经过多次激烈的路线斗争,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但从全过程看,还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率领我们完成新时期总任务的斗争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这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的,这一条必须肯定。其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我们党进行一切工作最基本的方针。当年接管前后,我们面对国民党崩溃前夕和解放初期的复杂情况,如果不是事先深入群众,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然后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切合实际的步骤和方法着手处理,而是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依样画葫芦,照抄照搬,要顺利地完成任务也是不可能的。再次,经济工作,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必须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那时我们对待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不法分子在物资供应和市场管理上所造成的困难和混乱,如果不是根据各项重要物资的供求情况,做好充分的物质准备,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有计划、有步骤地增加供应,调节供需,要在很短时间内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稳定市场,平抑物价,都是难以办到的。即使是象打击银元投机这样的斗争,如果单靠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不在政治思想上进行宣传教育,在经济措施上制定合理的收兑比价,动员群众积极兑换人民币,也是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

我本来体弱多病,经过林彪、“四人帮”的摧残迫害,更加羸弱,记忆力严重衰退,加以手头原来保存的一些文件资料,散失殆尽,以上所述,只是零星片断,很不全面。希望当时共同战斗的同志,一起回忆,写出详尽的史料,把这段斗争过程和教训记录下来,互相砥砺,传给后人,进一步激发起我们继续革命的热情,在以

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其他已经离开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用当年忘我战斗的革命干劲和拚命精神，积极投入新的长征，为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更大的力量。

# 在伪警察局里的斗争

刘 峰

值此纪念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一些在党的领导下长期隐蔽在反动警察机构中进行秘密工作的同志，回忆过去的战斗历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现将各个时期斗争的情况简述如下。

## 一、建立党的地下组织

早在一九三〇年，我们党就在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内建立了地下组织。当时租界人口增多，帝国主义为了加强统治，招募华人扩充巡捕（华捕）。许多青年生活无出路，即去投考应募，录取后经过三个月至六个月的简单训练，分配到各捕房工作。我们有些党员就在这时乘机打进了巡捕房。

旧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华捕，人数众多，成分复杂。虽然有一部分人立场反动，死心塌地地为帝国主义服务，欺压人民，为广大群众所憎恶。但是绝大多数都有一定的国家民族观念，为生计所迫充当华捕，经常处于思想矛盾之中。

正由于存在这种情况，“五卅”运动期间，经过党的发动，在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店罢市的“三罢”高潮中，出现了华捕罢岗的革命行动（事后不少华捕被开革）。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也有不少华捕同情和支持工人斗争。



党在巡捕房的地下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进一步在华捕中进行了宣传教育和分化瓦解工作，按照不同对象，区别对待，争取和团结了一批倾向进步的华捕，帮助他们改造思想，靠拢人民，相机发展党的组织，不断扩大了革命力量。

一九三三年，在敌人的白色恐怖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捕房党组织遭到破坏，李洛平、王范等同志先后被捕。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广大华捕中留下强烈的印象。接着，“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等一系列事变中，工人、学生和一部分革命军人的抗日救亡行动，也使华捕受到深刻的教育，激发起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为后来积极投入人民革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 二、利用矛盾，和敌伪政权展开斗争

抗战开始，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地下党组织得到了恢复。根据党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关于在敌占区进行隐蔽斗争的指示开展工作，发动华捕参加了各种反帝爱国活动。有的华捕冒着失业危险，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纪念“九·一八”四周年的游行示威（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参加了鲁迅逝世后的送葬行列（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以及旁听国民党审讯七君子（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和西安事变等事件，地下党组织对他们进行了反帝爱国、抗日救亡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教育，并揭露蒋介石集团阴谋卖国投降、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加深了华捕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本质的认识。当时不少华捕激于义愤，抛弃职业，投军参加了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华界沦陷，日军形成对租界的包围，不

断派遣特务进入租界，进行捣乱和暗害活动，企图为接管租界创造条件。这就影响了租界的治安，引起英美帝国主义的不满，给我们在租界内开展抗日活动带来了利用矛盾的机会。上海党组织抓紧时机，出版了《团结报》、《译报》、《永生报》、《新生周刊》、《观察》、《世界知识》等进步刊物，还翻印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反对投降活动》等文章，在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中扩大影响。当时党在华捕中做了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引导他们阅读进步书报和毛主席的文章，使他们了解共产党“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方针，认识帝国主义、汪伪汉奸和蒋介石集团的面目，看清自己的前途，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当时上海人民为支持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募捐活动，尽管华捕们经济不宽裕，仍然坚持每月捐款。我们把这种半合法的抗日救国募捐活动作为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投降和排挤、压迫八路军、新四军等罪行的宣传活动，作为组织和发动华捕投入群众性革命斗争的形式，也是培养和考察他们的一个方面。

一九四〇年，日军一步紧一步地威胁租界，勾结汪伪汉奸，派遣特务绑架华捕，并叫嚷要接管租界。由于日军实行经济封锁，租界内物价飞涨，租界当局不但不增加华捕工资，反而减少米贴，使华捕无法生活。这时我们首先在福州路巡捕房，发动华捕要求增加工资，实行罢岗，其它巡捕房立即响应，形成整个租界的罢岗运动。各捕房推选代表一人（共二十四人）组成罢岗委员会，向租界当局提出要求：提高工资，改善服装，取消罚操，成立华捕互助会。英帝国主义在谈判中对代表进行欺骗、恐吓无效，恐事态闹大，即请租界华董流氓头子虞洽卿出面调停，除不同意成立华捕互助会外，其他均满足要求，使华捕认识到只要团结起来与敌人斗争，就能取得

胜利。

在这段时间里，捕房党组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进一步弄清了捕房内部的情况，利用了当时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方式和半合法方式，对华捕进行教育、培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发动和组织他们开展对敌斗争。经过长期的教育、培养和考验，我们慎重地将具备党员条件的华捕吸收入党。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约有党员四十人，在四个巡捕房建立了地下党支部。

抗战以后，上海租界巡捕房党组织受江苏省委领导，刘长胜、刘宁一同志领导过我们。一九四二年后，归华中局城工部领导，部长是刘长胜同志。巡捕房党的负责人邵健同志，以及苗雁群同志和我，都去过淮南根据地参加整风学习。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后来又扶植汪伪汉奸成立上海伪政府，将租界巡捕房改为警察局，对中国人民实行严格控制，推行奴化教育，颁发“良民证”，建立联保组织，一人犯法，全家遭殃，一户犯法，千户遭殃。一旦发生事故，全区封锁，十天半月不许进出，不少人受饥挨饿，甚至死去。同时，经常“戒严”、“清乡”，实行法西斯黑暗恐怖统治。我们根据隐蔽精干的方针和上级党组织指示，巩固组织，教育党员和群众提高警惕，认识到与日本帝国主义、汪伪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三方面敌人作斗争的复杂性和艰苦性，必须隐蔽自己，采取小型多样、灵活巧妙的方法，与敌人开展斗争，达到长期埋伏的目的。当时提出进行“三勤”教育：勤学、勤业、勤友。

勤学就是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以及整风运动的有关文件，贯彻党的意图，做好党的工作，同时了解敌

人统治人民的策略和搜刮人民的方法，以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勤业就是以自己的职业掩护党的工作，同时不做违背人民利益的事。

勤友就是广泛地交朋友，开展深入细致的交心谈心活动，把自己融化在群众之中，摸清情况，利用和引导回乡探亲或因生活困难送家属回乡的警察，以及来沪探亲的警察家属，宣传介绍解放区与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的不同情况，使警察们通过三种不同地区的对照，认识日伪罪行和国民党反动派政治腐败、卖国投敌的本质，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军队，解放区是民主自由的乐园，促使警察们崇敬共产党，向往解放区的生活。当时有些警察，因为家在解放区，有的被警方淘汰，有的自动离职，都纷纷回乡参加抗日工作。

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上海作为支援太平洋战争的物资供应地，残酷地对我国人民进行经济搜刮，提出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新秩序的上海”、“模范警察区”等，对各种物资严格管制，要有商统局的证明才能通行，这就需把警察训练成为他们忠顺的奴仆。他们先从“整顿警风纪”着手，要警察按章办事，奉公守法。为了对警察进行监督和控制，还在警察局成立了督察处、特高科，建立考勤制度，实行连坐法等，并要警察学习日文，接受奴化教育。我们及时揭露了敌人的诡计，指出如果按照敌人的要求来做，就成了真正的汉奸警察，将被自己的同胞所唾弃，被世人所辱骂。我们提出：“中国人不为难中国人”，“不买钱情买人情”，“眼开眼闭敷衍了事”等，要求警察较普遍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抵制日伪的阴谋。

当时由于物价飞涨，警察生活日益困难，有些人为了生活，下

班后兼做其它买卖，弄得精疲力尽，加上粮食、燃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都是控制极严的配给物资，人们普遍怨恨。我们根据党的指示，发动警察向日伪要求解决生活问题，要米，要面，要煤球。于是，有的分局在提出要求不能解决时就出现怠岗，相互感染，此起彼伏，而又看不出是有组织的行动。这样日伪不得不同意增加薪金和发给实物。

我们虽然采取小型分散、灵活多样、此起彼伏、消极怠岗等方式进行斗争，但是日伪还是觉察到有些警察不可靠，就借口在警察中“肃清英美思想”，把有爱国思想和历次斗争中表现积极的警察大量地进行淘汰。到一九四四年底已被淘汰了两千多名，弄得警察惶惶不安，朝不保夕。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一面和当时坚持在浦东一带打游击的新四军三五支队负责人张锡珍同志取得联系，贴出了“欢迎警察兄弟参加抗日队伍”的标语，一面在警察中散播“此地不通，去找毛泽东”，“此地不能蹲，投奔新四军”，“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等口号，并贴出由“新警同仁会”具名的标语。警察局得知这个情况，感到后果严重，便迅速停止淘汰。

通过历次斗争，警察的斗志增强了，我们把表现比较好的组织到党的外围组织“新警同仁会”中来，给他们布置一些工作进行考察，逐步将具备党员条件的吸收入党。到日军投降时，党员约有百人以上，党的外围组织有二百多人，近十个分局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经过党的整风，教育了党员，提高了觉悟，巩固了组织，改选了总支，建立了警察党委。党委书记是邵健同志，马益三、贾永顺、姜敏同志和我为委员，苗雁群、刘诚同志为干事，以后我担任副书记。警察党委由地下市委直接领导，抗战胜利后一直由张承宗同

志联系我们。

### 三、冲破反动派禁令，迎头痛击敌人

抗战胜利，国民党接管了上海。当时上海人民满以为受苦难、受煎熬的日子过去了，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的日子来到了，有些人对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情况还不够了解，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还认识不清，因而对蒋介石集团抱有一定的幻想。但在美军空运支持下来到上海的“接收大员”，不顾人民死活，劫收工厂后，复工无期，大量工人失业，还颁布法令，不准罢工罢课，不准游行示威。那些劫收大员却到处抢夺敌伪财产，大搞“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车子、房子、女子），有时为了互相争夺，甚至纠集多人，持械斗殴。他们还勾结敌伪，重用汉奸，一些叛国投敌、作恶多端的汉奸摇身一变，成为“忠于党国”的英雄，参与劫收活动，而长期坚持与敌伪进行斗争的工人、职员、学生却被称为“伪工人”、“伪职员”、“伪学生”，要进行“甄别”。此外，蒋介石集团为了积极筹划反共内战，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依靠美帝，引进大量美军驻屯我国。所有这些，都教育了人民，打消了对国民党的幻想。

反动派接管上海警察局后，对警察要进行甄别，要警察交铺保（由两家商店在保证书上盖章）。根据市委指示，要趁敌人刚来，脚跟未稳之时，给他们当头一棒，打破抗日胜利后上海的沉默气氛，冲破国民党不准罢工、罢课，不准游行示威的法令，我们一面在警察中用真人真事揭露反动派的罪恶，发动警察反甄别、反交保，并要求每月给两天休息；一面对两千多名被淘汰的警察进行串连，发

动他们提出复职要求(当时绝大部分未找到职业,生活极其困难)。书面要求无效,即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底,由二千人组成请愿队伍,扛着大旗和横幅,从胶州公园(现在的静安区工人体育场)出发,一路高呼:“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工作!”“我们要求复职!”等口号,经过北京路、南京路到江西路汉口路伪市府门口,要求见市长和警察局长,解决复职问题。国民党反动派没有料到接管上海还不到两个月,竟出现了示威游行队伍,很为惊慌,一面同代表谈判,一面下令警察驱散人群。代表们进入伪市府,和伪官员谈判,阐明了要求复职、解决生活问题的理由,并指出:不见伪市长和警察局长出来答应要求,决不解散队伍。反动派竟将代表扣押起来,外面群众听说代表被扣押,情绪激昂,一面高呼口号,拥到伪市府门口,要求释放代表,一面通知各报馆派记者到现场,并选出代表招待记者,要求舆论支持。附近警局的警察同志还送来面包和茶水,表示同情和支持。反动派考虑到刚来上海,事情闹大不好办,即由伪警察局长宣铁吾亲自当众答复了要求。不几天贴出布告,重新考试录用,结果约有半数被录取,当时的代表却一个也没取。

经过这次斗争,在职警察也达到要求,不再甄别、交保。但尚有数百人未能复职,我们继续发动他们向伪市府要求发养老金和解散费。本来在英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华捕们均参加了储金会,每人每月从工资中取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存入储金会,租界当局再贴一部分钱存储起来,作为年老退职的养老金。日军进入租界后,将储金会取消,原来存的钱也未发给大家。当时党组织决定发动警察,向国民党政府要还这笔钱,伪市府推说是过去租界的事,与他们无关,拖了几个月不予解决。我们请示市委研究决定,

一面在一九四六年春节正月初一，散发《告市民书》（由邵健、刘峰、苗雁群印发），争取社会同情，给反动派施加压力；一面发动有关群众去英国领事馆要英帝国主义解决。英国人见数百人围在门口，答应请示伦敦政府。后来英政府回电要中国政府解决，国民党政府感到再不解决，会影响国际声誉，加之被裁警察经常扶老携幼在伪市府门前哭闹（我们布置的），只好发了那笔养老金。

#### 四、支持摊贩的正义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帝国主义支持，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发动全面内战，与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出卖国家主权的条约，美军在中国横行不法，殴打中国人民，强奸中国妇女，在上海发生美国水兵打死三轮车工人臧大咬子事件，在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事件。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维持其庞大的军事开支，挽救经济危机，除向美国借款外，滥发钞票，造成物价暴涨，以一九三六年物价指数为一百计算，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涨达一万八千多倍。美帝国主义还把大量的剩余物资在我国倾销，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农村破产，工厂倒闭，失业工人增多。一九四六年上半年上海工厂倒闭一千六百多家，失业工人达三十万人。为了生活，成千上万的人只得摆设小摊，贩卖零物，养活一家老小，因此摊贩人数越来越多。一九四六年七月，伪市府借口摊贩“有碍市容”、“妨碍交通”，下令取缔黄浦、老闸两区摊贩，违令者轻则罚款，重则坐牢。摊贩们为了活命，没有理会这种命令。八月，警察局开始逮捕继续营业的摊贩，抢夺摊贩货物。摊贩中有我地下党员王××（被警察局淘汰下来的警察）将摊贩处境向我们反映，我们研究后请示市委，认为要抓住时机，进一



步揭露蒋介石出卖国家主权、发动内战的反动政策，教育和组织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合法斗争。

九月中旬，由十六名代表组成的黄浦区摊贩委员会，开始有组织地向反动派展开了说理斗争，并决定联名写信给反动政府，提出三点要求：(1)收回不许设摊的成命；(2)不得无故逮捕摊贩，并释放在押摊贩；(3)发还被没收的物资。

反动派对摊贩的联名信不予理睬，继续捕人罚款。群众提出向伪市府请愿，我们认为在当时条件下，通过请愿教育群众，不提政治口号，不和敌人硬拚，是比较恰当的。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上午，黄浦区摊贩在摊贩委员会领导下，组织了一支请愿队伍，到伪市府请愿，途中高呼：“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活！”“要求政府安排工作！”等口号。伪政府派一名官员接见，没有取得成果，主要原因是群众发动得不够，缺乏坚持斗争的耐心，未见伪市长就自动散去，给敌人的压力不够大。于是我们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在准备第二次请愿期间，忽然接到伪市府通知，指定刘纯、方三子、余阿土(均化名)三个代表去谈话。我们一面派代表去谈判，一面派人到各区联系，作应变准备。代表们在这次谈判中，驳得伪市长吴国桢无言可答，就下令驱逐代表。此后更疯狂地逮捕继续营业的摊贩，至十一月二十六日被捕摊贩达一千人左右。

十一月三十日，一支由三千名摊贩组成的游行队伍，包围了黄浦区警察局，高呼“释放被捕摊贩！”“归还没收物资！”等口号。黄浦区警察局的地下党员将外面声援的信息告诉了在押摊贩，顿时口号声内外相应。我们也布置警察局地下党员在警察中开展同情摊贩的宣传教育，并利用各种机会支持摊贩斗争。

摊贩游行队伍经过之处均有各行各业人员自动加入游行队伍，人越聚越多。反动派调来大批保警和宪兵，企图驱散群众。摊贩和军警搏斗起来，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七人，伤者更多。群众高呼：“我们要活命！”“打倒刽子手！”“为死难者报仇！”等口号，用石块、木棍，坚持与敌人斗争，掀翻了敌人的消防车。当时在金陵东路福建南路有一家高陞大纸店，反动资本家在楼上倒开水下来，烫伤游行群众，群众当即将该店纸张和机器设备全部搬出来烧掉。当天坚持到深夜，第二天十二月一日清晨二时，示威群众又聚集到黄浦区警察局门口，游行队伍迅速增加到五千多人，高呼口号，并向商店、行人散发传单，向反动政府提出四点要求：(1)即日起准许摊贩在马路上设摊营业；(2)立即释放被捕摊贩；(3)严惩屠杀摊贩的凶手；(4)抚恤被残杀的摊贩及其家属。

同时，老闸区警察局也被群众包围，社会团体纷纷向反动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敌人企图采用欺骗软化手段来涣散人们的斗志，要示威群众派代表出来谈判，说保证给予满意答复。群众识破敌人的阴谋，不听他们那一套，要立即答复。反动派见诡计不成，又来硬的，调动了几乎全市军警来镇压示威群众，群众以石块、竹杠、木棒对抗全副武装的军警，反动政府竟用水龙、催泪瓦斯和机枪来对付反抗的群众，结果群众被杀害十人，伤百余人，还被逮捕了一批人，有的新闻记者也被打伤或逮捕。示威群众一面继续斗争，一面将反动派罪行向全市人民公布。这天，公共汽车和电车被迫停驶，全市商店除极少数外均自行停业，支援摊贩斗争，形成全市性的反蒋运动，迫使国民党政府宣告结束取缔摊贩的反动措施，不得不允许黄浦、老闸两区的摊贩继续营业，还假意撤换了黄浦警察局长杜淳。

## 五、警察大罢岗，震撼蒋帮统治

反动政府为了镇压此起彼伏的人民革命运动，到处设立特务机构，发展国民党、三青团组织，并在警察局内加强了中统、军统的特务统治，建立督察员和政治警察制度，公开对内部人员实行控制。同时以重庆和杭州警校正科学员为骨干，招募新警，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和党化教育，他们把新警称为“警员”，来代替老警，逐步实行其反动的警管区政策，把老警逐步集中在老闸、黄浦两个分局，准备陆续淘汰。

在各界反对警管区制度和老警遭到失业威胁时，我们迅速发动和组织他们与反动当局开展斗争，提出“实行警管，敲碎饭碗”，“不受当局骗，就地改警员”，“要改大家改”，“团结力量强”，“坚持不改行，当局没法想”等口号，并做新警工作，分化瓦解他们；同时印发了《告市民书》的传单（当时均由邵健、刘峰、姜敏等同志印发），扬言要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在外滩集合请愿，反对当局集中和裁减老警察。

当时正是北平学联发出号召，要求全国学生在六月二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总罢课的日子。反动当局看到传单，知道警察也要在那天集合请愿，极为惊恐，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付办法。后来蒋介石本人也知道此事，在对伪市府的训示中说，可能警察受了中共分子的影响，看来上海、无锡等城市警察都不大可靠，必须设法查处，平息此事。六月二日那天，各分局局长把警察集中在警局讲话，要求大家不要闹事，同意全部改为警员。这次斗争使反动当局被迫接受要求，也使广大警察认识到反动当局欺软怕硬，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是出路。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逐渐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政府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八日颁布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人民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过了蒋介石的《国家总动员提案》，随即下了所谓《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条文公布的当天，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还声称：“如有罢工、怠工、结队游行、藐视法令之行动，治安机关决予取缔。”可是没有几天，就发生了轰动整个上海的由于国民党宪兵与警察冲突而引起的警察罢岗游行事件。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晚，新成警察分局第七期学警詹运衡在值岗时发现金都戏院（现瑞金剧场）内有市民二人与查票员发生口角，即上前劝解，却遭到在场的国民党宪兵排长李预泰无理干涉，詹与李发生争执，李仗人多，将詹痛打成伤。消息传到新成分局，詹的同学（学警）二十余人即赶至金都与宪兵评理，老闸等分局警察闻讯后，也赶来声援，宪兵即电康定路宪兵队告急，百余名荷枪实弹的宪兵乘车赶来，开枪射击，顿时秩序大乱。警察当时被打死七人，伤七人，有的市民也被流弹打伤，戏院和附近商店亦被砸坏。

惨案发生后，警察群情激愤，表示要为死难者报仇，我们及时请示上级党委，经研究，决定利用敌人内部冲突，扩大矛盾，发动全市警察罢岗。第二天早晨，各警局纷纷谈论惨案的经过，点燃了大家的怒火，即由五十名交通警察组成一支宣传游行队伍，经过宣传发动，到下午全市警察大罢岗的局面已经形成。当时警察训练班的学员在党的号召下，开出十多辆大卡车，从榆林路警官学校出

发,经过虹口区三角地附近,到塘沽路宪兵二十三团团部,围着房子转了三圈,高喊“杀人偿命!”“保障警察的人身安全!”等口号。宪兵们把门紧关,响也不敢响。然后卡车从外滩向一向禁止卡车通过的南京路开去。由于警察罢岗,无人指挥交通,使全市交通秩序大乱,据黄浦、老闸、新成等三个分局不完全统计,在半小时内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有十三起,美军的吉普卡竟开到商店里去。

敌人没有料到总动员令颁布后没有几天,乱子竟出在维护治安的警察身上,他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面下令警备部稽查大队和保警大队出动,代替岗警维持秩序,一面派警察教育所的教育长杜淳(前黄浦区警察局长)出面组织进行软化欺骗的“后援会”,和各分局警察代表进行谈判,并暗中派特务头子警察局刑二科(调查科)科长张承祖调查策动罢岗的对象,以便逮捕处理。老奸巨猾的杜淳使用了伪善和利诱的手段,要代表们动员警察复岗,遭到代表们的拒绝。代表提出四个条件要当局答复:(1)开追悼会,立纪念碑,吊唁死亡警察;(2)优抚伤亡人员及其家属;(3)赔偿附近商店及死亡居民的损失;(4)惩办凶手,治安工作不要宪兵插手。谈判未取得结果。

上海警察罢岗,惊动了伪中央,蒋介石准备派国防部次长秦德纯来彻查此事。我们即发动警察向伪市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答复复岗条件。市长吴国桢已受到蒋介石训斥,为了在秦德纯到来之前使事情有个收场,除第四点要按法律程序解决外,其他三条均满足要求。举行追悼会时,我们又发动警察去吊唁送葬,等于又进行一次游行示威。

敌特张承祖企图利用这个时机,寻觅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由于我们隐蔽在群众之中,利用矛盾,干得巧妙,同时,打入敌人心脏工

作的党员迅速取得情报,使我们能及时了解敌人的意图,采取相应的对策,因而在斗争达到目的后,立即收场,继续隐蔽自己,积蓄力量,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通过那次斗争,广大警察对国民党反动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加强了新老警察之间的团结,进一步播下了反蒋火种。在事发一周以后,还有部分警察心犹未尽,自发地在街上张贴标语,发动请愿。蒋介石在八月六日电令中说:“在此积极侦察审判期间,无论任何方面,应该依法解决,乃据报尚有少数警察,意欲扩大事态,仍有张贴标语简报及发动请愿事,殊属影响治安,淆乱听闻,特电希即妥为制止为要。”这也反映了敌人在那次事件中,受了沉重的打击,惶惶不安。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申新纺织九厂工人为了生活而进行反蒋罢工斗争,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并出动装甲车对申九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工人被杀害三人,伤十余人,被捕四百余人。为配合这次斗争,在敌人内部制造矛盾,我们一面以“保警同仁会”名义,散发了《告市民书》和《告警察书》,张贴了标语,主要内容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支援工人罢工!”“不要为当局卖命!”等等;一面发动警察募捐,慰问死难家属及受伤工人,还有许多警察和工人一起,臂缠黑纱,追悼死难工人。敌人追查标语、传单来源是用“保警同仁会”名义印发的,便把怀疑点集中在保警身上,对保警进行审查,核对笔迹,引起保警普遍不满。后来因笔迹和传单有相似之处,逮捕了三个保警,认为是他们干的,关了半年,又出现同样笔迹的传单,经鉴定不是他们所为,才被释放。这样,更加深了敌人内部矛盾。

## 六、互保立功，迎接解放

一九四七年十月，党中央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前方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后方人民反蒋运动蓬勃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疯狂进行白色恐怖，逮捕、屠杀、暗害爱国人民。伪警察局长毛森曾说：“上海有一千条马路，我有一千个特务。”他派了许多职业特务，打入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等，严密监视和逮捕进步对象。他们对内部也不放心，建立了许多特务组织，如保密组、防谍组、生活指导组等，由军统特务直接领导，对警察进行层层控制，严格监督。

上级党组织及时指出，我们要坚决贯彻隐蔽斗争的方针，紧紧依靠群众，揭露敌人阴谋，利用有利时机和敌人进行斗争，准备迎接上海解放。

根据党组织指示，我们在警察中进行形势教育，提出“互保立功”的口号，开展立功运动，要大家不做危害人民利益的事，保护好物资档案，并协助各界人民保护好国家财产不遭受破坏。为此，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互保立功委员会”，经过考察教育，把其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上海解放时，我们在伪警察系统有二十个党支部，党员约五百名，党的外围约两千名。

与此同时，我们在党员中进行气节教育，要求大家进一步认识敌人被消灭前的疯狂性，他们会到处寻觅党的地下组织，企图破坏，我们要百倍警惕，更加严密组织，在思想作风上不犯自由主义，时刻作好战斗准备，在任何情况下，不损害组织，不出卖同志，使敌人无机可乘。

那时敌人一步紧一步地加强内部控制，各区建立的督察处严

密监视警察，对被怀疑有进步倾向的人即逮捕审查。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前被捕的警察有五十余人，其中有普陀区警察局地下党支部书记钱凤岐同志和党员刘子良同志、杨浦区警察局的地下党员钱文湘等同志。这些同志被捕后，受到敌人严刑拷打，但他们没有暴露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他们在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解放后我们去收尸时，发现他们遍体伤痕，连指甲也被敌人拔掉了。

我们还布置党员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是调查敌人驻军、特务机关、武器、物资仓库的情况，二是调查警察局警官和特务分子的经历、住址以及罪恶事实，登记注册（解放时，各分局均将保存的这些材料交军代表）。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我们根据当时反动派恐慌不安的情况，按照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同志的指示，五月上旬在乌鲁木齐路邵健同志家中，由邵健、刘峰、姜敏连续三昼夜油印了大量的“约法八章”，根据已掌握的材料，给警察局反动警官和特务分子寄去，并警告他们停止作恶，共发出两千多封，均寄到他们家中（有的刚搬家，到新地址没几天，就被我们知道了）。在三天之内，反动派收到两千多封警告信，震动很大，毛森连续下了三个训令要迅速破案。由于我们早已巩固和严密了组织，及时了解和掌握了敌人的动态，隐蔽在群众中，所以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始终未能得逞。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敌人更加恐慌，积极作逃跑、破坏和屠杀的准备，胁迫工厂、机关的职工随着他们迁移。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特点，党组织决定开展反对迁移、反对破坏、反对屠杀和保护工厂、学校、机关，配合解放



军解放上海的斗争，建立了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宣传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作好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

我们按照上级党组织指示，将手执武器的警察进一步组织起来，成为监视敌人行动的力量，并在警察中开展反逃跑、反撤退、反破坏的宣传教育，成立群众性的保管委员会，五人一组，十人一队，在保管委员会领导下，保护国家财产和各种档案资料，保护枪枝弹药，协助和配合各界护厂护校。到五月二十四日晚上，黄浦、新成等警察局长逃跑，反动警官被我们监视。二十五日凌晨，保管委员会在群众中公开出面，把已准备好的欢迎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的红布横幅挂出去。各警局地下党支部书记都是保管委员会的主任，在敌军溃退后迅速恢复秩序，维持交通，到二十七日协助军管会顺利接管了伪警察局。

在解放前夕，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在逃跑前进行集体屠杀，营救狱中的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经党组织反复研究，由监狱党支部（有三十多名党员，二十多名外围积极分子）向看守警进行形势和前途教育，组织看守警保卫在押革命战士的生命安全，保护监狱里所有财产、档案不遭破坏。经过周密的布置，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由党支部书记赵英盛同志指挥，征得监狱长的同意，将监狱大门关闭，内外不准进出，并以党员和外围积极分子作骨干，组织了三个小队，一队把守大门不准任何人进出，一队将监狱内所有电话和与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的通讯设备全部控制起来，当敌人来电询问监狱情况或要转移政治犯，我们就利用警察局和警备司令部间的矛盾，警察局来电话要转移政治犯，我们说警备司令部说任何人不准动，巧妙地加以拒绝。另一队以监狱八号大楼为指挥部，居高临下，准备万一敌人抵抗，就和他们进行搏斗。五月二十四日

晚上,由支部书记率领一队到掌管武器仓库的警官宿舍,要他交出钥匙,取到钥匙后,开了仓库,按拟好的名单发枪,把武器弹药全部掌握在我们手里。二十五日苏州河南解放,即把监狱长、科长、警卫队长等三十六人的枪枝缴下来,监狱完全控制在我们手里,坚持到二十七日上午迎来人民解放军。监狱斗争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人民解放军迅速而强大的攻势下,敌人忙于自己逃命,来不及实现他们屠杀革命战士的原定计划。同时,因沪南地区已经解放,沪东、沪北虽有激烈战斗,我们又在沪东做了一些策反工作。原来察警局地下党员许孔珊同志住在长阳路大连路左近,与敌人某师师长方懋楷是同学,他就说服敌军师长方懋楷起义,并促使青年军某团缴械投降,这在客观上配合了监狱内斗争的顺利进行。

## 七、对敌斗争的几点体会

回顾在伪警察系统进行地下斗争的经验,我们有下列几点体会:

(1)在敌人内部发展党的组织和对敌人进行斗争,必须做好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弄清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工作。对反动当局开展斗争时,既要看全国形势,又要了解当时反动派的内部情况,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形势,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同时,弄清敌人内部情况,设法打进敌人更机密的部门,及时取得情报,了解到敌人的动向和采取的反动措施,可以使我们能巧妙地对付敌人,取得斗争的胜利。

(2)发展组织,壮大革命力量,要依靠群众,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逐渐引导他们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经过较长时间从各方面考察,再确定发展对象。在一段时间内,发展一些新党员,要立即巩

固组织,培养教育党员,严守纪律,加强保密观念,提高革命警惕,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善于隐蔽自己。

(3)发动斗争要从实际出发,不失时机,抓住与警察有切身利益的问题,发动群众,采取猛烈、迅速的行动,向敌人进攻,使敌人措手不及,摸不着头脑。而在取得胜利以后,又要及时停止斗争,贯彻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使敌人无隙可乘。

## 忆张困斋同志在监狱中

韩 慧 如

上海解放前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我和我爱人秦鸿钧同志（负责党的一个地下电台工作），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更不幸的是，前来我家和鸿钧联系工作的党的领导人张困斋同志，也同时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在敌人的牢狱中，他俩受到严峻的考验。敌人对他俩严刑拷打，用尽一切法西斯手段，但他俩坚贞不屈，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高贵气节，直至付出最宝贵的生命。当时，我关在伪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的一个小房间里。他俩关在哪里呢？我多么渴望知道他俩的情况。他们身上的伤情怎样了呢？是不是已经牺牲了呢？这些问题，真使我心绪缭乱，坐立不安。我不时从牢房里的小窗口向外面大院子里盯着，牢牢地盯着，心里抱着一个希望，即使能看到他们一点影子，听到他们一点声音，也是我最大的快慰。就这样，我一时一刻地盼望着他俩。

一天下午，我忽然看到，他们两人，在离开我窗口约有两丈多远的地方走过去了。秦鸿钧同志被人背着在前面走，张困斋同志一只手撑着一根木棒，拖着一条被打断的腿，艰难地一拐一拐地向前移动着。目睹这种情况，我的心急剧地跳动，眼泪夺眶而出。我想，他们是不会知道我被关在这里的，我真想直接跟他们碰碰面，即使

能相互看上一眼也就满足了。我知道他们是上厕所去的。为了达到跟他们见一面的愿望，我抓紧机会向看牢门的特务要求去上厕所，敌人打开了铁门，让我出去了。在去厕所的路上，正碰上他俩从厕所往回走，我看到张困斋同志移动得更加缓慢了，这时我意识到他们已发现了我。困斋同志有意识地稍稍绕开监视的敌人。当我和困斋同志擦身而过的一刹那，他轻轻地对我说：“你千万不要讲出什么呵！”“你放心”，我立刻这样回答他。他这一句话，对我是多么宝贵的指示和鞭策呵，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鼓舞。

过了几天，敌人把我移到秦、张两同志被关的同一牢房，同时更加严格地监视着我们。不管敌人看管得多么严紧，我们却会利用一切机会，用手势、表情彼此示意，或悄悄地对答几句话。张困斋同志看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我：“你受过刑吗？”我点点头。他又问：“身上伤得怎样？”我回答说不要紧。我看到他俩身上受伤那么严重，每一个动作，都要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才能表达出来。秦鸿钧同志不断地吐出带血的痰，张困斋同志不停地咳嗽，我知道他们的肺部已被辣椒水灌伤了。这时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分担或减轻他们一点肉体上的痛苦。我想自己省下一点开水，给他们多喝点，润一下喉咙，可能会好点。他们说不能多喝水，免得多上厕所，增加肉体上的痛苦。有一次，我抓紧机会，向敌人多讨了一点开水，想用热毛巾给他们捂一下被打伤的腿，稍微活活血。当我端着热水放到张困斋同志身边的时候，他小声地对我说：“你给老秦弄吧，不要照顾我了。在敌人面前，你要表现出极端恨我的样子才行”（意思是要我装着恨他，表示是他牵累了我们）。我和秦鸿钧同志会意地相互看了一眼，表示出不以为然的神色，同时我的热泪止不住簌簌地流了下来。张困斋同志呀，你在这样情况下，还是一心想着他人，还

是想尽方法要掩护同志，把责任全部担在自己身上。你崇高的忘我精神，使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困斋同志呀，你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的表现，你对同志的百般爱护，显示着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品质，是多么伟大啊！我和鸿钧决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那是损害共产党员的品德的。大家默默无言，牢房里显得死一样的静寂，我好象听到我们三个人的心在共同地跳动着。

那是一个阴沉的天气，牢房里格外灰暗、阴郁。一个戴着黑眼镜的特务走了进来。他装模作样地摇摇窗上的铁栏杆，又拉拉门上的铁插销，最后用那恶毒的眼光盯着困斋和鸿钧，大声地叫骂着：“你们两个只知道吃，也不为自己的前途动动脑筋。”我看到他俩同时以愤怒和蔑视的目光射向敌人而不出声。敌人滚出去了，张困斋同志狠狠地吐了一口痰，大声地自言自语地说：“要我自首投降，简直是白日作梦！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决不会成为可耻的叛徒。见他的鬼去吧，他们采用的卑鄙手段，永远不会达到目的的。”秦鸿钧同志接着说：“随他们怎么着吧，人总是要死的，我们共产党人，要死得光明正大！”他们愤怒的声音，灼灼如火似的眼光，代表了他们的大无畏精神，敌人在他们的目光下，显得多么渺小和可鄙啊！

一天下午，几个敌人拿着手铐进来了，我们知道要被带到另外地方去了，跟着进来的是困斋同志的弟弟张邦本同志。困斋看到自己的弟弟，第一句话就问：“母亲好吗？”（我懂得这是问组织安全吗？）邦本同志回答说：“母亲很好，你放心好了。”他又微笑地对弟弟说：“要母亲好好地代为照顾他们的两个孩子。”同时用手指一指我和鸿钧。我听了这些感人肺腑的对话，激动得哭了。接着我们被带到另一个监牢去了，男女被分开关在两处。此后，我和他俩被两道铁门隔绝，不通音讯了。有一次，我们三个人被提去审问。审

问前把我们关在一个小屋子里，而后一个个地被提去审问。鸿钧首先被叫进去，我和困斋默默地坐在灰暗的小房间里等着。我仔细地看看困斋同志，看到他苍白消瘦的脸上，布满了红点。我问他“这是怎么弄的？”他说：“这是臭虫、虱子、蚊子咬的，没什么了不起，拷打都不怕，还怕这些小虫子吗？”他接着说，“思想上要有准备，这次审问可能还要受刑。”我听了，心里一下子揪紧了，天啦，可别再折磨他们了，他们经不起再次受折磨了。最后，困斋同志劝告我不要惦记两个孩子，会有人照顾他们的。这几句话，给了我莫大的安慰。这时，我真有千言万语要跟他说，我的心脏跳动得更剧烈了，但当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五月的天气，牢房里是那么闷热。我从牢房里的小窗口一直看着外面广场上敌人的动静，看到敌人忙忙碌碌，乱七八糟，不停地跑来跑去。看样子，是准备夹着尾巴逃狗命了，解放大军快要逼近上海了。不管敌人把男女牢隔绝得多么严密，我们还是想尽办法用小纸条把这目击的情况传递到男牢的难友那里，与他们共享革命胜利的喜悦。回音来了，纸条上写着：“我们要团结起来，争取活着，迎接胜利！”

五月七日下午，这是一个悲痛的日子！永难忘怀的日子！广场上突然连个敌人的影子都没有了，跟平时那种嘈杂的情况对比起来，显得格外的静寂——死样的静寂。我心里想，敌人不知道要耍什么鬼花样了。看着，看着，发现从对面大门口走进来一排伪军，带着黄袖章，掂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下子分成两行，从大门口一直排到男女牢共同进出的铁门口。接着，牢门打开了，困斋和鸿钧两同志和另外一个难友被敌人押着从两排刺刀中间，拖着受伤的腿蹒跚地走出来了。尽管他们举步艰难，可是都昂着头，挺着胸，从

容不迫地向前走，显示出高大的英雄形象。汽车押着英雄们离开我们了，永远不再回来了，可是困斋同志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神态，和蔼可亲的笑容，在我的脑海里、心田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一直到今天，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也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

他俩牺牲到今天已三十个年头了，往事历历如在目前。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在他们的鲜血哺育下，千千万万革命者前赴后继，踏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迈进，终于迎来全中国的解放。

(附录)

### 张困斋烈士小传

张困斋烈士(1913—1949)，又名张昆者，浙江镇海人，中共党员。在求学时即接触革命思想，经常阅读革命理论书籍。一九二七年蒋帮进行反革命叛变，大批杀戮革命青年，激起他对蒋帮的仇恨，决心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一九三四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社联，一九三五年参加抗日武装自卫会，并积极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活动，特别在银钱业爱国青年中，起着核心作用。一九三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更紧张地进行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他在江南敌后根据地工作，在青浦农村，负责编印江南抗日根据地的唯一刊物——《江南》，宣传抗日。后在上海市搞地下工作，通过银钱业联谊会等组织，密切联系群众，以各种方式与敌人进行斗争，以致遭到钱庄当局开除。

一九四九年初，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上海人民为迎接解放，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作



垂死挣扎，对上海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就在三月十九日晚上，张困斋同志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几经严刑拷打，但他始终不屈不挠，使其他同志均得保持安全。五月七日，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眼看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入上海，疯狂地下了毒手，将张困斋、秦鸿钧等十二位同志，秘密地杀害于浦东戚家庙。就义时，烈士们高唱着革命歌曲，悲壮的歌声竟致执刑士兵为之颤抖，拒绝罪恶的命令，迫使匪特撤掉士兵，而自己动手屠杀。

张困斋烈士在入党时宣誓：“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我愿牺牲我的一切——连我的生命。”烈士的光辉一生，实践了自己庄严的钢铁誓言。

# 上海地下党与人民解放军会师小记

艾 中 全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晨，我到住所附近岳阳路、西爱威斯路走了一转，看到在微明的晨光中，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在路侧席地休息着。期待着解放到来啦！

我随即回家。家里那只七四八一三号的电话铃响了，党的领导人唐守愚同志说：“急切需要汽车，把人民保安队在江西路、北京路的领导人接出来，各关系方面的汽车一时找不到司机。你自己开车，需要立即行动。”

唐守愚同志随即到来，同我一起出发。我的那辆奥斯汀小汽车在空旷的马路上疾驰，只见路旁有坐着休息的人民解放军，没有别的任何车辆和行人。我们准备解放军同志查问，但亲人们并未过问。汽车行进在爱多亚路上向东将近浦东同乡会时，迎面来了枪声，于是绕道巨籁达路，直驶到江西路、四川路。在苏州河北岸仍然是蒋帮的军队，我把车停在江西路鸿丰银行附近，没有遭到北岸的枪击。

因为车小，分两次把在江西路、北京路的同志接送到大世界对面的红棉酒家。在接出来的同志中，有张承宗等同志。他们在红棉酒家楼下的店堂里商议。这些同志，有的过去曾经接触过，但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在第二车把这些同志接送到红棉酒家后，他们要我准备把张承宗同志送到在虹桥路上的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去联系。后来又说，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已经进驻到南市和旧法租界交界处靠近黄浦江的新开河，离红棉酒家很近。

我看到张承宗同志在电话中同刘长胜同志讲话后，写了一封委派张承宗同志同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联系的信，由刘长胜署名，是刘长胜授权给他写的。我把张承宗等同志送到新开河，这时马路上的人已经很多，汽车在距离前线指挥部一小段路的地方就停下。大约半个小时，张承宗同志完成任务回来了。同张承宗同志去的其他同志是谁，现在没有印象了。

在大世界对面爱多亚路（西藏路西侧）上的红棉酒家，据说是盛丕华、盛康年父子开设的。如果今后在那里仍然开设一家那样的菜馆，将成为革命史料上一个小小的饶有诗意的插曲。

# 回忆上海解放前后我的亲身经历

赵 祖 康

上海解放已三十周年了。它的解放，不仅是上海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全国人民的胜利。随着全市六百万市民的重见光明，我也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

从抗战胜利到上海解放，我一直任国民党的上海市工务局长。当上海解放的前夕，我还兼任了几天代理市长。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曾得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我的召唤和指引，使我能弃暗投明，得到了新生。

上海解放后，陈毅同志对我诸多教诲。他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言一行，使我获得很大启迪。至今回忆起来，时常感到心潮澎湃，无限激动，深深感戴党的大恩大德。现就所忆，记述如下。

## 一

我是学土木工程的。长期来，抱着“交通救国”、“工程建国”的幻想，在国民党政府机关里从事道路和市政工作。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任工务局局长，仍以“致力工程，为民服务”这八个字向当时的新闻工作者宣称为自己的志愿。但在蒋政权反动统治下，这种愿望只能是缘木求鱼。解放前三、四年的上海“宦途”生涯，逐

渐使我擦亮了眼睛，深感国民党的命运已如日薄西山，危在旦夕了。在此情况下，我的出处又何在呢？是跟着蒋帮去台湾么？这是死路，当然不愿再跟了。去香港或南洋么？没有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怎样工作与生活？留下吧，去教书还是搞工程呢？总之，是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但是，由于多年来的阅历，认识到蒋政权的腐朽没落，所以，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无论如何不再做蒋王朝的官。由此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无论去留何若，我今后还应以搞我的本行为“事业”。至于到哪里去搞，主要是想在上海，但也没有把握。

这时，上海人心浮动。有些人怕共产党来了于己不利，有些人中了反动宣传的毒，纷纷南逃。也有些人怕蒋军溃散时胡作非为，荼毒市民，因而易地暂避。我的亲友恐我母亲年老体弱，受不起打仗惊吓，劝她离开上海。不得已，我于一九四八年冬，托我爱人带了三个孩子，侍奉老人去福州友人处暂住。我的另二个较大的女儿不肯离开上海，正合我当时的想法，便一同留在上海。就这样，终于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我有个亲戚钱挹珊，是我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友人、松江同乡钱江春的女儿；她的爱人曹石俊，我在抗战胜利到上海时认识了他，知道他在做外贸工作。我在和他们平常的接触中，觉得他们是比较进步的。因而到一九四八年冬，彼此来往的较多。当我爱人侍奉老母去闽前，他们几度向我们宣传讲解了解放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使我们解除了很多顾虑。但终于考虑到老母受不了打仗的风波，我还是决定由我爱人陪同她去福州暂住。对于曹、钱夫妇的关心和劝告，我是很感激的，彼此接触也更增加了。后来，他们说要介绍进步的人士同我见面交朋友，我欣然

同意了。

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晚，他们邀我到复兴中路绿村(里弄名)他们的家里吃饭，我应邀而去。见到了一男一女两位素昧平生的人。经介绍，男的说是姓朴(名字已忘)，女的叫李敏。曹、钱夫妇让我叫他们为“朴先生”和“李小姐”，并悄悄地告诉我说：“他们是地下党员。”

当时，“李小姐”看来还只三十多岁，身材不高，十分和气，很有些文化水平。由于初会，彼此只寒暄了一阵，还对时局作了一般的漫谈。对于他们的籍贯、住址等等，我都不便问。闲谈之下，他们表示愿意今后多碰碰头，我谦逊了一下，表示乐意，请多多指教。

这就是党同我第一次的直接接触。党伸出了温暖的手在拉我了，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次会见——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在我生命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

自此以后，李敏同志就经常同我联系。解放后，才把她的真姓名说给我听，并互致敬意。至于“朴先生”，只是这次见到了一面。

就在此事之前，有一天，我的同事、国民党工务局副局长王某背地里告诉我，他收听到解放区的电台广播，指名叫我和另外两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我听了很兴奋。回到寓所收听，虽没有收到，仍抑不住高兴，感到有了可靠的光明前景。加以和李敏同志初次见面订交，久所萦系的出处问题迎刃而解了。

经过同李敏同志取得联系，在她的推动和曹、钱夫妇从旁帮助下，我曾为党主要做了以下四件事：

(一) 二月间，李敏同志叫我设法取得汤恩伯军队在郊区所筑碉堡的位置地图。我在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里没有知己朋友，所以，没法弄到这种地图。于是我想到工务局里有一张《市郊

大桥地址图》，或许对解放军的进军有些用处。就以了解、研究建桥情况为借口，向主管处要来了这张地图，还要了一张市区地图，一齐带到绿村曹寓。当天夜晚由李敏、钱挹珊两人赶忙在市区地图上复绘了大桥地位，让李于第二天带走。这一天我到工务局上班，就将大桥地址原图交还了主管处。

（二）约在五月初，李敏同志和我商谈要我提供浙赣铁路方面的资料。那时，浙赣铁路的工程局副局长是我交通大学同学王元康。在征得李敏同意后，我偕她到宛平路、今衡山饭店附近王寓，与王见面。以后，王设法把铁路资料弄到手，交给了李。因此解“放初，王就被派为铁道部一个局的副局长。

（三）汤恩伯在环市四郊构筑碉堡，要求市政府转向工务局征借”石子。我向李敏同志商量，她指示我用“拖”的办法，尽量推迟工程进度。我便同汤扯皮，用各种办法，强调种种困难：先是推说这是市政工程的备料，拒绝移用；以后又让步说，只能暂借，要汤的机关自己标购材料，限期归还工务局等等，一直拖了好久。

（四）我还多次向李敏同志反映国民党市政府的动态。在她和曹、钱夫妇的启发和推动下，我曾多次在市府会议上，或在会议外，提出：为市府所属员工提高福利待遇和生活补助的议案，为保障群众运动或学生运动人身安全的建议等等，曾收到一定的效果。例如：有一次我曾提请对全市教职员工提前发放几个月工薪，“以济穷困”，获得通过；有一次向毛森提出，要警察局释放一个无辜被捕的葛姓工程师，终于获得释放；另有一次，有一个姓钟的交大学生，在公交公司的工人运动中被反动派杀害，我借校友关系向陈保泰面质，表示不满，要他作善后处置，使得他无辞以对，只好唯唯诺诺而去。

除此而外，李还经常对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最重要的是，她曾给我读两本书：一本收录了毛主席的两篇光辉著作《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另一本是散文集，叫《方生未死之间》，记得其中收有茅盾的一篇文章。为了掩人耳目，那本毛主席的著作的封面，伪装为《论美军登陆》。

我对毛主席的著作，读得津津有味。那时，我的寓所已从惇信路（现武夷路）迁到市中心区长乐路一个朋友、交大同学姓梁的家里。到晚上，便秘密地仔细读上几页，从而使我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身上，开始认识到只有向共产党和人民靠拢，才有自己光明的前途。这样，我留在上海的决心更大了。

在二月到五月初之间，我和李敏同志接触较多。四月二十四日，那是南京解放的下一天，我到曹石俊夫妇家去，党的地下组织通过曹还给我介绍了一位张明先生。他指示我：多同上海工程技术界方面联系，做些工作。从此，我同科技界朋友的来往接触更多了，特别是老一辈的茅以昇，和较年轻的中国技术协会负责人宋名适、闵淑芬等。

五月十六日以后，曹石俊夫妇又介绍一位叫“钱先生”的同志同我联系，见过几次面。在他的指示下，我草拟了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业计划大要》，于五月二十三日交给了他。当天下午，中国技术协会负责人宋名适来，提供了一份上海市电力公司重要技术人员名单给我，我也转交给了“钱先生”。另外，我还口头提供了若干关于上海科技界情况的资料给他。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的工程界派出代表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我也参加了这件事。



事先，中国工程师学会总会在上海的董事会执行部召开了会议，公推侯德榜、茅以昇、恽震、赵祖康和顾毓琮等五人为请愿代表。会后，由我们五人草拟了一个《请愿书》。《请愿书》代表工业界和工程人士要求当时国共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迅速达成全面和平；并要求在和平未实现以前，不以工矿地区为作战据点；不破坏工矿、交通、公用事业；不准士兵侵入工厂、矿场，损坏或迁走工厂设备；维持工厂的交通运输，并允许食粮和原、燃料等运入工厂，以便维持生产、安定社会。定稿后，我们就于三月二十五日去南京。

二十七日，到国民党总统府去见代总统李宗仁。李接受了《请愿书》，表示对我们的要求，可以考虑；并请我们吃了饭，照了相。接着，我们去找国民党行政院长何应钦。何的态度顽固。他的答复大致是胡吹说在战争方面是有准备的，准备划江而守；如有可能，也准备进行和谈，对于保护工矿一节，他只表示可以研究。

在南京见过李宗仁、何应钦后，侯德榜又邀我们把给毛主席的《请求书》修改了一番，措辞比较尊重和婉转。当时，国民党和平代表团即将赴北平，便由侯德榜带了《请求书》去看和谈代表邵力子，请他转呈给毛主席。以后，我又和茅以昇两人一起去看邵，想再当面恳托他一下，因为他不在家，没会到。

我回上海后，把经过情况向李敏同志作了汇报。她听了，也很高兴。

## 二

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消息传来，上海反动统治集团一片混乱，惶惶不可终日。那天，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特别召集上海各方面头面人物举行所谓茶话会于市府大厦小礼堂，声嘶力

竭地狂叫：要守卫大上海。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谷正纲在旁帮腔，说的更凶狠。也胡吹什么要与共军作战到底。但轮到各界人士讲话时，颜惠庆却说：“我希望一个月以后，局面有所改变，能够恢复和平。”我在会上没有发言，但颜的话激动了我的心弦，令人钦敬。以后，我就常去看他，向他请教。

五月十二日，解放军开始向上海外围进攻。国民党市政府内，先是市长吴国桢辞职逃跑了。五月初，原市府秘书长陈良改任市长，所遗秘书长职发表以茅以昇继任，但茅一再推病拒就，始终未到职。继之，市府所属各局局长也多辞离，陈良不得不另委继任人选，发表以汪维恒任财政局长、赵祥麟为教育局长、陶一珊为民政局长、陈保泰为社会局长；至于警察局长，则早已由俞叔平改为毛森了。

这时，上海物价腾涨，市民生活更陷于水深火热。在垂死挣扎中，汤恩伯、毛森等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们，更加疯狂地迫害和镇压革命群众和青年学生，白色恐怖笼罩全市。但随着解放大军的节节进展，隆隆炮声也日益迫近。炮声振奋着市民的心，也震破了反动派的胆。陈良他们也就不得不演出了下述的一幕。

五月二十三日深夜，我在寓所，接到陈保泰的电话，说陈良要我立刻去市府见他。我回说没有车子，陈保泰说他可以就派辆车子来接我。上了车，我想先摸个底——会不会是我同地下党的关系被他们发觉了？便先驱车去看陈保泰。陈正在收拾东西，家里乱糟糟，神色很不安，对我只说：“外面风声很不好”，道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只好硬着头皮到市府大厦找陈良，这时已是二十四日凌晨一点多钟了。

陈良一见我，就装着苦笑，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要走了。上海

市长职务想请你代理。”我一听，心里定了下来，就说：“时势那么紧张，我是胜任不了的。”他说：“你代理市长最适当。因为：第一，你在市府现任各局长中，工作年代最长，而且在同人中也没有什么恩怨；第二，你办事认真，操守也好，是个‘标准官员’，能够得到市民的信任；第三，你是个技术人员，没有政治派系，对方（按指解放军）来了，也不致同你为难。”我还是表示辞谢，并且提出颜惠庆、张元济和徐寄廌三人来，请他择一选任。他说：“我已全联系过了，都不肯干，现在只好请你勉为其难了。”

我和陈良谈话时，就想起了李敏同志过去曾对我讲，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应该把上海的政权接过来，因而最后就表示同意。在谈话中，我问陈：“代理市长该代理些什么？”他说：“只要做两件事：一是维持秩序，二是办理移交。”当我表示维持秩序有困难时，陈良拿出何应钦在四月二十九日左右给他的一封信给我看，大意是：南京撤退时秩序很乱，治安破坏，致影响国际视听；故万一上海紧急时，望极力维持治安，所有警察、保安队和义务警察等均不必撤走，等等。随后，他就当面写了个委我代理市长的“手令”，交我收存，又叫秘书郑瑜把用红布包好了的市府大印递给我。我无处安放，只好带了它回寓所，于天明后再带到市府大厦，放进了保险柜。从此，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就陷于白天乱哄哄，夜里阴森森的境地。

二十四日晨，陈良又匆匆召集各局局长开会，宣布了这事。会后，我向陈说：“你要我办理移交，我还勉强可以办，但要我维持秩序，我实在无力胜任。今天，毛森没参加会议，这事我更不好办。”为此，陈良又把毛森找了来。我故意开玩笑似地对毛说：“我是技术人员，文人维持不来秩序，这个代理市长就请你当了吧。”他连忙说：“我不行，我不行。”随后就告诉我说：“现在各警察分局已都另派了副

局长。‘对方’来时，他们大概不致会发生什么问题。至于总局副局长，我可推荐陆大公来担任，此人同‘对方’大概有些关系，我本来要办他，一直忍着装不知道。今后要维持秩序，你就找他好了。”我听了，心中一怔，是不是他可能已知道我的情况，在指桑骂槐。

下午三时，陆大公拿了一张毛森的名片到工务局来看我。名片背面写着：“请派陆大公为警察局副局长”。我即批了“照办”两个字，并以严肃的口吻关照他：要切实负责维持好地方，并随时与我保持联系。他唯唯允承而去。

下午六时，我还放不下心来，便再要陈良陪我过苏州河，到虹口区淞沪警备司令部去看汤恩伯和陈大庆。汤没看到，只看到了陈。陈良便就溜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同陈大庆对话。我十分婉转地对他说：“为了维护市民的生命财产，特地来看你，希望你撤退队伍时，不要与共军太接近，以免发生大的冲突。”并且希望他把这层意思转达给汤恩伯。他冷冷地表示接受，就送我走了。

我回到苏州河南后，立即就分访颜惠庆和张元济。他们都表示支持我为代理市长，并答允给我以帮助。在访颜谈话时，我还先表示可否请他担任代理市长。颜说：“不妥。孩子是要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你是陈良下令派的，由你来代理市长，一切好办。我当然尽力支持你。”

当晚九时，解放军向市区发动总攻，首先从徐家汇进入市中心区。到了深夜，即二十五日的凌晨半点钟左右，我在寓所接到陆大公的电话，汇报说：解放军已占领了常熟路和长宁路两个区的警察分局。我当即指示：“务必维持好秩序和治安，避免同解放军冲突。”实际就是暗示他们要缴械；又叫他放部车子来，接我去市府大厦与他会商，他都答允了。

那一晚，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情绪，通宵达旦地不断接到各方，特别是苏州河北一些机关、部门如屠宰场等地的来电，我都告以要劝说国民党军队或其他反动武装力量从速撤走或投降。同时，又想到自己身肩维持治安的责任，关系重大，而手无寸铁，只依仗着素无渊源的陆大公，总觉得定不下心来。因又分别打电话到警备司令部找陈良和陈大庆，要他们下令迅速撤退部队，免得危害人民生命财产。陈良答复我：关于维持治安方面，我可先到汉口路警察分局同陆大公商量；关于撤退部队，可到虹口区去找他碰面再说。但到二时左右，陆大公来电说：解放军已迅速进抵八仙桥等地，交通阻塞，途中怕有危险，故不派车来接我了。我就只好守在电话机前，随时与他电话联系。我一再嘱咐他务必保护好市府大厦，并叫他立即在市府大厦竖起白旗，表示投诚。他答允我照办。

三时许，我再与陈良通话，告诉他我已无法去苏州河北。到四时左右，第三次通话，则已杳无回音。从此，我与陈良和陈大庆完全断绝了联系。

上海苏州河南地区，就这样获得了解放。虽然局部地区有些骚扰和毁损，个别居民被流弹打死打伤，甚至市府大厦也曾中了若干流弹，但总的说来，社会秩序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电力、自来水、煤气等供应如常；电车和公共汽车到二十六日清晨六点半，就大部出厂行驶；黄浦江上的交通，也很快恢复起来。市廛不惊，人心安定，都比我原来料想的要好。今天回忆起来，这应该首先归功于毛主席对上海战役的英明战略部署和三野陈毅司令员等领导人的正确指挥；应该归功于解放军作战部队全体指战员勇猛神速的进军，使国民党军无从顽抗，被迫溃退，从而减少了兵燹损失和溃卒为非作歹的机会；应该归功于地下党领导广大工人、学生、职员和各界爱

国人士所开展的护厂、护校和保护国家资财的斗争，以及全市人民在精神上、物质上的大力支持。没有这些，上海的秩序和治安就完全是不能想象的。

### 三

五月二十五日清晨，苏州河南已告底定。我到市府大厦，看到已竖起白旗，大门口架放着原警卫市府大厦的枪支，内心很平静高兴。我进入原秘书长办公室，作为我的临时办公室，看到有些局、处的高级人员在那里等我，便先嘱咐他们各回原岗位照料工作。从工务局叫来两位秘书，为我办理秘书和对外联系工作。先叫他们用电话通知各局、处，说我已在同各有关方面进行联系，要他们安定人心，静候处置。

部署完毕后，我就于上午八点半左右去看颜惠庆，请教他该怎样办理移交的问题。

在这里，得插叙一件事。在我代理市长前，国民党市政府曾对所属发过一个所谓“应变”文件，是要破坏、毁灭各种档卷和财产之类的措施，并规定要成立执行这项工作的机构。当时，我已与地下党取得联系。所以，我只在工务局局务会议上把这个文件草草提了下，敷衍过去。以后，在一次市府行政会议上，毛森力主要市府所属“自行销毁”各种档卷，但因我和有些人表示不同意而未达成协议，市府就未把此事行文下达。为了保存工务局的档卷，我嘱咐一位机要秘书通知有关部门把过去借调出去的档卷，一律收回，并规定不准再借调出去。对于“自行销毁”档卷的压力，我通知有关秘书，以无行文下达为词，尽量拖下去，不予执行。这位秘书还坚决地说：“拖一天是一天，要拖到手枪对着我，逼得我走投无路时再说。”

所以，工务局的档案，在移交时是比较完整的。

话说回来，我去看颜惠庆时，他因年逾七十，正卧床养息。我道明来意，才谈了约一个小时左右，北洋政府时代的财政总长、时任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委员的李思浩，陪了一个中年客人来看颜。李是我初次认识。那位中年来客，叫刘白（字君亮）。这天，李、刘两人告诉颜惠庆：中共方面有两位代表就要来看他。颜、李两人就叫我坐候，以便会商一是。但等到十一点半，中共代表仍未到。于是我再回市府，同财政局和上海市银行联系，要他们务必保管好一切档卷和财产。然后，又叫我的秘书用电话分别指示各局处：一、要大家固守工作岗位；二、要确保档案和财产的完整和安全；三、要保证完整而系统的移交，非经我联系妥善，不得擅自移交。这是早先李敏同志和“钱先生”向我指点过的。另外，我们还通知各局处：自二十六日起，各派高级人员数人到市府集中办公，以资联系。

当天下午二点半左右，我再去李思浩家。经他介绍，看到了中共代表李公然同志。据告，还有一位吴咏梅同志因事已先走，我此后也未再晤及。在李思浩和刘白两人的从旁参加下，我同李公然同志商妥了下列八个问题：（一）接收机关以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派人员，并备有证明文件者为限，其余一律拒绝移交；（二）维持治安；（三）水电公用事业必须继续维持，防止破坏；（四）各局、处人员应各守岗位，保管档卷财物，并照常工作；（五）户口册和地籍图册也很重要，务须妥为保存；（六）从速恢复公共交通，以安人心；（七）动员商店、工厂复业，公私银行也必须暂先复业；（八）补发市府员工、警察五月份未发的工薪，但此点必须先向解放军负责人征求意见。

以上八项，大部分是由我提出，经李公然同志指示而商定的。

其中第一点最关重要。因为，在此后几天里，确有几起未备规定证明而到各部门要求接收的，我都通知各部门由我直接交涉，予以拒绝了。其第六点，关于恢复市内交通的事，我是于即晚找公用局局长刘锡祺获得解决的，因而二十六日晨，各交通车辆就基本上恢复了运行。当然，主要还是靠有关公司与车场的地下党组织和广大职工同志的努力。

商妥了以上八项后，我又提出了释放“政治犯”和被捕学生的事，李公然同志同意我的建议，但说必须先与军事当局商洽后再办。记得茅以昇在这天晚上，也为这事来看我，提出释放所谓“政治犯”四百多人的要求，其中大部分是学生。我就根据李的指示，于翌日，即五月二十六日，同解放军联系，获得了批准，就交陆大公照办，把他们释放了。

最后，李公然同志建议我发表一个《告市民书》。我回到市府后，与我的秘书商量。由于当时外面用各种机关、团体名义发表公告的很多，市民对此，真伪莫辨，而且我也不大愿意用“代理市长”的名义发表公告，所以决定不发公告；有需要下达的，仍用开会或电话通知的方式下达，或发布命令。当时就决定：把八项原则中若干有关要点，先分别通知市府直属各处按照执行；另外通知各局负责人于翌日举行会议，传达这八项决定，并具体讨论移交准备事宜。当晚，曹石俊和“钱先生”先后来看过，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五月二十六日上午，在淮海中路社会局会议室开会时出席的人，就所忆，有公用局局长刘锡祺、财政局局长汪维恒、社会局代理局长张振远、地政局代理局长沈振家、教育局代理局长郑瑜以及民政局、警察局、卫生局的代表等。会议根据八项原则作出了五点决议。其中关于移交问题的决议是：在军管会接收人员来接洽时，应



对他们说明关于旧市府和所属各自局的情况；办理移交时，必须由各局、处从上而下，整个移交。

二十六日下午一时许，为了想同党和解放军取得进一步的直接联系，我又去看李思浩。在李处，认识了军管会军事联络员刘光辉同志。当天下午三时，军管会派晨钟同志到市府大厦，负责市府警卫工作。我陪他巡视了档卷室。从这天起，他就驻在市府大厦办公。

这时，苏州河以南的地区已经全部解放；但苏州河北岸部分地区还盘踞着国民党残余部队。早在汤恩伯逃跑以前，即五月二十三日，他就派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负责指挥留在上海的国民党部队。刘昌义见到苏州河南岸已完全解放，就在党的教育下，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刘是在上海解放后，我才认识的。但当时苏州河北沿岸的邮政大楼、河滨大厦、百老汇大厦（现上海大厦）中，仍分别驻有青年军204师残部，在负隅顽抗。二十五日深夜，颜惠庆叫人从河滨大厦打电话给我，要我从速设法与解放军联系，及早解决河北战事。我便设法同解放军师部一位姓何的负责同志通电话，他复告：“明晨九时起，苏州河畔可以没有战事。”我听了，非常兴奋，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解放军从该时开始，将暂停用武力进攻，可以用人民的力量，以和平方式，来解决苏州河北岸的解放问题。解放军顾念人民生命财产的这种用心和决定，我是十分感动的。

五月二十六日，刘光辉同志到市府大厦我的办公室，指点并协助我打电话给留守在邮政大楼里的原邮政总局上海分局局长王裕光，叫他就近对驻在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做工作，劝他们停战缴械。其时，邮政大楼约有驻军二百人。他们通过王，在电话中要我转向解放军提出：要求尊重他们的所谓“军人人格”——不要把这次缴械

称为投降。电话从下午二时起，一直打到四点半，反复商谈了两个多小时，双方最后决定了五点：（一）停战；（二）国民党驻军立即缴械；（三）凡国民党官兵愿意留下的，应进行整编；（四）不愿留下的，予以资遣；（五）尊重他们的“军人人格”。于是邮政大楼上竖起了白旗。接着，对河滨大厦和百老汇大厦的驻军，我们也从旁协助，用同样方式，先后和平地解决了他们的停战缴械问题。就这样，五月二十七日早晨，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苏州河北岸。上海市全部解放了。全市人民一片欢腾，整个上海成为兴奋欢乐的海洋。

五月二十七日，陈毅司令员派熊中节同志到市府大厦，带来了军管会陈司令员的条谕，说是准备明天来接管，要我作好准备。这时，《解放日报》开始发刊。发刊辞《庆祝大上海的解放》提出了当前的三大任务。其第三个任务是：“顺利完成接管，迅速恢复生产”。文章说：“对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的党、政、军、机关，必须立即接管。我们号召各机关的旧员工们不要惊扰，各在原职位上服从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其派出的军事代表，迅速完成清点移交等工作。一切听命处理，不准许有任何破坏。”我反复阅读了这一节，随即通知各局，准备移交，并必须严格遵守执行这个任务，不得违抗。

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司令员兼市长陈毅同志偕同副市长曾山、韦悫两同志以及潘汉年，来到了市府大厦。另外，刘晓、周林等同志也同来。我怀着喜悦而又紧张的心情欢迎他们。陈毅同志微笑地同我握手。接着，大家在市长办公室里坐了下来。陈毅同志招呼我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副市长曾、韦两位，刘晓、周林同志等以及潘汉年，另外就座。陈毅同志问我关于二十四日晚间，陈大庆、陈良是怎样逃跑的情况，我如实作了汇报。

同时，周林同志叫我的秘书通知市府旧职工，齐集二楼小礼

堂,参加我们准备的欢迎会。陈毅同志一反国民党的官僚作风,特别关照让所有勤、杂、工、警人员全部参加。到会的共约二、三百人,把小礼堂挤满了。大会由人民政府秘书长周林同志主持,介绍陈毅司令员兼市长给大家讲话。陈毅同志的讲话,一开始就说:“你们没有去台湾,很好。我们表示欢迎。”他说:“蒋介石背叛革命,统治了二十三年,搞得民不聊生。”讲到这里,他指着墙上挂的孙中山先生像,说:“怎么对得起他!”接着说:“历史是无情的。蒋介石现在逃跑了,他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我看还是甘心的好,不甘心最后是要完蛋的!”末了,他说:“上海解放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几十年来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上海,现在已成为人民的城市。请大家各安职守,努力学习,改造世界观,为革命、为人民,多做些贡献。我们的党是不会埋没人才的。”他勉励大家服从命令,办好移交,协助接管,听候人民政府量材录用。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与会者,激起了热烈的掌声。

会后,副市长曾山、韦悫以及潘汉年,分别接见旧市府各局、处长,征询意见。同时,陈毅同志又找我谈话。我们面对面坐着。我表示今后想去教书。他微笑地摇摇头。那时,我虽然站到了人民一边,但对在人民政府内工作,能不能同共产党相处共事,把工作做好,有所疑虑。陈毅同志看出我踌躇不决的态度,掏诚相见地对我说:“赵先生,我们是一定能很好合作的。”这句话,出乎至诚,感人肺腑,至今回忆,犹在我的耳际回响,真使我永生不忘,激动难已!

到了五月三十日,我把旧市府大印交给了周林同志。于是再向陈毅同志谈心,提出自己思想认识差,怕担任工务局长做不好工作,愿意先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两个月后再看能不能就职。我还提出了对上海城市规划的设想。谈了有二十多分

钟。他还是劝导我就任工务局长的工作，勉励我边工作，边学习。我深深感激陈毅同志的盛德厚意，才最终接受了。当时，我的家属还在福州，而福州尚未解放；所以，我又要求先让我把工作做起来，但正式命令则请俟福州解放，再予发表。陈毅同志考虑了一下，同意了。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福州解放，关于我的任命，就于八月十九日正式公开发表。从此，我在共产党各级党委领导下，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

从见到陈毅同志的第一天起，我就深深地为他的广阔的胸襟、鲜明的爱憎、敏锐的思想、爽朗的性格和坚定的原则性同机智的灵活性相结合，以及平等待人、实事求是的作风等特点所吸引。他根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统一战线政策，以身教和言教，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和留用人员，使我和所有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们沐浴着春风，不断获得启迪，不断有所前进。今天回忆起来，仍抑制不住我内心的激动和对他的深挚的怀念。

## 冲破黑暗,放声歌唱

徐 炜 钱乃立

一九四八年夏秋之际,上海地下党给我们一项任务:组织进步的音乐团体,以广播为武器迎接上海解放。那时,正好有几位音乐界的朋友,介绍我们到电台去演唱。就这样,我们成立了由八个人组成的“上海广播乐团”。

我们以做商业广告为名,在国民党官办的“上海电台”开始展开和敌人的斗争。当时上海共有八十余家以商业广告牟利的私营电台,在这些电台里泛滥着黄色音乐和反动歌曲。我们到电台后,开始时只能演唱一些民歌和中外名曲,以后逐渐加进一些进步歌曲。上海广播在一片愁云浊雾中忽然响起了一阵阵新鲜、健康的音乐,使人精神一振,立刻受到市民的赞赏。广告商看到我们有不少听众,认为有利可图,要我们“做广告”的越来越多,我们乘机壮大自己的队伍,扩大自己的阵地。当时,有一些苏联进步影片在上海放映,我们就演唱电影插曲和十月革命歌曲,为电影做宣传。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小小的音乐团体,影响一天天扩大起来,以致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许我们在官办的上海电台广播。我们不得不转移到私营“自由中华”电台,继续坚持演唱。

以后,“昆仑”影业公司摄制了一批进步影片,在观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我们一面评介电影,一面演唱聂耳、冼星海、张曙等音乐

家的作品。我们又从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学会了教歌这样一种宣传方式，在“自由中华”电台开始教唱《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山那边好地方》和《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在学生中的影响尤深。我们每天要收到近百封听众来信，还有许多人打电话来鼓励我们或向我们索取歌词歌谱，我们就编印了一种“广播歌选”广为发行。在水深火热的黑暗统治下，我们用歌声表达着人民的希望和心声。

有个黄色影片的制片老板也来要我们做广告，我们商量之后，同意在广播时间里附带介绍几家电影院放映的影片片名和场次，那个老板听了很生气，要我们第二天在广播中演唱黄色影片中淫荡的插曲，我们毫不考虑地拒绝了。这个老板怀恨在心，暗中威胁广告商不给我们广告做，想用经济手段迫使我们屈服。

在私营电台广播，每月要交付一两黄金的电费。以前，我们的广告收入刚刚够付电费，广告没有了，电费交付不出，阵地就要失掉。就在这困难关头，我们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成绩很大，上海即将解放，一定要坚守电台阵地。这封信对于日夜盼望着解放大军来临的年青音乐工作者是多么大的鼓舞啊！这是党写给我们的信。党把这样重大的责任交托给我们，说明党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有了力量，办法就多了。我们商量着如何设法筹钱交付电费。当时，我们这些人除在电台广播外，虽有职业，但收入菲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即使大家把全部收入统统捐出来，也还凑不足这一两黄金。在党的鼓励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我们终于想出了两个办法：一是把我们教唱的歌曲灌成唱片向听众义卖，二是想办法为进

步的影片配音,以这些收入加上大家凑的钱来交电费。难关终于度过了,我们不仅保住了阵地,而且更加巩固了。胜利鼓舞着我们,虽然大家有时一天只能吃几个烧饼,但心情愉快,斗志昂扬。每天,我们阅读和回复听众来信、练歌,晚上,一起到电台广播。

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大军横渡长江直取上海。晚上我们工余结束回到家里,便把门窗关好,静静地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第二天我们聚在一起,大家轻轻地谈论着令人振奋的消息,并且商量如何迎接解放大军。大家深深体会到,无论在战火纷飞的战场,还是在敌人残暴统治下的上海,人民都在赢得节节胜利,而这两个斗争、两个胜利又是相互配合、相互呼应,配合得何等好啊!这时我们又收到地下党寄来的歌曲《东方红》,我们一面看着歌谱,一面流着激动的眼泪,一位同志把我们当时的心情即兴谱曲,写出一支歌——《解放大上海》。顿时,小小的门窗紧闭的工作室内,荡漾着低沉而有力的歌声。

一九四九年初,上海地下党妇委曹舜琴同志,把我们编成一个党小组,布置了迎接解放、准备接管等工作,并联系我们的同志。当时还分析了解放战争形势,解放军渡江后的进军路线,估计到敌方可能采取的破坏活动。要求我们发动伪上海电台及私营电台的职工保存物资、档案、器材、设备,迎接解放,要坚决保住广播台中已经占有的阵地,发挥现代化宣传工具的作用。

上海解放前两天,党组织交给我们两份铅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毛主席亲自起草的有名的“约法八章”,并嘱咐说,解放上海的枪声一响,你们就要千方百计占领伪上海电台,利用其他私营电台,打开机器,向全上海人民宣告上海解放的胜利消息,让全市人民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同时也让残敌了解党的政策。

当时我们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只感到手里的《布告》沉甸甸，心里热呼呼。

我们接受了这个任务后，在房间内拉上厚厚的窗帘，围着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彻夜难眠，等待天明。那时上海不知有多少家庭，怀着一颗颗激动的心在等待着“天亮”。五月廿五日，我们看到南京路上又增加了沙袋。我们住处的对门就是伪警察局。我们看到警察局宿舍有人用大卡车搬家，出出进进，手忙脚乱。当夜我们一直没离开窗口，观察着警察局的动静。后半夜听到了机枪声，突然看见有人拿着一面白旗，插到警察局门口的沙袋上。我们看到这个情景，心都要从胸口跳出来了。啊！敌人投降了，投降了！接着我们看到有几个人影象箭一样穿过马路，进入警察局大门。没多久，就是这几个战士押着几十个伪警察出来了。这一切进行得那样顺利，又是那样安静，似乎没有惊动任何一个沉睡着的人，虽然那天夜里大家都没有睡觉。

天蒙蒙亮，我们赶忙取出解放军的《入城布告》，放在工装裤胸前的小口袋里，用别针别好。大家迅速向西跑，走到延安路时，我们看到解放军整齐地排坐在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战斗已经结束了。看到这支人民的军队，我们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心里有多少话要跟他们说啊！但是，没有时间，我们要赶去完成任任务。电台在大西路（即现在的延安西路）乌鲁木齐路口，马路上行人很少，成都路口躺着一辆被击毁的坦克，有的马路上还有一滩滩血迹。

我们奔到伪上海电台，在门口见到两个很高大的带着人民保安队袖章的人。他们是地下党文委派来的邹凡扬和王世楨同志，伪电台台长已逃跑，电台的副总工程师和有的职工同我地下党有联系，已作好播音准备。上海交大和同济大学的人民保安队也陆



续开到，他们是奉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命令调来保卫电台的。我们走进熟悉的播音间，从胸前取出《布告》，对着话筒用激动、兴奋、高昂的语调报告：听众们，市民们，同志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天凌晨胜利进入上海市区，上海解放了……。现在，广播《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啊！解放了，我们日夜盼望、舍生忘死为之奋斗的一天真的来到了！当我们读到《布告》最后毛泽东、朱德的名字时，我们周身热血沸腾。啊！毛主席、朱总司令，我们日夜想念的领袖啊，我们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我们一面播送《入城布告》，一面唱起了《东方红》和《解放大上海》等歌曲，雄壮有力的歌声在上海的天空震荡。我们又赶到“中华自由电台”，那里，广播乐团的同志们早已在等待着了。接着地下党派人来电台慰问我们，表扬我们按时完成了任务。当时苏州河以北仍在敌人盘踞下，那里的人民纷纷打电话来说：听到我们的声音，非常兴奋，又说他们仍在战斗。电话里热情的语调增加了我们的力量，尽管我们的嗓子都已哑了，但我们发现我们的声音是美好的。

上海解放后，我们继续战斗在广播战线。广播乐团也在党的关怀下，成为专业团体，并培养出许多的人才。每当我们回忆起三十年前上海解放这一段历史时，总会唤起我们无限的激情，鼓舞我们精神奋发，继续前进。

内部发行

书号 11074·398

定价 0.79 元